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2026年04月

第2期

卷4

VOL. 4

NO.2

APR. 2026

JOURNAL

OF

DEMOCRACY

习近平新极权体制：如何崛起，又将如何消亡？

裴敏欣 / 李聿脩

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逻辑和后毛时代的文革现象

宋永毅 / 高伐林

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吴国光 郭建 胡平 李大同 高瑜

蔡霞 林垚 李厚辰 李聿脩

孟加拉政治的回归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主编 Editor in Chief

王天成 Wang Tiancheng

顾问编辑 Advisory Editor

钟伟锋 Zhong Weifeng

编辑 Associate Editors

余浩风 Yu Haofeng

李聿脩 Li Yuxiu

技术、推广总监 Tech & Promotion Director

杨子立 Yang Zili

运营协调 Operational Coordinator

冯华 Feng Hua

主办、出版 Organization & Publisher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电邮 Email :cjd@chinademocrats.org

网址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

电子版刊号 ISSN (electronic): 2996-2420

印刷版刊号 ISSN (print):2996-2412

CC BY-NC-ND 开放资源

不得修改和用于商业目的

转载须注明作者、出自本刊



国际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f Advisors)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盖思德 Roger Garside	苏晓康 Xiaokang Su
陈健民 Kinman Chan	郝志东 Zhidong Hao	王飞凌 Feiling Wang
陈奎德 Kuide Chen	何包钢 Baogang He	文贯中 Guanzhong James Wen
陈志柔 Cih-Jou Jay Chen	胡平 Ping Hu	吴国光 Guoguang Wu
郭丹青 Donald Clarke	许田波 Victoria Hui	吴介民 Jieh-min Wu
孔杰荣 Jerome Cohen	林培瑞 Perry Link	许成钢 Chenggang Xu
戴大为 Michael Davis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杨凤岗 Fenggang Yang
戴雅门 Larry Diamond	夏伟 Orville Schell	张伦 Lun Zhang

国际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阿古智子 Tomoko Ako	廖雨诗 Yushih Liao	曾建元 Chien-Yuan Tseng
蔡霞 Xia Cai	李酉潭 Yeau-tarn Lee	王兴中 Hsing-Chung Wang
陈杰 Jie Chen	李思磐 Sipan Li	王柯 Ke Wang
陈育国 Yuguo Chen	罗世宏 Shih-hung Lo	吴玉婷 Andrea Worden
程映虹 Yinghong Cheng	艾华 Eva Pils	吴强 Qiang Wu
冯崇义 Chongyi Feng	任思梅 Johanna Ransmeier	夏明 Ming Xia
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石小琳 Katrin Kinzelbach	许秀中 Vicky Xu
柯蕾 Chloe Froissart	古思亭 Kristin Shi-Kupfer	叶耀元 Yao-Yuan Yeh
何晓清 Rowena He	艾美丽·庞 Amelia Pang	张崑 Kun Zhang
郭汤姆 Thomas Kellogg	贡嘎扎西 Kunga Tashi	赵荔 Li Zhao
卓玛加 Dolma Kyab	楚克斯 Rory Truex	

目录

访谈

8 · 习近平新极权体制：如何崛起，又将如何消亡？

裴敏欣 / 李聿脩

28 · 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逻辑和后毛时代的文革现象

宋永毅 / 高伐林

50 · 不肯被驯服的人：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流亡者经验

刘燕子 / 江雪

笔谈

74 · 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吴国光 / 郭建 / 胡平 / 李大同 / 高瑜 / 蔡霞 / 林垚 / 李厚辰 / 李聿脩

透视中国

100 · 文革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到平定土改和文革（下）

郝志东

118 · 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邓聿文

136 · 冷战—反冷战—新冷战：历史并未终结

陈奎德

民主转型

158 · 这是新孟加拉国的开端吗？

卡齐·努鲁尔·胡达

168 · 孟加拉政治的回归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读书

- 192 · 中共政治运动研究的新视角：宋永毅《毛泽东和“新中国”》
乔晞华

简记

- 200 · 全球民主人权事件
林秦

- 208 · 英文摘要
-

- 218 ·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 219 ·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

◎ **致谢：**黄奕信为本期所有画作作者

Contents

INTERVIEWS

8. *Xi Jinping's Neo-Totalitarian Regime: Ris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cline*
Minxin Pei / Yuxiu Li

28.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Mao Zedong's Governance through Mass Mo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ike Phenomena in Post-Mao China*
Yongyi Song / Falin Gao

50. *The Unsubjugated: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Exil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Yanzi Liu / Xue Jiang

CONVERSATION

74. *An Unfinished Reckoning: Sixty Years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uoguang Wu, Jian Guo, Ping Hu, Datong Li, Yu Gao, Xia Cai, Yao Lin, Houchen Li, Yuxiu Li

POLITICS & SOCIETY

100.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From Anti-AB League Campaigns in the Soviet Base Areas and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Land Refor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
Zhidong Hao

118. *From "Seizing Power" to a "Governing Generation": The Structural Decline of CCP Elders' Poli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Yuwen Deng

- 136. *Cold War – Anti-Cold War – New Cold War: History Has Not Ended***
Kuide Chen

DEMOCRATIC TRANSITION

- 158.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angladesh?***
Kazi A. S. M. Nurul Huda

- 168. *The Return of Politics in Bangladesh***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BOOK REVIEW

- 192.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CP's Political Campaigns: Yongyi Song's Mao Zedong and "New China"***
Xihua Qiao

NOTES

- 200.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vents***
Qin Lin

208. ABSTRACTS IN ENGLISH

218. Call for Submissions

219. How to Subscribe

© All artwork in this issue by Yixin Huang

访谈 | 裴敏欣 |
李聿脩 |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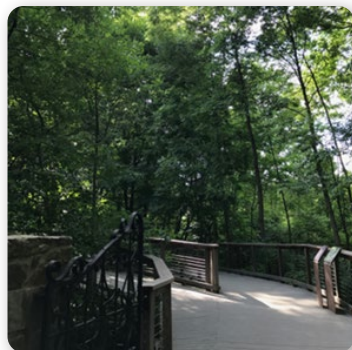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习近平新极权 体制：如何崛起， 又将如何 消亡？



裴敏欣



李聿脩

编按：邓小平支持的改革开放究竟留下了怎样一笔政治遗产？长期以来，改革开放被当成支撑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基石，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随着习近平推动国家向极权主义逆流倒退，近年学术界开始反思改革开放的“政治负资产”。重要的华裔政治学家、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提出，邓小平有两大政治遗产给习近平复活极权主义创造了条件。裴敏欣认为习近平的崛起有一定偶然性，但后毛时代改革给极权主义死灰复燃创造了极大便利。这是为什么？《中国民主季刊》编辑、青年政治学者李聿脩对裴敏欣教授做了这一专访，请他解释习近平政权是如何促成极权主义回潮的。

李聿脩（以下简称李）：非常感谢裴老师繁忙中接受我们采访。首先要祝贺您的新书出版！

您的新书《破碎的中国梦：改革如何导致极权主义复活》（*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 2026) 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最终很可能导致极权主义死灰复燃。但同时您也指出，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在衰退的新威权主义发展模式，并不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回归，因为继任者也可以像胡锦涛政府那样“混日子”。就此而言，您的看法可以表述为：不仅习近平上台有相当大偶然性，而且新政府政治路线也不一定要复活极权主义。但事实上习近平政府确实转向了极权主义，您似乎将这种路线转向归结于习近平个人。

与此同时，您也在书中指出：习近平政府其实复刻了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甚至比薄熙来走得更远。但这里有个问题。除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包括习近平本人）都曾赴重庆给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背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五代领导集体选择“重庆模式”作为未来政治路线，本身就不是偶然的？

如果站在中共高层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会看到，新政府要收拾胡锦涛留下的“烂摊子”：社会不满情绪升高（维稳压力攀升）、中央权力分散、腐败猖獗、政治改革推动不下去、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而且急需经济结构转型、要推动经济转型又需要打通地方改革阻力……也就是说，对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来说，他们须就以上“烂摊子”交出一份答卷。摆在第五代领导集体面前的选项大致有三个：一是逐步转向自由化（也就是汪洋的“广东模式”），但自由化对中共政权来说，有重蹈 1980 年代覆辙、乃至有丢掉政权的危险；二是延续“胡温路线”，（如您所讲）继续混日子、摆烂，但这样做对第五代中央领导人来说同样危害巨大，就算未来十年内没有丢掉政权，第五代领导人也可能（因为权

力被架空)面临不得善终的危险;三是按照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制造常态化的政治高压,这样即使经济一败涂地,中央不但能牢牢控制地方,还严厉压制社会反抗,确保在可预见的将来既不给第五代领导人造成不得善终的危险,也不至于丢掉政权(毕竟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保中共政权)。假如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第五代领导集体其实没得选:要么保政权,要么甚至连自己的命都可能保不了。所以表面上是三条道路,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在推行某项改革之前,其常规做法就是在地方搞试点。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存在过广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多种互相竞争的发展模式。其中邓小平偏爱广东模式,而温州模式则因偏离社会主义最远,在198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攻击。同样,在汪洋的“广东模式”、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跟“胡温路线”互相竞争的间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党内不存在相似的路线之争。

我们想知道:您怎么看胡锦涛时代路线之争?在第四代与第五代领导集体权力过渡时期,是否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当局已经在为向极权主义转向铺路了?比如“党政双合”和“国进民退”都是从胡锦涛第二任期开始启动的,这算不算胡锦涛政府开始考虑对政治路线进行战略性调整?

裴敏欣(以下简称裴):我认为胡锦涛后期,可以说并不是“九龙治水”,而是叫“群龙无首”: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共要维持一个这么庞大的体制,要有很清晰的方向、路线、政策,一定要有个比较

强的领导。但如果这个强势领导人的方向是错的，那整个体制就会朝错的方向走。

胡锦涛后期可以看出许多迹象。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我认为这并不就是整个中共领导层的集体意志。是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企业家”，认为自己可以在基本上很平庸的领导班子里面，让人看到一个耳目一新的领导人。薄熙来就是给自己贴上这样一个标签。看起来很成功是吧？中共高层有不少人都去重庆给他捧场，但这并不能表明真的支持“重庆模式”。当然，我想，薄熙来的“哥们儿”周永康可能是真的支持，但习近平去重庆肯定不是真的支持，而是逢场作戏，其他人差不多也是如此。

胡锦涛后期在外交政策上也有冒险迹象，但是总的来说，（问题还在于）胡锦涛后期还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许多官员就开始给自己找机会（这是外交政策冒险行为的原因之一）。

“重庆模式”跟所谓“广东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其路线当然也不同。但“广东模式”恐怕言过其实。汪洋也是个很胆小的人，他不敢在广东搞大动作。薄熙来在重庆的动作很大，但汪洋没什么大动作。他就讲几句话来表达开明态度，还没有兑现，他毕竟还是一个不敢做事的人。

你前面提到有三条路线：一个比较自由开放，另一个是稳守现状（也就是摆烂），再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的路线。我认为2007年选习近平做接班人的时候，他们选了当中那条路（即稳守现状）。2007年的习近

平跟 2012 年是两码事情。我根本就不赞同这种看法：（这种看法）说中共中央、中国最高领导人在 2007 年就想把权力交给第五代领导人，让他们放手大干，根本没那种事情。第一，我们没看到任何政治文件或者政府文件（说这种事情）。第二，2007 年中国总体情况还是可以的，并没有危机感。真正的危机感应该说是薄熙来带来的。那个时候（即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第一次出现中共高层分裂，而且那么丑恶。再者从经济上来讲呢，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共金融放水（平稳度过了经济动荡）。2012 年之后，大局不怎么好，但毕竟靠打强心剂还是能把经济给撑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很大的经济危机感。这期间中共外交上也很得势，可以说很得意！当时美国正陷入中东战争泥潭，经济一蹶不振。所以我并不认为 2012 年前后中共面临生存危机，这跟 1979 年、1989 年、1991 年的生存危机完全不同。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就是：对中共来讲，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选项，就是中间路线（即“胡温路线”），这条路还是可以持续的。

回过来讲，我的新书并不是说改革回到极权主义不可避免，（而是说）它是个大概率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比如习近平成了胡锦涛政府接班人。从习近平党内升迁路径来看，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实际上轮不到他。到 2007 年，我们知道，由于江胡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就选了这么一个折中选项（即习近平），并不是说交给他重大责任，要把共产党从“亡党亡国”边缘拯救回来——这只是习近平自己的说辞而已。为什么习近平那条路并不是共产党集体选择的？因为如果选习近平的人知道他要这么干，他们肯定就不会选他，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江派、胡派，都是受害者。共产党本身也成了受害者。就是因为出现了习近平。

我的新书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除习近平之外共产党所有领导人都想看到的。共产党这种体制很怪，跟其他专制政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共产党政权如果没有独裁者，日子可以过得相当好；如果有独裁者，日子就很难过。所以呢，在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人当中有一个共识：不能再有第二个毛泽东。但他们做的改革不彻底，又出了第二个毛泽东，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所以我认为，从选项来讲，2012年如果说换了一个领导人——你可以做这么个猜想，如果是李克强那么一个胆小的人做总书记——当然他不一定胜任得了——如果他做总书记的话，那中国就会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路线转变）跟习近平个人有很大关系。习近平的个人理念和手段对此有很大影响。当然，我的新书讲到的另一个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依靠共产党体制来实现个人目的。这套体制就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套体制也就是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保存下来的体制。这套体制在改革开放时代并没有受到根本改变。习近平要用这套体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很容易的。

李：根据2002年出版的《第四代》（该书被认为依据了中央组织部内部材料，曾成功预测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中的六人，并从习近平和李克强身上看到第五代领导人集体雏形），中共内部对当时外界知之甚少的习近平的评价是“生性豪爽”、“精明强干”，还拿他的低调务实跟薄熙来的高调张扬反复比较（当时的人事档案已经在批评薄熙来“飞扬跋扈”了）。这本书还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更认同习近平，因为他们三人有着较多的共同点，这与外界普遍看法截然相反。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布鲁斯·季礼（Bruce

Gilley) 进一步推断, 最迟 1997 年习近平就已被当成接班人选, 并且作为国家机密保密。《第四代》甚至还断言 (要知道当时还只是 2002 年), 如习近平不遭恶意攻击或诋毁, 必将顺利进入最高权力舞台, 成为第五代领导人代表。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上讲“两个不走”(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在 2013 年 1 月讲“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以及在 2012 年 12 月与 2013 年 1 月之间多次公开警告苏联亡党亡国教训。两人之间看起来不像是单纯的路线偏移, 反而更像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有所勉励, 而下一代对上一代有所响应。您怎么看习近平政府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政治遗产的继承关系?

裴: 我先讲一点。像《第四代》这种书是没有证据的猜测, 它跟我们知道的证据是相反的。这本书说 1997 年习近平已经内定接班人。当时是十五大, 习近平是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硬塞进去的。当时习近平跟江泽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习的仕途的真正转折点是 2002 年底的十六大。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 跳了一级半。胡锦涛讲“两个不走”, 其实就是不搞政治改革。但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还讲了一句“不折腾”。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在这种场合) 讲这种土话,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什么叫“不折腾”呢? 就是不要胡搞。那习近平搞的就是“折腾”了。胡锦涛肯定是不认同这个的。如果习近平跟他是一条路线, 二十大干嘛要把胡锦涛从主席台上架走? 所以, 我认为习近平并不是延续了江泽民跟胡锦涛的路线,

甚至完全可以说就是 180 度大转弯。

李：今年恰好是您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转型困境：发展型专制国家之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2006）出版 20 周年。这部著作是中国研究领域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经典名著。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当时不仅准确预测到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将陷入困境，给国家治理难题和经济衰退埋下祸根，还正确指出经济繁荣非但不会促成中国民主转型，反而会去除民主转型压力。后来，您在《哨兵国家：监控与中国独裁统治之存续》（*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 2024）里继续回应《中国转型困境》，讲中国未来民主转型更可能源于经济失败，而非经济成功。《哨兵国家》提出，中国已经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预防型镇压监控体系，这种体系或许可用现成书名称作“哨兵国家”。您在《中国转型困境》讲，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失能国家”问题，即国家综合治理“失能”，包括中共执政能力薄弱、国家提供关键公共服务的能力薄弱、中共社会动员能力薄弱、中共组织能力薄弱、国家与社会冲突加剧以及制度性失灵等等。我们很想知道：“哨兵国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的“失能国家”问题可能造成的社会危机？

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中国党政机关刊物和喉舌媒体上频频看到一种怪异现象，他们称之为“空转”，或者“制度空转”，指系统“出力不出功”。像《人民日报》就猛批“猛踩油门不挂档”现象是反映最多的“空转”问题。“制度空转”是否也折射着“失能国家”问题？中共当局有能力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手段解决“失能国家”问题吗？经

济衰退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失能国家”问题？若“失能国家”问题恶化，会不会削弱“哨兵国家”威力，乃至造成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讲的“内爆”？

裴：“失能国家”这个问题很有趣。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怎么理解专制体系、专制体制和专制政权，特别是列宁主义政权的国家能力问题。

我先讲这种体制。这种体制有两种不同能力。其一就是它的动员能力极强，因为它只有一个党，能一竿子插到底。这种能力意味着国家掌握巨大资源——邓小平就是特别崇尚这种能力，按中共的说法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当时急需“办大事”，这种能力就十分重要。国家对资源的调度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其社会控制能力也很强，因为（较少受法律约束）更方便动用暴力。再加上有很严密的基层组织，它要办政权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能办到，比如造高铁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是第一种能力，但另一种能力却很糟糕——这里指的是要提供国家日常服务的能力很糟糕。我常跟人讲，中共能把人送到外太空去，但是却不能保证奶粉安全。也就是说，它管不了食品安全。但食品安全只是一种很正常的需求，显然中共没有能力满足这种正常需求。其他比如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也很糟糕，尤其在均等化和质量方面。再有就是提供教育服务的能力也很糟糕。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而且只是一般的公共服务。这些一般公共服务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国家应该做好的，但中共做得就很糟糕。

这是列宁主义政权的一个内在的机制问题。列宁主义政权有一个特点就是，上面下来的任务是政治任务，你非完成不可，你“不惜一切代

价”也要完成，反正那个“代价”是老百姓给你买单。但如果要给老百姓提供服务——它干嘛要做那种傻事情？因为你的官就不是老百姓给的。中国的问责机制是“向上问责机制”，不是“向下问责机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要这种“向上问责机制”存在，“国家失能”或“片面失能”这种现象肯定是一个常态，而不是简单的“出了问题”。

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空转呢？习近平那个观念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 1950 年代。共产党以前是靠精神激励，靠意识形态激励。现在这套激励不管用了，他就用拳头、用暴力、用反腐来教训党员，还要跟他们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种话。他这一套手段，完全改变了邓、江、胡时代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共产党当时那个治理方式，并不是不担心意识形态，而是知道意识形态没用。共产党已经世俗化了，必须要有物质刺激。所谓“黑猫白猫论”不只是一要猫抓老鼠，你还要给猫吃东西，它才会给你抓老鼠。所以呢，共产党就用了一个激励机制。那个激励机制就包括腐败，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把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给我抓上去，我就让你拿一份好处。这就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模式。它现在改变了那个模式。以前是激励，是正面激励；它现在是反面激励，也就是用反腐、用恐怖来治理。用恐怖治理，最明显的、最快的一个效果，就是人家不给你干活，也就是“空转”。做事肯定很麻烦，那我就在家里睡觉，我装病，我闲得没事，那就是“空转”。官员会想：我一点自身利益都没有，我干嘛要给你打工啊？你在上面说教几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就给你卖命？没这种事情。要改变激励机制，肯定失败。以前邓小平那一套东西最终也是不行的，但是可能撑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在 20 年前那本书（即《中国转型困境》）中讲过，中共归根结底就是把公权作

为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这样时间一长，肯定会滋生大规模腐败，那么最终其经济也不可能持续。

李：您的新书《破碎的中国梦》最精彩的几部分是梳理改革开放时代极权主义制度残余、新威权主义崛起和极权主义死灰复燃的发展逻辑。其中制度自身的脆弱性和权力容易失衡，无疑是习近平复活极权主义体制的最重要条件。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L. Shirk）曾将习近平为什么轻易就集中个人权力的原因总结为：权力交接规则依靠惯例而非法规；“老人政治”不一定能对当政者产生约束力；天安门事件对中共政治和权力结构产生持续影响；邓小平未向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授权对中共进行制度性约束；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无法制衡总书记（反而形成类似教皇和枢机团的相互负责关系或互惠关系）。您的新书提出，邓小平留下的两大政治遗产，给习近平复辟极权主义创造了极大便利：其一是坚决反对政治改革或意识形态自由化，因为这些可能削弱党的统治；其二是本来旨在维持集体领导制的邓小平改革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并没有确立党内民主机制或对领导人的问责制，也即缺乏实际约束力（邓小平本人也在缺乏正式职务的情况下随意弄权）。

我们想向您请教：既然列宁主义政权的集体领导制这么脆弱，在后习近平时代现实中还有恢复集体领导制的可能性吗？尤其是反腐运动常态化开了一个坏头，以后的中共领导人也可能用反腐运动来排斥异己和集中权力。习近平有没有创造什么政治遗产可用以约束其接班人过度集中权力？对于官僚系统来说，常态化的政治高压究竟制造更多服

从，还是制造更多离心力或阻力？斯蒂芬·柯特金讲的“内爆”实际上指的是体制内既得利益群体对体制丧失了信心，最终纷纷撤回了对政权的支持。后习近平时代，如果要发生“内爆”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裴：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讲：经历了习近平时代以后，中共的精英政治格局会是怎样？比较有把握地讲，中共肯定会回到集体领导。其中一个原因是：一般经历强人政治之后，再出现第二个强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强人离世之前，肯定要避免有另一个强人出现，因为强人最怕的就是再来一个强人清算到他头上。（因为这个原因）强人肯定会弄一个比较弱的人来接班。当然，那个相对弱勢的接班人是否有能力担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有，我们可以借鉴两段历史：一段是斯大林之后，另一段是毛泽东之后。赫鲁晓夫可不是吃素的，邓小平也不遑多让，但他们都没有能够恢复强人统治，因为党和政权内部其他人都不愿意再来一个暴君搞恐怖统治。我想这个逻辑都一样。习近平恢复极权国家独裁体制，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那就说明重新出现政治强人是有一定偶然性——这个比较困难，就像我新书分析的一样，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所以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习近平之后中共会重新恢复到集体领导。但是共产党那个体制没办法长期维持集体领导，因为没有约束力：不搞党内民主，又不让社会民主，也就是说，制约权力很困难。当权者一旦掌握权力，一定要变得“ruthless”（残酷无情）：你可以毫无顾忌动用权力，没人能挡得住你。我看习近平就是政治上厉害——他就是学毛泽东，在这个体制里面手不能软，手段要硬，这个就是“残

酷无情”：你手段越硬，下面的人越怕你。不仅仅是共产党体制，所有专制都一样，哪个专制独裁者手软就会完蛋。专制手段一定是硬上加硬。所以共产党这个体制一定是不能维持集体领导的。

李：后习近平时代有没有可能重新放松社会管控呢？也就是说，如果回归集体领导的话，会不会社会管控又放松了，比如说言论自由又放开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裴：习近平时代不可能放松社会管控。后毛泽东时代确有放松社会管控，但其实是管控能力减弱，就慢慢出现一些诸如地下读书会这类组织。有一些是社会自发组织的民间反抗力量。一旦放松言论管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用共产党以前的话说，叫“忆苦思甜”。也就是党内把过去时代做的许多事情拿出来诉苦。比如你抓那么多人，是不是有冤假错案呢？那政府部门门口又要有许多人来申诉，要求平反，要这要那……肯定搞不了放松管控，一搞就会造成权威受损。

李：所以说在习近平时代以后，可能会出现集体领导，但其社会管控还是不会放松，还是会有严控？

裴：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要碰到跟赫鲁晓夫和邓小平一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向党交代、向全国人民交代：为什么会搞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也没有想到的习近平时代？很可以想象，等到习近平时代结束，中国情况会很糟糕。习近平的继任者具体要怎么做才能给一个交代，要看是否有以及有多少习近平忠实追随者留在新的领导班子里面。

后习近平时代的领导班子是否真正的追随习近平也要存疑。凡能接习近平班的人，现在跟他根本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假如习近平再执政 10 年，他的接班人现在差不多 50 岁，跟习近平隔了一代人。他们没有一起在地方共事过，甚至之前都不认识对方，凭什么可以信得过？如果他们认为是清算习近平可以为自己捞到政治资本，他们肯定会这么干。

所以习近平也担心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才能不被清算呢？就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也成天担心被人鞭尸。党内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比比皆是，出现类似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新领导人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为自己打造一个耳目一新的形象，就可能把习近平路线完全给颠倒过来。党内管这个叫“拨乱反正”。

李：有关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我们多少都能从您的经典著述中感受到一些悲观痕迹。在《破碎的中国梦》中，您再次提到：单纯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并不足以引导民主转型，关键是专制政权内部要出现一批支持自由化的精英来主导转型。就现实来看，改革派政治精英不仅是系统打压对象，历史上还一直相对孱弱。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如果算有的话）也一直羸弱不堪，其传达到体制内的社会压力，还远远达不到分化党内团结给改革派创造上台机会的程度。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转型困境”：社会看不到有效反抗，体制内看不到改革派精英得势，社会痛苦在加剧，但看不到社会出路在哪里。

另一方面，您的新书指出，习近平复活的极权主义更接近斯大林主义，不同于毛泽东主义的反官僚体制特点。2023 年，德国汉学家安晓波（Björn Alpermann）和腓力·伊摩（Philipp Immel）合作的一项研究提出，

习近平利用个人权威来破坏旧制度和创造新制度，其集权并非是实现权力个人化（比如萨达姆政权或金正恩政权），而是将权力重新收归中央以及强化党的领导。但由于是利用领导人个人权威来达成目的，所以看起来是混合了个人权力和制度化权威。诸如此类的研究让我们隐约感到：习近平看起来是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化的极权主义，其目的是保障相对完善的极权主义体制被继任者延续下去。您怎么看“习近平体制”（或者您讲的“新斯大林主义”模式）是否有被其继任者延续下去的现实可能性？长期持续性经济衰退会侵蚀这种极权主义体制吗？

裴：我们恐怕不一定十分了解极权主义体制的内在运作政治规律。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极权主义既有体制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有很强的党对政府的控制、党对经济的控制、党对军队的控制、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极权主义也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因为它毕竟跟极权独裁者密不可分。没有独裁者的极权体制是不存在的。你找不到一个实例可以证明极权体制可以没有独裁者。北韩如果没有金家王朝，就不可能是一个极权体制。极权体制没有极权统治者——这就是一个怪物，你很难想象这个怪物，因为毕竟极权体制的运作跟极权独裁者的决策、个人利益和个人理念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是否现正在推动极权体制制度化呢？我认为其制度化最多就是他个人权力制度化。他弄了许许多多规则，什么军委负责制啊，什么问责制啊，都是向他本人汇报。这就是个人色彩化了。并不是说政治制度化，就可以规定以后领导人要怎么做。要知道，华国锋接毛泽东班的时候，他的官衔是最多的。习近平都还超不过他。当时华国锋还

是总理、军委主席、中央主席，但他的实际权威并不够大。专制体制总的来说，没有办法制度化，极权体制也不例外。制度化并不是指规章制度写得多么明确——明确程度关系到制度是否可信。但其实共产党知道自己的制度不可信，所以它的许多明文规定其实都很含糊。如果写得那么细，但现实又不是那么回事，那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另外就是，政治制度化最关键的是强制性，也就是是否可执行；万一有人违反制度，他是否要付出代价。专制体制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专制体制实际上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警察”，但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在民主体制内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民主体制还是有第三方（比如法院、反对党、公民社会、独立媒体）来执行强制性。所以我认为，所谓“专制体制下的制度化”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提法。

李：我们看到有许多专制统治国家在经济崩溃之后依然苟延残喘，即使频繁爆发社会反抗也无济于事，比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就是如此。在一般威权主义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是更加严酷的极权主义国家呢？但现实再悲观，跟务实解决问题也是两码事。依据您有关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变革的观点来看，未来社会运动该如何吸引社会精英撤回其对政权的支持？我相信，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批社运知识分子会非常期待像裴老师这样的杰出政治学家，给我们一些有关调整社运战略的务实建议。

裴：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文革晚期的。文革晚期很黑暗。中国现在再黑暗，跟文革晚期比还是要稍微明亮一点。我想，当时出现了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现象：一是党内精英开始反思，就是跟邓小平同时代

的那一批党内精英，看到毛泽东把中国搞得那么糟（就开始反思）；二是社会也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穷，这么苦？所以这里存在两个平行发展。1976年天安门事件（也称“四五运动”）期间，这两个“平行发展”不谋而合。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就感到：中国要变。当然，结果就是华国锋把“四人帮”干掉了，紧接着就是邓小平复出。邓小平那一帮人想的就是：我们要变。为什么中国会有改革开放？当时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他们对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残酷的政治体制中感到不满。他们不一定要马上民主化，但至少要有个比较文明、不那么残酷的体制。所以我有个说法就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里应外合。以后如果真正要变，一定是党内党外都有这种相同的需求。

再有就是现实不断恶化，要能让他们感到必须得变。要形成那种压力，这当然得需要一定时间了。你刚才提到一种情况很有趣，就是为什么烂专制国家比比皆是，但烂又不一定垮。我经常提到一个例子：清朝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70多年里，打了不少败仗，还出了太平天国（形同打了一场内战）。就清朝那种体制，根本就没有共产党那种管理能力，还能拖那么长，关键在于精英抱团，同时国家机器仍掌握巨大的镇压能力。你老百姓造反，没用的。你再造反，规模能比得过太平天国吗？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在想：中国还是有地方跟别国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精英对自己的定位不一样。比如委内瑞拉，没有“强国梦”，也没有世界霸权梦，过去也没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共产党自称的“历史使命”虽然只是意识形态，现在也没有感召力，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是精英自我定位不一样的地方。伊朗也许想

当区域性强权，但并不追求世界性强权。我认为，共产党党内到最后还是会问这么一句话：真正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没有？有这点想法，恐怕还是会产生不愿摆烂的心理。就算不出现第二个邓小平，但党内类似的想法还是会有。

从这点来讲，我们还是应该抱有希望：中国的精英会开始转变的。

李：非常感谢裴老师！



黄奕信画作

访谈 | 宋永毅
高伐林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毛泽东运动治国的 逻辑和后毛时 代的文革现象



宋永毅



高伐林

编按：2026年是文革发动60周年。新春伊始，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在台湾出版了一本40万字新著《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梳理了毛泽东从中共建国之后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内在逻辑和核心思路，填补了中国政治运动系统研究的空白。5年前，宋永毅出版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一书，以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了毛泽东等六位文革核心人物。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现居纽约的作家高伐林先生，就这两本书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宋永毅做了这一访谈。

两本书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学术梦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永毅教授，祝贺你的大部头新著《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出版，这是你多年专心致志投注精力研究中国当代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又一项

丰硕成果。你的前一部书《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写文革这场持续十年的反文化、反文明的大灾难；现在这本“姊妹篇”由近及远，追溯过往，把整个毛泽东晚期的政治史连成了一脉，前后贯通。

你是在两部著作下笔之前，就“蓄谋已久”有了通盘考虑呢，还是在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过程当中，逐步发现了要对文革研究的彻底，就必须追根溯源？这两种情况，你是哪一种？

宋永毅（以下简称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写作的过程，常常有它的偶然性。开始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革，做的第一个数据库就是“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然后做了一个“反右”的数据库，后来发觉这两个数据库还不够，又做了一个“大跃进——大饥荒”的数据库，以及（建国初期）“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的数据库。在做数据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史料，说明了文革来源已久，使得我写完了文革这本书以后，觉得还应该写一本毛泽东与“新中国”的书，考察毛泽东执政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展现文革作为这一切的一种自然演绎。

第一点，我发现毛泽东搞的这些政治运动，在时空上不仅是有延绵不绝性，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常常有一种令人吃惊的重复性。比如说，毛泽东至少搞过三次“三反”运动、两次“五反”运动。再比如说“整风”运动，一直到文革后期“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从来没有停止过。习近平上台，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在全党全民面前的形象，他也是从整风开始、从类似“三反”的反

腐败开始。

这个重复，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而是一种极端恶性的轮回。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大屠杀，我发现不过就是中共建国“暴力土改”的恶性发展；广西文革中“为革命吃人”的万人吃人运动，也正是大饥荒中间“人相食”的恶性重演。

第二点，我还发现一个规律：为什么恶性循环？就是因为毛氏的政治运动轮回怪圈中间，常常是最高领袖为了掩盖自己造成的恶果，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来掩盖那个旧的相对较小的错误。比如说，毛泽东要翻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案，要掩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被迫做的一点点检讨，就发动了文革这样砸烂一切的浩劫。他就是不肯下“罪己诏”，他连历代皇帝都不如！更不用说大跃进期间的庐山会议，他本来是准备上山反“左”的，结果却是反了彭德怀的“右”，结果就造成了更多人饿死，本来一年半左右可以止住的大饥荒，变成了三、四年的长期惨祸。

所有这些，都使得我自然而然地想，如果不把这个毛泽东执政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研究透，这个对毛后期做一个学术上完整研究的梦想，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又写了一本四十万字的书。这样两本书，总算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学术梦。

人民群众常常是暴政的拥护者，甚至可能是帮凶

高：你研究毛泽东晚期和中国当代史的两个“姊妹篇”，表达了一些

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历史观念？

宋:我这两部书，大体表达了我一些对中国当代史，或者更广义地说，对整个历史研究的想法。

第一点，我的重点，毫无疑问，不是研究历史的必然性，而是研究历史的偶然性。研究独裁国家，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袖人物，他的非理性思维，潜藏的欲望和野心，以及他极端变异的人格心态，这些是我的研究重点。在文革这部书中我专门研究毛的非理性思维。在建国以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我还找到了一条可以连接的线，就是他深藏的战争思维，当然也是为他政治野心和为他的政治欲望服务的。

第二点，我要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是必然的。当今有一首歌唱道：“明天会更好”——不是！明天完全可能更坏。比如拿红色中国和中华民国的历史相比，文明完全是倒退。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和文明的倒退，也是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之一。我读到很多历史研究著作，最后作者都幻想说中国的事情一定会变好。古今中外的不少史实不是这样啊：阿富汗就变坏了，历史倒退了嘛。南宋是文明程度很高的一个朝代，就被元朝征服了，文明就被野蛮取代了。

第三点，就是不留情面的直接剖析，或者说直面历史倒退中的所谓人民群众的作用。我们往往误认为群众总是好的，人民总是相信人权、相信民主和要求自由的。其实，真实历史中的人民群众常常不是这样的。他们常常是暴政的支持者、拥护者，甚至有可能是帮凶。

文革期间不用说，文革中持有异端思潮的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对异端思潮的迫害。中共刚建立红色中国时，无论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是民族资本家，对中共都抱有“解放”的幻想。这些都说明了，不仅仅是独裁者，还有暴政的追随者，也要为历史的倒退负责。恐怕一般的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值得分析。我常常引用鲁迅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第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第二个呢，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是比较悲观的，也是比较克制的，他的话比较阴毒，但我认为有一定道理。

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对历史发展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是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的，也还有不少是人们研究历史时还没有认识到的。

高：你在《毛泽东和“新中国”》书里说：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运动有52场之多——我觉得大运动里面套小运动，可能甚至还不止——但你的书里并没有全部列举，写了七章，你选出这些重点，着眼点是什么呢？根据什么原则来“合并同类项”呢？

宋：我在《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序中间讲了根据美国之音的统计，大体有52场之多。我同意你的看法，可能更多。我还提到：其中比较大的政治运动大概是14到15场，在我这两本书中，应当说是都涵盖了。有的时候一章里包括了四五场政治运动，如你所讲“合并同类项”。比如第三章，我就把“镇反”和“肃反”两大政治运动并在一章里来写。“肃反”运动中还有反胡风运动、批胡适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镇反”还包括了武装剿匪，以及与土改相交织的劳改等等运动。

第四章讲的是粮食战争，那就不仅是统购统销运动，还包括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涵盖整个农业集体化的各个阶段。

应当说，我的这两本书，把主要的十四、十五次全国政治运动，基本上都包括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说1957、1958年还有“除四害”运动，包括打麻雀，也是全民规模的运动，也是运用政治手段、动员男女老少大张旗鼓掀起群众热潮。不过这是政治运动、战争思维渗透到生态学的领域，我就不把这个作为非常重要的政治运动来研究和描写，但其荒诞也是可见一斑的。

毛泽东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倒过来理解

高：你谈到历史的转折和演进，往往并不是线性的，并不是像有些书生们所想象的有什么“必然性”，往往就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治理国家有多种模式，采取哪一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治国，主要是靠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像他在诗词里面就多次写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乐于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热火朝天齐上阵。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生产建设，他都是希望看到“大呼隆”。毛泽东这个运动治国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他基于什么考虑就认定了这就是治国的最佳模式呢？

宋：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但我自己对这思考比较粗浅，因为我侧重研究的是毛泽东晚期，而这个问题就要回到研究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一直到建立根据地，也就是说，要上溯到战争年代的毛泽东——这方面我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毛运动式治国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分析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经验。他依靠战争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当然觉得这是他治国的一个根本法宝。我曾经在《毛泽东和“新中国”》中讲到，毛泽东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毛对此是非常赞成的，恐怕大家都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去看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及他其它谈论战争的著作，他有一个倒过来的理解，怎么倒过来理解呢？他认为：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这个认识就错大了！把所有的政治斗争当作战争、当作军事斗争来打，那必然出问题！必然就是遍地烽烟，到处流血，不扩大化、不极端化都不可能。

我在《毛泽东和“新中国”》中讲到了，为什么毛泽东在反右中公开地讲，我们要引诱这些知识分子对我们提意见，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是一个“阳谋”。这个讲法，在现代政治中当然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你明明许诺大家说可以提意见，结果你对提意见的人横加打击。毛泽东振振有词地宣布说这就是他的“阳谋”。我分析这就是战争思维造成的：他完全把这个反右运动，当成不对称的淮海战役一样在打。可是面对的不是国军百万雄师啊，面对的只是手无寸铁的大学和大专院校教师、教授。既然他把这个作为战争来打，战争的道德、军事的道德，与政治上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战争中随便怎么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有手段都可以用，只要取胜就行了。他就是用兵道和诡道，来代替王道和正道。

所以我认为，他运动治国这样的思路，恐怕还是在他战争年代形成的。

而他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理解产生重大失误，把政治看成“战争的延续”，这个是倒过来的理解。

再比如说延安斗争，使他积累了在党内排斥异己、定于一尊的政治经验，通过政治运动打造自己的地位。比如说土地改革的暴民斗争的经验，利用农民投名状获得内战时期的兵源。比如说他在战争年代的征税经验——我在写到他公私合营就讲到当时的征税由民主评议，这个就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经验。还有一个是“依率计征”：根据卖出去多少就征多少税，不能乱征，这个就是当时的顾准和薄一波的分歧。战争时期形势要求快，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粗暴一点不要紧，只要群众运动能够起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误伤再多的人都在所不计，就给毛泽东治国形成了运动式、战争式的思维——他战争确实取得了胜利，他以为他治国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这么干，结果他的治国是中国历朝历代最糟糕的。

“史无前例”缘于毛要在国内与国际双夺权

高：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又不一样：不仅是大规模，更是大民主。我们经历过那十年的人都记得当时常说的一个定语：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为了摧垮政敌刘少奇集团，为什么一定要采取发动群众，全面摧毁国家机器这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呢？

我们知道，很多学者对为什么爆发文革做出了多种解答，通常会指出两条直接原因：一个是国内，因为大跃进惨败，造成了大饥荒饿死了

几千万人，毛泽东在政治上被迫退居二线，但他不能忍受大权旁落；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清算斯大林罪行，让毛泽东产生了担心：自己身后是不是会被遭到他称为“鞭尸”的命运？在你看来这种理解是不是流于简单化？

宋：你说的这两条，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理解成毛泽东的反夺权的欲望。也就是说，他要完成从退居的二线，重回一线，夺回他失去的那些行政权和党权。毫无疑问，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掌握了党权和行政权以后，所执行的方略，尤其是经济路线，和毛泽东截然不同，对毛泽东鼓吹的人民公社啊、大跃进啊、三面红旗啊那些东西，都是实际上委婉地否定的。当然对毛这样自认为是无所不能的独裁者来说，这就是个直接挑战了。尽管所有这些人，不管是刘、邓、周、还是彭真等等，他们对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从独裁者的那种偏执型、多疑人格的心态来看，那已经是极大不忠了！因为从独裁者的观点来看问题，与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两码事。

除了从第二线重新夺回第一线的权，第二个动机是：他还要在国际共运中夺权，要把苏共的领导权夺过来，成为他领导的国际共运。那么他就要搞分裂。我们记得，那个年代全世界不少共产党、工人党，名称旁边都有个括号，括号内或者是“毛”，或者是“马列”，也就是说它是“毛派”，尽管有的党只有两三个人也不管，反正都是毛派吧。他要完成这个方向的反夺权，不可能依靠国际共运——不可能依靠现有的那些共产主义执政党，或者在野的意大利、法国的共产党。不可能嘛，人家不买他的账。国内，也有一个问题，他刚刚在经济问题上

受到大的挫败，他也不可能动用那些官僚机器来完成他这个任务，因为这些官僚机器主要是搞行政、搞经济的。那么他只能想办法，跳过这些官僚机器。

跳过这些官僚机器，能够发动什么人来跟他走呢？当然是基层群众。他在战争年代最拿手的是湖南农民运动。文革的发动中他跳过国家机器，和群众运动直接接轨，利用一些符合群众利益的人权诉求，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很多群众平反，鼓动他们起来对各级官僚机器进行冲击，通过天下大乱，达到他“天下大治”的最后目标——这个当然是他的个人政治幻想、妄想，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码事，然而这就是他唯一可行的一条政治路径。

第二个问题，你必须注意到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在心理状态上集聚的极度偏执型多疑人格的恶性发展。你看他那个时候到了四川，他不停地要换住处，说楼上有人要暗杀他，最后发现楼上的声音原来是只猫。这在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晚年的书中写得很清楚。在心理上他跌入偏执型多疑人格，在现实上他不可能依靠现有的党政官僚机器来完成他所谓的“继续革命”的目标，那么必然是发动群众攻击他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恐怕这是他必然的、不得已的一条选择。

战争思维也渗透了毛泽东的文革

高：你的书里面写到了文革中的很多举措，文革前早有了“草稿”，甚至“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很多措施、很多做法，都是一再采用，不断升级，不断加码，到文革集大成。你的书里面写到了，

当时搞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时候，告诉资本家说：你们把你们的资产，你们的企业交出来，你们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了，就是工人阶级了。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这些资本家减少他们内心抗拒程度。在文革中，我们这些人也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一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毛泽东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脱一批群众、一批在文革早期打成的所谓“坏学生”、“反党分子”，并告诉黑五类子弟，你们可以重新站队，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的身份就变了，就由革命对象变成革命动力了。这就是老谱袭用，把以前的政治手段在文革中故技重施。我们这些非红五类的学生，本来在阶级社会中备感压抑，这个时候就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出路。

新著副标题中“战争思维”，讲的是理解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重点，我感觉也是理解毛泽东文革构想的一条重要线索：战争思维，一切围绕打胜仗、消灭敌人，其他的都在所不计。战争思维是否也贯穿文革全过程？

宋：写文革，我倒没有用战争思维作为一条线来贯穿——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只不过研究文革有太多线，我没有把这条线作为最主要的一条线来研究。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文革中有效地发动群众？中国的政治，土改以来就是阶级身份政治。土改的最大危害，还不是它没收了土地——因为先没收了地主土地，一两年后通过合作化，又从农民手里没收了土地——更重要是划分阶级，这个阶级身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身份政治，就是固定化下来：你出身不好，就没有资格读大学，没有办法按

受好的教育。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讲，最大的追求，就是平等教育的权利。遇罗克的《出身论》能够震动全国，他讲的是个常识嘛，就是说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包括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今天社会中，除了阿富汗这种塔利班当权的国度公然不许女人接受教育，其他国度应当说是个常识了！但是在文革中《出身论》一出，竟然有那么振聋发聩的政治号召力，甚至导致了遇罗克的被杀。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拥护毛泽东，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幻想，就是觉得这个身份政治出现了裂缝。我们这些在身份政治中底层的青少年，如果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表现良好，可能争取到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我想这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尽管不太明确——跟着毛泽东造反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毛泽东的战争思维——兵不厌诈：今天可以利用你，明天就可以利用他。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站在整个社会最顶层，让你下层不停地斗。有一个关于文革的有趣说法：毛泽东先是挑动干部斗干部；然后呢，又挑动干部斗群众；接着号召大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来造反，挑动群众斗干部；等到他要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他又挑动军队干部斗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把地方干部拿下以后，他又挑动军队干部斗造反派……他就是在这个永不间断、永不消歇的群众和干部斗来斗去的过程中，自己坐稳了最高宝座。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战争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战争道德——兵道和诡道。

我们还要讲一点：文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动？如果讲国际背景，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不仅与美国等西方阵营长期敌对，还和自己阵营、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翻了脸，搞到刀兵相见的程度。

珍宝岛不就与苏军打起来了嘛。整个国家，1968年、1969年搞战备到处乱挖防空洞，就是在战争思维的情况下他发动的文革，他也用这个制造出到处是敌人这么一个战云密布的形势，来镇压人民群众。

高：是的，战争思维渗透了毛泽东从战略到战术的每一个层面。那个时候经常讲一句话：“七亿人民七亿兵”——人民都是兵，全民皆兵，他这个“伟大统帅”就可以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谁给文革画上了句号？

高：下一个问题，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毛泽东下令高考推迟半年，表明在他心目中文革是有一个期限的。但是，半年复半年，一年、两年又三年，最后旷日持久、遥遥无期，一直到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为什么搞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阻力太大，一直受到各种明的暗的抵制。毛泽东自己后来说，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这个大家都拥护；第二件事就是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我看来，其实毛泽东有过很多机会，能够及时地宣告文革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胜利。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永远开除出党，是个机会；1969年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是个机会；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也可以说“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见好就收。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继续革命一条道走到黑？甚至是到了1976年春天，他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都说不了话了，还要下令镇压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群众，他还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宋：他还想搞掉周恩来呢，不过身体不行了！

高：最后是什么原因使文革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宋：这个问题非常精彩啊。是什么原因使文革画上了一个句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是计划和部署；第二个方面，是理论和人格；第三个方面，是运动和形式。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看为什么文革会旷日持久、遥遥无期。

毛泽东搞文革，只有一个模糊的意向，是不是真有什么伟大的战略部署？那是没有的。我认为，毛泽东对文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出现什么问题，他常常也是手忙脚乱地去解决，平时他在中南海里，根本没有好好研究布局、制定战略。

我记得一件事，中国大陆能得到批准到中央档案馆看毛泽东档案的人不多，有一个人去过，我和他谈过，是军队研究文革的专家王年一教授。我就问他你到中央档案馆去看了毛泽东和文革的档案，有什么感觉？他当然没有透露他看到了一些什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而且呢，还是一个蛮无聊的人。他说毛泽东在中南海里没有干什么事，也就是和那些女孩子搞七搞八。毛的心思并不在研究文革，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伟大战略部署”，他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常常被石头绊倒。他没有计划、没有部署，所以就很难结束。

第二个，从理论和人格来看。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恐怕就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中讲到的：党内会有不停的斗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键要点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接受的！什么叫“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嘛！我们给他总结，这就是不停地制造阶级敌人来继续他的革命运动，目的实际上是没有的！你可以想象：搞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小集团，再搞刘少奇；搞掉刘少奇，再搞林彪；搞掉林彪，再搞邓小平……不可能停下来嘛！毛泽东自己也说，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次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多次。这都是正规的毛氏理论，是他同意发布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最高指示”，觉得他一定是发疯了：一次就搞成这个样子，还要进行多次？！

第三个方面，运动和形式。毛泽东搞的是群众运动，实际上他对这个群众运动，并没有把握住：它失控了，否则就没有1967年到69年的“全国内战”。他自己也这么说嘛。这就说明群众运动失控了，最后他自己都不得不出面，跑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来镇压群众。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很明显的嘛，他已经差不多快到生命尽头了，还要镇压群众。

如果说从1966年到1968年，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话，那么从1968年到1976年，毛泽东就是全面修补和恢复这个国家机器——前面是造反除旧，后面是偷偷复旧，文革就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可见毛泽东在掌握群众运动上也是失败的。

我的一贯的观点是：到底什么结束了文革？是上帝。毛泽东死了。他没有活到一百五十岁。现在习近平和普京在讨论能不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如果当年毛泽东活到一百五十岁，就没有今天登上大位的习近平了。习近平还是“狗崽子”嘛。他父亲习仲勋在毛眼里肯定是有问题、不可信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历史变化的契机就是那些独裁者的生命自然结束，给历史发展造成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共产党极权的国家机器和国家体制，常常只能依赖这个，说起来也是很悲惨啊！

高：你说“摸着石头过河”，“上帝才结束了文革”。老百姓说的更难听一点，这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最后死神来解决问题。从你刚才讲的，我有一个领悟：毛泽东对被认定的对手、这些前同事，往往深知他们的死穴罩门，所以他洞若观火，能够一招制敌。但是别看他是运动群众的老手，他对群众运动其实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北京有一位学者说过：毛泽东不懂“放妖容易收妖难”！你把群众都动员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来让群众运动平息下去！就像刚才你说的，最后只能亲自出面来镇压群众——什么工人民兵啊、工人宣传队啊、解放军宣传队啊……这不就是与文革初期他反对的那个工作队、工作组一样性质的嘛！

宋：从1968年以后，尤其是建立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谓“革命委员会”以后，他就是复旧，修补旧的国家机器，修补被他忽悠群众砸烂的国家机器——现在美国还有人提倡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有一个特殊的真实的历史参照系统，我们就觉得这不可能成功！

“第二次文革”有可能发生吗？

高：我们刚才谈历史比较多，现在接近现实了：文革对中国后来的轨迹，对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影响呢？尤其是，会不会爆发第二次文革呢？你在书里面曾经写过，“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句话是对史实正确、简明的陈述，但是换一个问法：“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会发生文革”，就变成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命题了！

从1976年9月9号之后，就进入了“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了。胡耀邦早就说过，“文革阴魂不散”。虽然他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说的，但是一直到今天，有很多人也还是有这种感觉。回顾一下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我在一个中央机关里工作，机关里就有人就把它叫作“文化小革命”。进入21世纪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后来更被习近平改头换面地接力。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担心再来一次文革啊，或者“2.0版文革”、“改进版文革”；有人甚至说“文革一直就没有结束”。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底层，有不少老人在怀念文革；一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他们向往文革，呼唤文革。这些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加重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心。你判断所谓“第二次文革”有可能发生吗？

宋：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分为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文革的主要形式（也就是群众运动）来讲，最高领导人撇开各界各级党组织，发动底层群众，用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类名目的政敌，就此而言，目前的中国，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他们都不敢！因为当年的毛泽东尚且失控，最后群众都搞到他自己头上去了。你想想看，他镇压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那就是矛头已经指向他了嘛！群众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放妖容易收妖难”，弄不好这个妖怪就搞到你自已头上！如果说现在的领导人发动人民群众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说任何一个当权派都是“革命对象”，如今的贪官比文革那个时候实在是“大跃进”了百倍不止了啊！当年官方公布的“四人帮”那些腐败罪行，比如说他们贪污腐败的金额，实在是太小了！比如说江青买了一个照相机，还是用毛泽东的稿费买的，这些人简直就是清官嘛！现在小到一个什么科长、股长，都是贪污犯啊，一贪污就是几千万、几亿、几十个亿，那要比陈伯达瞎写的、蒋介石为首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腐，何止高一千倍呀！所以从群众运动来讲，没有一个中国主要领导人敢这么做。谁敢这么做，一搞就必然搞到他们自己头上。难怪有人说，毛泽东要群众反领导，习近平要群众听领导，从这个层面上看，恐怕文革是不可能再次爆发的。

但是，就文革造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来讲，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是什么意识形态？首先是个人崇拜，今天习近平又搞个人崇拜——文革过后党内三令五申说过不能搞个人崇拜，你看习近平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厉害。

再就政治格局来讲，毛泽东搞文革，最重要的一条，在中央政治层面他做了什么？他推翻了中共八大建立的集体领导体制，把它变成了个人绝对独裁。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说毛泽东把一群人的专政、

政治局的专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专政。习近平同样，把一个政治局的集体专政，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裁。

从意识形态、政治格局这两点来说，确实可以说文革没有结束。有时西方的媒体采访我，问：“宋教授你认为文革结束没有？”我说：“你去看看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拿下来没有？”他说：“没有啊！”我说：“那怎么能够说‘文革结束’了呢？”

第三个我要讲，文革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负面影响，是给今天的中共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典范。这是我们一直忽略的一点。

毛泽东发动文革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都把文革说成是灾难。但是文革的发起人、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历史的惩罚？没有！这就给后来的中国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样板：照毛泽东这样子搞，能够成为最有野心、最有权势的人。干了那么多坏事，却可以躲过任何历史的惩罚。不是有一句话么：我只要过好今天，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在这个问题上，薄熙来、习近平都是以毛为榜样。薄熙来搞“唱红打黑”，当时有一个学者问他，说：“你这个家庭经历，为什么要这么崇拜毛泽东？”他当时就非常婉转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跟毛啊是有杀母之仇”——因为薄一波的老婆、薄熙来的妈妈，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薄熙来说，“我思考了半天，觉得还是毛主席的那一套能够管得住中国。”这就是说毛泽东的这套对于他们来说容易学。如果说他要想做法国的总统、英国的首相，薄熙来是可以走向民主的，但

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毛泽东是他们的典范和样板，他们就要走这样一条成为个人独裁者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却没有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给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典范，他们可以学。不仅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从建立的政治格局来讲，习近平和毛泽东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毛泽东树立的是一个反面典范，中共的领导人可以效仿他。

高：除了你刚才说的三个方面，你在两本书所描绘、所剖析的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有哪些东西，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影响？

宋：还有一点：独裁政权的做法对国际政治的格局也产生不少影响。比如说现有的这位美国总统在这个选举前后所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不是通过白宫、通过他的官僚机构来颁布法令，一级一级地贯彻意图，而是通过类似文革大字报的形式，就是社交媒体，直接与下面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建立关系。这种群众运动与最高领导人（或者说，是想成为独裁者的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联盟，就是文革创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只不过是借助于现在的电脑和网络高科技。这也有一条暗线：这位美国当今总统对习近平的统治非常羡慕，习近平又是传承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从这一条脉络看，也不能说他们之间一点没有联系。所有这些都将是我們继续研究的课题。

高：这也就是我们从文革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一直到如今六十周年，坚持纪念和反思的原因之一。从中共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到文革的某些根本因素，到今天没有得到清算、没有得到改变，文化大革命就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

终是一个隐患威胁。感谢您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和“新中国”》，这两部著作在政治现实和历史学术的双重意义上，深具价值。

谢谢您接受我的专访。

访谈 | 刘燕子 |
江雪 |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不肯被驯服的人：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流亡者经验



刘燕子



江雪

编按：2024年5月，《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一书在日本推出（集广舍出版）。该书作者刘燕子，旅居日本30余年，长期关注中国流亡者以及知识分子状态。在这本700余页的日文新著中，她以198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为中心点，向前追溯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与“内在流亡”的精神谱系，向后延伸至“后天安门时代”的内外流亡者，试图通过口述史、文献、实物、跨文化比较与长期观察，建立一条中国知识分子流亡的历史与精神地图，并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流亡知识分子这一谱系之中。

在刘燕子看来，流亡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命运，本质上也是一种不被驯服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种永远与权力格格不入的存在状态。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流亡可以是一种精神隐喻，但更多时候，它首先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生存处境。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苦难、挣扎和精神负担，往往比许多西方流亡者更加沉重。而日本学者松本女士则评论称，此书不仅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迫害史，也是一部关于回答“中国体制为何如此”的指南之书。

在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 37 周年之际，《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独立记者江雪对刘燕子做了这个访谈。对谈围绕《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分子群像》一书展开，希望回答“流亡”何以成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以及在当下，依然坚持“内外流亡”的思想与行动意义。

从文学青年，到书写“流亡”

江雪（以下简称江）：我想请你从自己的经历讲起。你早年的研究方向其实是文学。你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流亡”这个题目的？

刘燕子（以下简称刘）：对，我最早不是研究流亡，也不是从政治问题进入的。我曾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1991 年自费来到日本留学。1989 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在湖南长沙。那时我虽已大学毕业，但因为得了肺结核，在医院住了一年，所以并没有参与当地的声援活动。不过那段时间每天都看电视，受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深的。

我上大学时，正值八十年代校园文学很活跃的时候，朦胧诗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参加文学社团，写作得过一些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长沙工作，当时大多数同学去做老师，成绩好一点的有机会进机关。我因为学生时代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比较多，被分到了共青团系统下面的少工委，算是专职干部，日子平静。但 1989 年以后，我就特别想出国。

江：那时候想出国，是因为“六四”之后的时代气氛，还是也有你个

人的兴趣和原因？

刘：两方面都有。一方面，当时中国还没有那么发达，很多人出国，首先是想改善经济条件，寻找更好的机遇。而且我自己年轻时很喜欢日本电影，所以对日本一直有一种很具体的兴趣，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日语，为留学做准备。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一位邻居老太太说她在二战时认识一个日本人，是个医生，也许还能联系上。那时候出国留学需要保证人，这件事很关键。后来真的联系上了。这位医生曾在“满洲医科大学”学习，日本战败后因有医术被八路军（后为新四军）接收、留用。他跟着东北野战军（“四野”）南下到湖南，1953年才回日本。他愿意做我的保证人。于是我辞掉工作，背着几个箱子来了日本。

我先念语言学校，后来又念了两个硕士。两个硕士之间，我还去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日本，又回到日本继续念文学硕士。

江：所以你真正的研究转向，是在第二个硕士阶段开始发生的？

刘：对。1998年我回到日本。1999年至2006年前后七年，我一边读书，一边和性情投合的留日学人办文学杂志《蓝·BLUE》，这是一本中日双语的大型文学刊物，我担任日文部分的主编，办了21期。这本杂志记录、翻译和介绍“地下文学”、“流亡文学”，以及许多被历史的大洪流所淹没的、同时代发生的知识人事件。这也与我当时的研究主题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有关。

当时流动比较自由,我去了北京,也去中国别的地方,认识了一些诗人、作家,开始对黄翔产生了很大兴趣。那时诗歌界很多人都觉得,黄翔只是一个“诗歌化石”,有政治意义,无文学意义。但我读了他的东西,觉得不是这样。他有一首名为《野兽》的诗写于1968年,里面说“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他早在1978年10月就在北京天安门发声,而且是从贵州去的。这对我触动非常大。于是我开始去贵州、四川、湖南寻找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者,倾听他们的声音。

那时我在北京认识了余杰,进而认识了他的老师钱理群先生,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另外我有一个学长,把我带进了北京文化圈。后来我又认识了四川的王怡、廖亦武这些人。你会发现,只要认识了一个人,就等于认识一圈人。他们每个人就是一座“矿脉”,在任何时代,任何险境中,写作生命都汇入地下,如流水般,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已经从“地下文学”走向了“流亡文学”,因为我去找黄翔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流亡美国了。

江：那关于流亡者的问题意识,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吗?

刘：是的。追踪黄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四十多岁、只能用中文写作的人,到了美国以后,他还能怎么写?他以什么语言写?为谁写?语言环境会怎样影响他的思想和写作?流亡,是否给他带来精神创伤?这是一个非常具体、也非常根本的问题。阿多诺说,每个移居别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残废”。比如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和科学哲学家埃德加·齐尔塞尔 (Edgar Zilsel) 都在流亡后自杀。对于作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来说,“文化休克”和“母语丧失”是致命的。语言的枯竭,会导致思想的部分枯竭。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家承受的程度轻很多,比如方励之先生。

后来我去美国找黄翔。为了找到更多扎实的材料,还去看了哈佛大学收藏的文革时期地下刊物。通过这些线索,我又认识了更多人,比如当时在哈佛读博士的陈建华,我从他那里得知文革时期上海诗人有地下诗歌创作,其中还有人为文学殉道。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文革时期贵州和上海地下文学为中心。

我意识到,中国的“地下文学”以及它的延长线“流亡文学”并不是零散个案,而是一个很大的被遮蔽的历史主题。我开始在国内外寻找他们,寻找流失的手稿,倾听他们,一起打捞记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想把更大范围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作为个体和群体记忆的“群体传记学”来理解。

江:你谈到通过廖亦武认识了刘晓波。在《不死的流亡者》一书中,你把刘晓波归纳于“内部流亡者”的范畴。你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刘:2007年3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从四川过来。“两会”期间,刘晓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来了,我们就在万圣书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老实说,当时刘晓波最关心、最激动、最投入思考的那些问题,我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看政论,我对政治理论不像

对文学那么敏感。但那次谈话里，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谈自己和日本的关系。谈他写的《樱花的中国劫难》，谈中国的民族主义，他对“满洲国”时代留下的遗产的客观评价。

他虽然没有来过日本，但在吉林大学时修过日语文学，一直关注日本，希望日本对中国民主化有所作为。那以后，他给我发过大量材料。那时他已经很会用互联网了，而我还是个“山顶洞人”。他会不停发文章过来，邮件标题常常是“刘燕子，我来轰炸你”。所谓“轰炸”，就是把一包一包的文章发过来。我收到以后都会打印出来，但一开始也没有认真全看。

一直到2008年他被抓，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给我介绍了东京一家很经典的学术出版社。他对我说：“既然你认识他，而且他那么多文字都在你这里，是不是应该赶紧翻译介绍一下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后来我就和中央大学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一直做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我们一拍即合。2009年，我们出版了刘晓波的文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出版）。我写了很长的导读，对“六四”以及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做了一万多字的梳理，还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这些都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前。

当时书卖得并不好。可后来刘晓波获诺奖以后，凡是和他、和零八宪章有关的事情，在日本几乎都绕不开我。他和刘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诗歌，都是我介绍进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还出版了一本学中文的教科书——《用零八宪章学教养中文》（集广舍出版），被好几所大学的法律系采用。

江：你曾说采访了超过 100 位流亡者，书中主要描写了有 50 多位。从目录中能看到，你对 1989 年前后流亡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些分类。例如严家祺、刘宾雁被归入人文社科领域，方励之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对于作家这个群体，你也用专门的章节来研究。

刘：对的。这本书从《序章》到第三章，写我对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初步考察，作为研究的参照框架、坐标系等，比如流亡的形态、代际、原因，“六四”及其之后的知识分子流亡，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流亡的条件，民主国家应对流亡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这涉及香港的“黄雀行动”、法国的“先斩后奏”救援和“爱丽丝”（ALICE）帮助接应流亡者，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流亡者的刊物与出版等。在书的第四章，主要描述了这些大历史洪流裹挟下的个体生命史，包括流亡之后所面临的复合性困难等。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都怀有某种希望，以为迫害他们的那个专制政权会很快被推翻，能很快回到自己的家园。像刘宾雁，就说自己在美国就像坐一个大牢，魂牵梦绕的是中国人民。他说：“如果我的政治环境正常，我宁愿到一个县里去住一住，去北京的马路牙子边坐一坐。”

在书的第五章，我重点描述了高行健、郑义、哈金等作家。高行健让我注意到一种可能：一个中文作家也可能转向别的语言写作。高行健本来就有法语背景，到法国以后，他并不是完全停留在中文里。他用法语写戏剧，还有绘画。哈金则认为，一个国家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不允许他的作家用诚实和艺术准则写作。“最高的背叛是选择用另一种语言写作，”哈金说。

郑义流亡时是背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出去的，他说：“象形文字

就是我永远的祖国。”布罗茨基说过，最高等级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母语。早年的中外流亡者，其实都背着母语作为精神家园，走上流亡之路。

对我来说，郑义、高行健这些人不只是“研究对象”。他们会趁日本笔会邀请时，独自乘坐新干线来大阪找我，住在我家里。我们是长期往来。很多年下来，我跟这些作者之间建立起的是一种相对比较深的私人信赖。可以说，我是流亡者的伴行者。

为什么“流亡”是理解中国的关键词之一

江：你在这本书的前三章，花了很大篇幅去界定“流亡”这个概念，而且不只在中国语境里谈，也把它放进历史和世界的思想和学术脉络中。为什么你觉得，“流亡”是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刘：流亡和自愿的移民、有准备的留学不同。流亡是非自愿的，是因为你和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格格不入，是迫不得已，被强制一刀切断你生命中几十年建立的亲戚朋友网络，跟已有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我这本书研究的是“六四天安门”和“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是一部“群体传记学”。我通过他们的“life history”，也就是个人生命史，与大历史之间的交叉，来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我研究的不只是海外流亡，也包括国内流亡、精神流亡、内在流亡。通过研究，我能看到，流亡知识分子往往在民族历史和主流记忆之外，遇到多重复合的困难——语言、经济、身份、心理、文化迁移、

家国关系等等。他们如何跨越这些沟壑，如何在“连根拔起”之后仍然保持写作、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整本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江：你在书中也强调，“流亡”一词，其实在中国历史内部有更长的传统。

刘：对。如果只从表面看，好像流亡只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种不被驯服、与权力格格不入的精神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离不开“流亡”这个关键词。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多数会苟且偷生，屈从权势，但同样有“弘毅之士”，不被圈养、不服从权威，甚至舍身取义。“遗民”的精神气质是追求自由独立。

“流亡”这个词本身，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再往后，屈原、“竹林七贤”、柳宗元、韩愈、苏东坡、朱舜水、王国维，他们都带有某种流亡命运。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中国一直有隐士文化，也有“内在放逐”的传统。只是到了现代，尤其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流亡异国。

我这本书写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但我始终把它放在更长的中国精神史里看。我觉得，从文革地下文学，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再到1989之后的流亡，这中间并不是断裂的，而是有一条精神上的延长线。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那种不被驯服的精神也没有断过。

江：你也把中国流亡者放置于世界流亡知识分子的谱系中来书写和研究。关于流亡和知识分子，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有一些重要的论述，他们在中国也较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阿伦特，这些年她的一些作品在

中国不断被介绍和讨论。

刘：事实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两个方向启发。一个是纳粹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这让我了解到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德语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后来流亡美国的历史。另一个方向，则是苏俄时期的流亡知识分子。

早在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人以及参与救援人员，就举办了以“文化迁移”为主题的研讨会。六十年代中后期，因着对德国历史的反思，流亡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在“抢救历史”运动中，“流亡社会学”已成为一个专门性学科领域。

关于苏俄时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大学同事研究满洲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2年被驱逐出故土，乘坐“哲学船”流亡德国的知识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罗佐夫）咖啡店，那里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人莫罗佐夫携家逃亡哈尔滨，然后又流亡日本神户，给落地地带来了西式点心。在日本学术界，纳粹下的德语知识人流亡，以及东欧、苏联时期知识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启发，让我慢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点：怎样把中国的流亡者，放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和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并与那些已广受瞩目的流亡作家传统进行比较。

关于知识分子和流亡，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源，

但我在书里并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论述。我真正要引出来的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身体离开故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内在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其实是不会终结的。身体上的流亡也许有结束的一天，但精神内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关于我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只有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知识分子才可能始终保持反思、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断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继续生长、丰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时，会觉得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或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又仿佛已经和祖国诀别，似乎已经被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变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但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流亡知识分子反而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国。

江：你试图赋予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生命及其选择以一种更重要的意义。

刘：我确实认为，流亡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保管者。他不仅保存了母国文化中有生命力和精神性的那一部分，同时也在努力适应流亡所在国的现实，并不断经历纠葛、矛盾和挣扎，伤痕累累。萨义德也把流亡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模式和基本立场。正因为知识分子拥有某种双重视角，他才能不断打破既有秩序，保持批判能力。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进入这种“流亡”状态，他就很容易陷入某种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既定秩序与宏大的主流叙述之中，被慢慢驯化。他可能在那个“动物园”里也过得很好，但他已经失去了

真正的野性。

不过对我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经验，尤其是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所承受的挣扎、痛苦、矛盾和纠葛，往往比包括萨义德在内的许多西方流亡知识分子更深、更尖锐，也更具体。

为什么这样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汉语和英语之间，不只是两种语言的差异，而几乎是两个世界的差异。语言造成的断裂，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流亡，至少还是发生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文明传统内部。比如一些德语作家进入英语世界，虽然也会痛苦，也会觉得格格不入，但他们毕竟仍然处在较为接近的西方历史与思想脉络里。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流亡有时可以是一种精神隐喻，但更多时候，它首先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生存处境。这种痛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实在语言、身份、写作、记忆和现实生活中的。可以说，他们承担的具体苦难、挣扎和精神负担，往往比西方流亡者更加沉重。

“被低估”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

江：你曾经说，中国流亡知识分子被严重低估。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

刘：一方面是因为，这几乎是一个研究空白。二战以后，欧美很快就形成了关于德语流亡者、苏俄流亡者的研究传统，后来甚至发展出“流亡社会学”、“流亡文学社会学”这样的跨学科领域。但中国这一块，长期没有人系统做。这是因为研究流亡，必须承担高风险。专制尚未

结束，“老大哥”已经深入研究者的客居国。

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印象里，中国流亡者常常只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没什么作为”，离开中国就离开了“现场”，不接地气，出现故国与流亡地的双重缺席；另一种就是“内讧、争斗、互相贬低”，负面印象特别重。

日本一开始就是这样看中国流亡者的。大家知道“六四”，也会同情，但一谈到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在海外，往往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创造，还不如中国大陆内部的作家重要。

可实际上，一九八九前后形成的这场流亡，是中国当代史上规模非常大的一次知识分子外流。单是“黄雀行动”救援出来的，就有四百多人甚至更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种途径，实际出走的人数要更多。而且这里面不仅有“六四”以后直接出走的人，也包括像高行健、哈金这样，原本已经在海外，但因为“六四”而“与祖国诀别”的一批人。

我采访过一百多人，书里实际写到五十多位。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大量无名者，根本还没有被整理出来。我前面说过，中国流亡知识分子遇到的困难，比欧美流亡者更大。德语、俄语再怎么和英语不一样，它们毕竟还在西方文明内部。中国作家的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是更深的断裂。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语言方式，全部都要重新面对。所以他们更难进入欧美知识界的主流，也更难被看见。

江：据你介绍，在本书的研究方法上，你不只依赖理论和二手材料，而是用了大量口述、档案、实物、现场走访。这个方法是你一开始就

确定的吗？

刘：我这本书的方法，可以说是口述历史、文献资料、文物实物之间的互证。我很重视第一手资料。只要有公开材料，我都会尽量去看。像哈佛大学保存的中国地下刊物、手刻油印本，我会去看；香港“黄雀行动”有关人物留下的手稿、记录，我会去找；台湾、美国、法国的相关公开资料，我也尽量去查。

除了文献，我还很重视“文物”或者说“实物”。因为有时候，一个流亡者带走了什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线索。比如郑义先生说，他流亡时包里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我就需要亲眼看到这本词典。严家其先生说，他流亡时带了六本书。我就一直想查，到底是哪六本书。

这些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当一个人离开国土之后，他把什么当作自己的祖国？他的文化的根到底寄托在哪里？另外，这种“文物”的触感，也会让“流亡”变得非常具体。

江：你书里把中国流亡者遭遇的处境概括成“多重复合的困难”。这具体包括哪些？

刘：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语言。对作家、诗人、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四十多岁以后流亡的人，更难跨过去。我读过一位日本诗人饭岛耕一的诗歌《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第一个字母》，非常口语化，“我在外国（法国）住了半年，想写诗的心情，一次都没有。母国语中，是从‘母’与‘国’中割断的半年，我没有受伤，

但我几乎没有写诗的必要”。这位日本诗人还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客居。那么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谓“四不像”，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外语学不好，中文却退化。其中一个例外是哈金。他的写作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冒险写作，在语言与语言的空隙间写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这里作出贡献。但哈金这样的成功者很少。当然代际也会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离散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会困惑。

第二个是经济。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国都有身份、地位、稿费、组织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没了。不管曾经在中国多有名，很多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买二手车、怎么修旧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吃饭。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离不开他们的太太。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没有这些女性在后面支撑，很多男性流亡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是心理上的落差。像严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参与设计中国未来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初还有学校请他讲演，后来慢慢连基金都申请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来的知识结构和英美学界不接轨，语言又不够。这种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开始甚至做过外卖，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访护士和家庭看护的工作。

还有身份认同。你要不要拿美国国籍？要不要继续说“祖国”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严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国国籍后的十年才决定申请美籍。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说自己不再用“我国”这个词。这不是词语的小变化，而是认同方式的一种变化。这次美国华裔花式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说，他拿到美籍之后，改原名“刘俊

国”为“刘俊”，因为那“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乡”这个字，对中国人特别大。很多人的软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写个检讨换取一次回国机会？要不要为了见父母妥协一点？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流亡者都绕不过去。

江：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对中国的流亡者颇多批评。你在书里是怎样处理这些质疑的？他们只是单纯的受难者或英雄般的人物吗？

刘：确实，我在研究中也提醒自己，如果我不写他们的局限，那这本书就会变成一本英雄赞歌。流亡者中也存在社会分层、利益博弈，还有相互诋毁。但我希望自己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认同那种说法，鄙视流亡者，说他们“没什么好人”，说他们是“逃兵”；一些极端的言论甚至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迫害他们的政权更是将他们当做“卖国者、叛国者”。另一种，是把流亡者过分英雄化，好像他们天然就是知识分子骨气的代表。

其实流亡者个体也只是真实的人。人本来就是有局限的，也是有伤痕和软弱的。有些人确实活在过去的光环里，觉得自己永远是“天安门英雄”；有些人始终困在旧有的自我形象中；有些人因为长期受伤，性格会变得激烈、阴暗。这些我都看到了，也写进去了一部分。

我不想用简单的道德语言去审判他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放进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去比较，我们会发现，纳粹时期的德语流亡者，还有苏俄流亡者，他们的内斗、纷争、人格局限，一点也不比中国流亡者少。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的复

杂，也就有冲突、竞争和纠葛。

我们应该把流亡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图景中去理解。今天大家回头看，当时犹太人流亡海外的大约有五十万人，美国接收了其中 13 万，他们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教育。美国吸收了德语文化中的一批精英，包括后来最著名、最常被引用的人物，如阿伦特、阿多诺等等。有人反过来说，你看今天中国的流亡者，对美国没有任何贡献，反而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对欧洲、对世界也没有任何贡献。有些人则把这个归因于代际问题，或者归因于所谓中国人性中的黑暗。

但我不这样认为。1989 年所引发的这一场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流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写的不只是海外的流亡，也包括国内的流亡，很多今天并不为人所知的人。我是把这些不同形态的流亡放在一起做比较。1949 年以后，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流亡。毛泽东时代，连流亡本身都是不可能的。高行健自己也说过，一直到改革开放打开了一道门，流亡才终于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这场流亡本身，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到今天专制政权仍没有结束，流亡仍是现在进行时，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现在就匆忙下结论，说它没有价值、没有贡献，或者说这些流亡者“都不行”，我觉得为时过早。一个历史过程还在进行当中，它的精神遗产、文化意义，也许要到更久以后，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内部流亡”的代表：唯色，用统治者的语言反抗统治

江：你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用了很大篇幅写“内部流亡”或

者“内在流亡”。你为什么重视这个概念？

刘：因为如果只写已经出境的人，你会遗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经验：很多知识分子，即便身体没有离开中国，精神上也早就开始流亡了。

像刘宾雁就是这样。在别人看来，他后来才真正“出走”，但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就已经处在一种与体制格格不入的状态里。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也说，他第一次见刘宾雁时，就觉得这个人其实早已开始内在流亡。

所以我会把“外在流亡”理解为“内在流亡”的延续。中国历史上，屈原、柳宗元、韩愈、苏东坡，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他们不一定都越过国境，但在精神上，他们已经和现存权力秩序发生了深刻冲突。

这个概念不是我创造的，它在欧洲已有先行研究，也可以叫精神流亡、隐喻的流亡、内在的流亡。但我觉得，把它放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有解释力。

江：在“内部流亡”这一部分，你用了很大篇幅写作家唯色，将她视为“内部流亡”的一个代表。

刘：在我看来，唯色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内部流亡者”。在这本书中，她也是我着墨最多，最为爱惜的一个人物。

我和唯色认识已经 20 年了。在这 20 年里，我既是她的研究者、朋友、翻译者，也是一个持续的观察者。她在日本出版的书，很多都和我有

关。她的写作变化，身份意识变化，我几乎是一路跟着看的。

唯色把很多层面“流亡”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是藏人，身处中国内部的殖民处境；她的母语教育被剥夺，只能主要用汉语写作；她不能自由出入自己的家乡；她住在北京或上海，但那都不是她真正愿意的生活；她明明在中国之内，却始终处于一种被隔离、被剥夺、被驱逐的状态中。她是我书里“内部流亡者”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江：书中有关于唯色的专门一章，你说她是“用统治者的语言来抵抗这种统治”的作家。

刘：是的，因为家庭的原因，唯色从小其实没有受过完整的藏语教育。她接受的是国家设计给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套教育。你可以是“少数民族”，但你必须先成为一个用汉语、用官方框架理解世界的人。她自己说过，小时候知道万里长城，却不知道布达拉宫背后的真实历史。上大学时，她念中文系，在所谓“民族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甘孜报》中文版工作，也是用汉语写作。

后来她回到拉萨，亲戚问她：“你的舌头被割掉了么？”因为她不会说藏语。这句话对我自己的震动很大。因为它说明，一个人明明出生于自己的民族之中，但因为语言被剥夺，在自己人那里，也会变成陌路人。

唯色后来通过父亲留下的文革时期的西藏照片底片，开始追索西藏文革的历史，写成《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我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这个过程对她来说，不只是历史写作，也是重新寻找“我是谁”

的过程。她慢慢恢复了自己的藏名，也越来越清楚地认同自己是一个藏人，即使她主要使用汉语写作。

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对她特别忌讳。因为它原本培养你，是希望你做传声筒；可你居然用了它的语言来反对它，来讲述它最不想被讲述的历史。所以她后来除了没有坐牢之外，几乎一切都失去了：工作没了，职位没了，护照拿不到，回自己的故乡也处处受限。

她曾经说过：“写作就是流亡，写作就是祷告，写作就是做历史的证人。”我觉得这句话，对她来说不是修辞，而是信念，藏人作家的命运。

流亡者的“软肋”：父母、故乡与不能回去的人生

江：在谈到这些流亡者时，你有时会讲到非常具体、也非常刺痛人的问题：父母、回乡、护照、最后一面。这些对流亡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这些是他们真正的软肋。你如果只谈概念，谈政治，谈历史，那很容易把流亡者写成一个抽象的人。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痛往往是在和父母亲人见不到最后一面的时候。这么多年，我走访了很多流亡者。每一次他们一提到自己的软肋，我都会非常受触动。我们都有父母，可很多人都见不到父母最后一面。

有一个流亡者跟我说，他母亲的骨灰被运出来以后，他抱着骨灰盒，一路走，一路喊“妈妈，我们过山了”、“妈妈，我们上船了”……当时我听着，只是觉得悲伤。一直到我自己的父亲去世，我才真正知道

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即使你有条件，你也很难把父母永远接到海外来生活。每个人都有这个软肋。我这本书，借用了郑义先生主编的《不死的流亡者》书名。流亡者，尤其是第一代、第二代流亡者，个个都是“梦里依稀慈母泪”。

很多人会轻易地批评别人为什么回国，为什么见父母，为什么写检讨。我不这样。我从来不轻易谴责这些。因为人有软弱的一面，你必须承认。换成我自己，我就一定能比别人更刚强吗？我不敢说。

语言、身份“为谁而写”

江：你书里对“语言与流亡”的关系，写得特别重。为什么这是你特别在意的问题？

刘：语言对作家来说，不只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很多流亡者最后都只能用母语写作。像黄翔、郑义，他们几乎不可能真正转向英语；高行健可以用法语写戏剧，是因为他本来就有法语基础；哈金能用英语写作，也是一个特例。而杨炼又是另一种情况，他后来慢慢把英语也变成了自己的表达资源。他认为，流亡的“亡”字，并不是死亡，而是“流动”的意思。

我非常喜欢杨炼关于流亡的说法。他说，流亡带来的不只是失去，也是获得。你获得了新的视点、新的语言资源。他说自己以前是“中国作家”，后来变成“中文作家”，再后来在流亡中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甚至可以叫“杨炼语”。

这个对我很有启发。它提醒我们：流亡不只是把人连根拔起，也可能让语言和生命发生新的流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这一步。更多人是长期停留在断裂、失语和痛苦里。

江：那你自己呢？你现在也是一个用两种语言写作的人。你怎么理解自己和语言的关系？

刘：我自己是用两种语言在写，但我始终知道，我是在日语的边缘写作。我的成长根基还是汉语，这一点不会变。所以“为谁而写”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始终都在。我是为日本读者写吗？是为中文读者写吗？是为历史写吗？还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

这些问题我都想过。我也反省过：我是在“贩卖中国的苦难”给日本读者？是不是在利用流亡者来做自己的学术？但我最后觉得，不是。我更想做的是：把这个时代里一批不肯被驯服的人、努力想活得光明磊落的人，以及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自身的软弱、缺陷，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江：你说自己写完这本书以后，好像有一种很强的“虚脱感”。你也说自己这么多年在日本做研究的状态，是“一个人一支游击队”，这其实很难。

刘：是。这本书耗尽了我太多心血。写完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虚脱状态。因为我没有研究经费，也不在日本的主流学术系统里。我一直是兼任老师，靠教书维持写作，几乎每天背着水筒、便当盒等挤在电车上，靠腿力和钻缝隙的时间写作。自己一点一点去采访、积累、

翻译、整理。所以我常说，我是“一个人一支游击队”。但我还会继续写。因为如果没有人写，他们会被遗忘、被歧视，流亡者的命运与其经历就会一同沉入历史的幽暗泥沼中。

我曾两次去过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墓园。那里有“无名英雄墓”，我看到一句话：这个人，世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上帝知道。

很多流亡者很快就会被历史忘记，尤其那些无名的人。我写这本书，其实也如同一个“投瓶实验”——把这些资料、这些生命经验装进瓶子里，投进历史的大海。也许一百年、两百年以后，有人会捡到，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有这样一批人，这样活过一次。他们是一些有趣的人，做过一些有趣的事。

笔谈

吴国光
郭建
胡平
李大同
高瑜
蔡霞
林垚
李厚辰
李聿脩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编按：60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毛将其命名为“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它不再是以改变政治、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而是深入到人内心、并且不限于人内心的彻底革命。它缘起于毛泽东为首的高层分歧和内斗，转而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清洗、铲除明显的和想象的对手，进行所谓“路线”斗争。最高领袖的神化，普通民众的狂热，无尽的“阶级斗争”，法律的荡然无存，个人自由的完全丧失，等等，是那段极端、癫狂岁月突出的特征。据统计，“文革”至少造成200万人死亡¹——换言之，平均每年至少20万；受迫害、牵连者，则难以计数。

对“文革”的反省、评价一直是一个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曾被毛泽东迫害的共产党元老的推动下，官方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十年内乱”。但是，他们只是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没有、也不愿意追溯到共产党政权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性质。不过，他们还是推动了有限的调整或改革，包括反对个人崇拜、主张“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健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得专制统治有明显缓和。

但是，官方这一有保留的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被一些人接受。例如，1990年代浮出水面的、被称为“新左派”的学派，就认为“文革”有“大众民主”的创新值得发掘、借鉴²。除了新左派，还有一些人也转而怀念文革，进行浪漫化描述或想象，认为“文革”时期平等、公平、官员廉洁。受教育程度较低、阅读面较窄的普通民众，则相当普遍地不了解官方对“文革”的定性，长期陷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中国政治观察者认为，“文革”不太可能重来了，因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自2012年以来，整个世界目睹了新强人、新极权主义统治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习近平并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依赖体制、官僚机器，在这一点上更接近斯大林而非毛泽东。但是，推动个人崇拜、追求绝对权威等都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毛泽东形象。他还将官方对文革定性修改成了“艰辛探索”，渲染“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经历对自己的培养。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上述关于“文革”的评价？中国人对“文革”的反省问题何在？“文革”对于当今中国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向后人讲述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吴国光、郭建、胡平、李大同、高瑜、蔡霞、林垚、李厚辰、李聿脩等9位专家和评论人士进行笔谈。他们中大多亲历过“文革”，也有80后、90后新生代学者。



吴国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谈论文革，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文革”。一般认为，这是指1966至1976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运动。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只有1966-1968那三年的政治运动是文革。这种分歧显示的是对文革性质的不同解读。“三年文革论”者认为那是一场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造反运动；“十年文革论”者（主要是毛后中共领导层），则指这是一场社会动乱。我取“十年文革”的说法，但不赞成上述“十年论”者对文革性质的定义。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由专制政治制度的

独裁者所制造的政治整肃、思想洗脑、文化毁灭、社会溃败和经济灾难，其突出特点是对于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粗暴践踏。六十年后的今天，当在中国乃至美国都有人惊呼“文革重来”的时候，我想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符合我对文革的定义的。

但是，我不否认“三年论”者所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文革在其早期呈现了民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意愿。事实上，如果没有民众的这种强烈意愿，独裁者是不可能发动起来这场运动的。这一点，即使在毛后中共领导层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1981年12月，刚刚当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过：“今天估量‘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那就要看现在台上的势力是不是比它更为腐朽。”³这等于说，作为文革的代表毛主义原教旨派（即所谓“四人帮”，其实应该加上毛泽东本人）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文革前的中共台上势力本来就“腐朽”了，而后毛时代的中共台上势力还可能更腐朽。

所以，不管何时，文革重来，有其原因。但是，有原因如此并不等于就应该如此。六十年后反思，我认为，腐朽势力掌权和文革重来一遍，恰恰是一对“甲生乙、乙生甲”的循环共生关系。胡耀邦用的“腐朽”这个说法可能不那么准确，所指当为腐败，即权力的腐败及与之伴随的种种现象。这包括权力本身的滥用、腐化、为所欲为，也包括社会的贫富悬殊、不平等与不公正，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文化、道德等观念形态不仅无力矫正，反而大力促发这些现象。但凡建制如此“腐朽”，人们难以通过建制解决问题，则反建制的情绪必然高涨，类似文革初年的表现就有可能爆发。而通过这种并非源自公民社会、也非追求个体权利的情绪爆发，专制者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心者也可能借此走向专制；惟专制制度下“腐朽”依然故我，乃至变本加厉，继续制造腐败、不公和民众的无力感等等，形成一个死循环。

也许可以将之称为暴政与暴民的循环共生关系，但必须强调暴政是其中的关键。有人提出所谓“文革的土壤”一说，意指文革现象的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基础。我相信文革现象背后确有深层机理，但认为，与其归因于民众，不如归因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垄断的权力即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也就总会为“文革”现象制造土壤。独裁者可以“恣意”，而独裁者如果具有掌控民众的力量则倍加“妄为”；前者对文明的践踏可以类似文革，后者则必定是文革的全方位、全过程再版。



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我想简短地提出几个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的边缘问题，想说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反省还远远没有完成。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提出问题，不展开讨论，也不必有结论。

1. 出口转内销的文革毛主义

在文革发生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群众造反运动：反体制，反文化，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同性恋者权利、性自由，挑战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被“运动”；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者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此时也正是西方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开始形成的时代。一些左翼理论家隔雾看花，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偏爱毛时代的中国，以为那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他们这种盲目借鉴，就使得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融进了不少“文革毛主义”（即在1966-1976年间逐渐形成、发展，最终大行其道的最激进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理论界反思文革，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本是从与文革及中国现状较为切近的地方开始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回顾五四传统）、存在主义、现代心理学、现代派文学等。但是，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些专注于新鲜理论的国内学者和在国外深造、追随理论大潮的华裔学者，便致力于引介反叛启蒙传统、解构现代民主制度的西方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将这套理论全盘套用到中国。他们不见或无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文革阴影，不顾中国远没有实现现代民主这一现实，而大谈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并推崇文革毛主义为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先声。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比，他们称毛时代的中国为“激进的民主社会”，而后毛时代的政治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文革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西方文化霸权使中国失去了自我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说是重建自我认同的伟大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⁴

2. 造反派脸谱化和造反派情结

“造反派”主要是指随着1966年10月文革第二次启动应运而生的造反派组织及广大成员，或称“造反派红卫兵”。我想要提出的是两个

问题：一是官方历史、官方宣传及大众媒体中造反派的形象问题，二是当年的造反派如今如何评价自己的问题。

官方宣传投鼠忌器，淡化毛泽东的罪责，把紧跟毛的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混为一谈，将领导文革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指称造反派为他们的追随者。在多年来政府压制文革记忆，有意造成集体遗忘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如影视节目）的传播又加以歪曲，以至于在年轻一代的印象中，文革期间大部分干部和群众都好，而造反派则是一小撮兴风作浪、罪有余辜的坏人——但事实是当年很多群众参加文革运动，他们大部分都是造反派。

我要提的第二个问题叫做“造反派情结”，是指当年的造反派如今在反思文革时出现的一种尴尬状态，可以说是缺乏反省。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响应领袖的号召，是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乃至最终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想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

造反派情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一个是毛泽东利用群众摧毁政敌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群众“趁机造反”——是反抗迫害、反抗官僚体制、争取生存权利的文革。趁机泄愤的个人行为自然不能排除，但在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造反行为作为一个集体对抗体制的运动，并没有引发革命，也不太可能引发革命。而且，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

“人民革命”论背后是一个能否为造反派正名的问题，即造反正义性的问题。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多半是当年的造反派。在他们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但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当年的造反也就是正义的了。

造反派情结还表现为对罪责的躲闪、规避。文革有两次死人高潮，第一次是1966年老（红五类）红卫兵屠杀无辜的“红八月”，第二次就是1968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时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研究者说，清队罪责的首要责任人是在革委会中真正掌权的军代表，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抄家、审讯逼供、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成员。他们的责任难以推卸。

还有学者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受迫害的最大群体。造反派的确被利用、被抛弃，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被扣上“5·16”之类的帽子遭到整肃，有些地方还出现过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情况……尽管如此，“最大群体”的说法在事实面前还是站不住脚。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什么派都不是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而且什么派都想躲开他们，还都参与了对他们的迫害。⁵

3. 华裔知识界的新膜拜与文革的世界性

近年来，川普（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其背景是被称作“川普革命”

的右翼群众运动。美国当下的政治状况中，有诸多因素可以被看作当代超越国度的“文革”现象，如领袖号召群众造反，“砸烂国家机器”，颠覆现存体制；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以阴谋论攻击、迫害政敌；反智，反科学，反文化；个人崇拜等等。

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中和中国大陆知识界，有很多人成了 MAGA 运动的狂热追随者。这个现象在一个支持川普竞选的标题为《一个人的革命：震撼世界的特朗普浪潮》的视频广告中可见一斑。⁶而且，那些被称作“弹幕”的评论如“天选之子”、“蒲蒲加油”、“未来被写入历史课本，称为：红帽子运动”、“泪眼川皇”等等也反映出观众的情绪。

“红帽子”是指许多川普支持者喜欢戴的印有 MAGA 字样的垒球帽，但在这个具体的场合说“红帽子运动”，显然是为对应中国文革初期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还真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成为热情的 MAGA 支持者。他们早就扔掉了红卫兵袖章，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民主派，对当年响应领袖号召造反的经历，早已有过深切的懊悔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在摒弃毛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之后，以类似当年的执着与热忱来拥戴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并不掩饰独裁意愿的政治领袖，而且伴有“天选”、“川皇”之类近似“万岁”的回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⁷



胡平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今年是文革 60 周年。在 60 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文革，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层意义。

1、正如昆德拉所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我们反思文革的第一层意义就是，反抗中共对文革的歪曲、抹杀与遗忘。在国内的言论空间日益压缩，“文革”几乎成为敏感词的今天，我们的记忆尤其重要。

2、我们再次反思文革的第二层意义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反对暴君以其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上。研究文革期间的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学者米鹤都，在概述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时写道：“从‘八一八’我们拥向金水桥边，到‘四五’运动我们齐聚纪念碑下，这一箭之遥，我们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文革初期，这一代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达到巅峰；十年后的四月五日，就在毛还活着的时候，就在毛历来接受臣民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地方，我们对暴君说出了“不”。

在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毛的最大罪恶，就是让七亿人只准有一个大脑。毛使自己成为巨人，是以我们都成为侏儒为代价的。因此，一个人，只要你还有自尊心，你就该批毛反毛。基于同理，我们必须反对习一尊。

3、再次反思文革的第三层意义是，认清我们的来路，面对未来的挑战。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的是政治迫害，尤其是针对思想和

言论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这就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文革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自发生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内生性。以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为例，我们不同于容闳、严复、梁启超和胡适。我们成长于极端封闭的毛时代，没人留过洋，没人有什么家学渊源，没人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式教育。在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西人和前人有关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如此稀缺，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从自身的经历与反思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也包括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包括一些中共党内的、乃至身居高位的人士。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理念的基础和热烈而真诚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一波接一波的自由化浪潮。不但中国是如此，其他共产国家也大同小异。尤其是蒙古。当蒙古国的自由化浪潮高涨，在 1990 年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转型时，蒙古对西方的开放程度还比不上中国，况且蒙古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绝不比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包含更多的自由主义因素。

上述说明很重要。既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诞生于中国本土，那就不存在所谓西方式自由主义是否能移植中国这个假问题。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来时路，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抗争更有底气，对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在文革发动 60 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原“冰点周刊”主编）：讨论文革，不是看它的表现形式，也不是看文革中发生过什么、为何发生。主要是看文革得以产生的基

础条件，以及是否发生变化和这种变化是不是可逆的。

概括起来说，60年前文革得以发生，大致有如下几个条件，我称之为“毛政七柱”：

- 1) 国家有一个超级魅力型领袖，无论精英层还是芸芸众生，都对他顶礼膜拜，这使得领袖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 2) 国家掌控一切意识形态灌输工具，长年对全民进行洗脑教育，制造出大批毫无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的“脑残”民众。
- 3) 国家掌控所有生存资源，任何人若不依附体制必无法存活。1980年我刚当记者时，遇到过母子三人手持官方批准外出乞讨的介绍信行乞之事。当时我目瞪口呆：“难道乞讨也要官方批准？”母亲说如果没有介绍信，他们娘三个路上就会被公安抓走。中共政权对每个人的生死控制，竟能到这个地步，绝对独步世界。
- 4) 国家暴力机器无条件地效忠领袖个人，在实施党内外镇压时，没有任何法律底线和人权底线。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发生的对政治贱民（“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包括婴儿在内的野蛮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毫无区别。
- 5) 国家闭关锁国，严密控制任何外部信息的输入，中共官员阶层和知识界对世界的无知，乃是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以降最不堪的，这种无知导致整个国家上层统治集团的粗鄙化。
- 6) 无论何人，只要不顺从、不驯服于中共及其党魁，必遭国家对其个人及其家人的有组织的迫害，由此制造全民性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成为毛时代中国人高度内化的精神特征并延续至今。
- 7) 整个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能够制约中共及其党

魁。一切政权组织或社会团体，均为中共的花瓶、仆从和帮凶打手。

以上七个方面，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特征，更是“毛政”的基础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支撑，才产生中国人经历的十年文革浩劫。这七根毛政支柱去掉哪一根，文革都不可能发生。文革是毒树之果，而“毛政”是毒树之根脉。不彻底清理和埋葬“毛政”，文革非但不会离去甚至能出现比文革更为丑恶与极端的历史丑剧。

而今“毛政”的七根支柱依旧存在，中国国运劫难、国人命运悲剧的重演，也会在所难免：

- 1) 个人崇拜（即权力崇拜）这根柱子从未倒塌。尽管不如毛时代那样光鲜，但官方强制“定于一尊”、维护“核心”、“不许妄议”，鼓吹个人崇拜更甚于“毛政”时期。
- 2) 意识形态洗脑的机制丝毫未变。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大学，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被强迫洗脑长达几十年。整个中国教育，严厉排斥批判与质疑精神，视独立思考者为异端，以政府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前几年网上热传一帖文：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几十年后被拉入他的小学同学微信群。他惊讶地发现小学同学微信群讨论的话题与观点，与他的清华同学微信群惊人相似。他极其困惑地发问：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相差甚大的两群人怎么会有这种共性？
- 3) 国家垄断所有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政府的附庸，其合法资产缺乏法治保护。近十多年来对民营企业家的掠夺手段更加卑鄙凶残，早已超过薄熙来在重庆的“唱

红打黑”。中共通过对外窃取发达国家科技，超大规模山寨仿制，实行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于世界市场而获取暴利；对内敲骨吸髓，榨干人民血汗却不提供任何基本福利保障。毛时代体制对个人生死与生存状态的予取予夺，实质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 4) 统治更加依赖国家暴力机器。毛时代国家暴力还有意识形态遮掩——所谓“群众专政”，而今政府使用暴力更加公开化和野蛮化。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暴力驱赶“低端人口”；各地民众毫无言论权利，被警方动辄“喝茶”训诫、关押、判刑；政府强拆民房和强占土地、城管街头暴打小贩、交警野蛮拖拽骑车人等，造成血案已成常态。更有世界罕见的荒诞惊恐场景，众多军人皮靴正步踩踏进入人大会场，以此逼迫人大代表顺从强权意志。
- 5) 评价社会进步，不只是看发生了哪些变化，更要看是否形成不可逆的国家进步机制。所谓改革开放，被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在有利于统治的边界上，从来就没有对世界真正开放过。中共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将互联网改造成“中国局域网”，封锁一切对统治不利的外部世界信息；政府收缴国民护照，限制国民出国旅游留学……曾经有过的对外开放已经逆回去，再度推行闭关锁国，曾经废除的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竟然通过修宪逆回去以图连任到死。

第6与第7两根支柱基本是原装，不必多言。

回顾毛死后的近五十年，“改革开放”不过是又一个术语陷阱，中共固守“四项基本原则”，寸土不让。所谓改革开放的历程，究其实质是中共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步满清后尘，是中共统治阶层闭

关锁国的“2.0”或“3.0”版。

归根到底，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文革，而是“毛政”。“毛政”一日不除，中国人民的劫难就一日不会终止。摇滚歌手崔健曾说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不管你多大年纪，“只要毛像还挂在天安门上，我们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信哉斯言！



高瑜（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我讲两点：

1、总体看，一个甲子，“文革”并未停止。被中共官方认定的“十年浩劫”——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个甲子了。这场号称“革命”的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实际是源自法西斯主义与史达林模式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的一场疯狂的政治实践。

这里需要对“一个领袖”作一点说明，文革十年，维护的只是毛泽东一个领袖。这是文革最核心的内容，使得他的“个人迷信”达到空前绝后的顶峰，“四个伟大”和“红太阳”成为他个人的专属名词。

- 1) 1967年1月他用破坏宪法的“公安六条”为他大搞“个人迷信”保驾护航，保障他可以随意发动群众摧毁党和国家原有的官僚体制，达到他清除身边“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政治目的。
- 2) 1975年，他将“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个人理论写入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使得他的“文革理论”成为中共全党奉行的指导思想，决定国家的治理方向。

3) 毛泽东文革中的指示更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运动爆发与演变的核心驱动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前 17 年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建立起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对外使得国家陷于空前危险和孤立，前苏联差点发动对华核战争；对内造成政治高压、社会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法治无存、文化教育断层；人道灾难空前惨重，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2、“六四”屠杀是“文革”继续最明显的证明。37 年前发生的“六四”大屠杀，是 1976 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位“文革”台上派发动“怀仁堂政变”、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之路的终结。责任在邓小平，他可以调动几十万野战军镇压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主运动，血洗北京城。他权力的依据，依旧是文革建立起来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从这一点看“六四”就是“文革”的继续。

邓小平在 1970 年代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后，马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阻止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界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他主导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却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只做“三七开”，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也就是肯定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 讲话”），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982 年 12 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82 宪法》，一直被中共宣传为建立了反对个人专制的硬性制度——实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限

任制，并归功于邓小平。这种宣传并不是全部事实。《82 宪法》实际是为邓小平量身定制，只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做了限任制，唯独不包括邓小平担任的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实际就是将毛泽东文革中建立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独独保留给了邓小平。这也是文革的一种继续。

正因此，邓小平在 80 年代，只用一句话就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政治运动，连续拿掉三个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屠杀之后，中国陷于世界孤立，邓小平被迫交出军委主席职务，但是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南巡发表讲话，启动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这充分证明文革中建立的个人专制的硬性国家制度在中国的韧性。

正因为中共这种专政制度的韧性，十八大之后公然提出“两个 30 年互不否定”；2018 年第 5 次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任期限制，向毛时代的终身制全面回归。“清零 3 年”之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全面陷入危机之中。



蔡霞（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自 1978 年底以来的将近五十年，中国始终被“文革”重来的阴影笼罩着。尽管社会各方精英和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一再发出反思文革的呼声，然而不仅反思文革本身成为禁忌性话题，而且现实生活中比文革更甚的历史倒退现象一再出现。或许我们在讨论反思文革的同时，也需要对反思的“反思”作一些探究。

反思的“反思”要从1981年中共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说起。

1980年10月，中共举行了有党内高级干部、部分理论研究者、军队高层将领参加的内部“4000人大会”，就如何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争论激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大量尖锐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压制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正是在这一基调上出台的《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在当时推动了中共党内扫除思想障碍，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彻底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及毛思想，使此后至今近50年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的思想基础、制度痼疾和社会心理条件依旧存在。习近平上台后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历史倒退，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粗略说来，这个《历史决议》有三大问题：

1. 《决议》在本质上是一份高度政治化的总结性文件，其政治功能远大于史学意义上的详尽考证与多角度剖析，为遮掩历史真相、限制对真实历史的深度公开讨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邓小平强调《决议》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对史实的追溯“宜粗不宜细”，这使得60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许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文革真相，甚至把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时期曾经流行的做法当作是薄的“创新”之举。

2.《决议》对毛泽东的“罪错”和毛泽东思想作诡辩性的切割分离，把文革劫难的责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把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甩锅给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给清算毛泽东设置禁区，阻止了本来还能继续推进的思想解冻和理论解构进程，从而一方面使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被继续禁锢在以马列毛为圭臬的精神枷锁之中，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对毛泽东时期的扭曲记忆和错误认知，纵容民间的“仇富”心理和仇视现代文明，使得文革式思潮在中国仍有厚实的社会土壤。

3.《决议》虽然指出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严重制度弊端，但回避了事实上存在的“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独裁”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由此就无法深刻认识为何领袖个人的罪错，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和长时间的全国性内乱等民族浩劫。这不但无法避免类似文革劫难的再次发生，而且将“党的领导”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使得中国难以走出百年动乱的历史迷途。

最后，如果把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及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苏共与中共的历史道路和国家命运的分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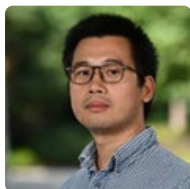
简单说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启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为30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埋下了历史伏笔。而邓小平的阻挡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使中共未能实现“去毛化”，并进一步将中共和中国锁死在“四项基本原则”内，一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触动中共体制深层矛盾时，所谓的改革就寸步难行。

就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勃列日涅夫的十七年停滞时期后，戈

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的改革力量重新启动历史前行的齿轮，最终迎来颜色革命。尽管俄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方面还路途艰难，但毕竟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中国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改革基本停滞。胡温时期，尤其是胡锦涛第二个五年任期时，用“不折腾”来抵御来自党内外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两面夹击，最终把一个本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可能前景，生生地反转成习近平上台当“毛二世”，用超过毛时期的高压恐怖统治，使国家陷入长夜无尽的黑暗时期。

就此，关于“反思”的反思十分必要。



林焱（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学与哲学研究者）：文革虽然早已过去，但文革结束后官方“反思”对其的定调，却一直在误导与扭曲着中国社会对文革以及对公众政治参与的认知。文革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极权的党国体制；至于被广泛用来代表文革的种种符号，譬如大字报、红卫兵、武斗等等，追究到底无非是极权体系强行制造的伪社会运动，是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提线木偶，是指哪儿打哪儿的政争工具。最高领袖想要炮打司令部，大家就炮打司令部；想要斗倒接班人，大家就批判接班人是内奸工贼；想要侮辱知识分子，大家就揭发知识越多越反动。

反过来，文革期间但凡胆敢写大字报为接班人辩护、敢批评最高领袖的路线政策，最终遭遇都是像遇罗克、张志新那样，被逮捕、被监禁、被割喉、被枪毙。更一般地说，在极权体制下，什么红卫兵、武斗、

工宣队、破四旧，只要能做的，必然都是在最高领袖授意下才做得，说话办事都要揣摩最高领袖的心思。今天最高领袖随口一句话，马上会有一堆“红卫兵”像饿狗扑食一样，争抢对“最高指示”的解释权。明天最高领袖改口了，马上又会有新的“红卫兵”应运而生，又后来居上。今天最高领袖觉得可以利用“造反派”去打倒“走资派”，明天最高领袖觉得某些造反派不太有趣竟敢去打扰军队系统，一翻脸就可以下令镇压。说白了，文革时代根本没有什么“造反派”，无非是“清君侧派”、“勤王派”、“颂圣派”、“揣摩上意派”、“为王前驱派”罢了。

换句话说，文革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与大众民主。然而后文革时代的官方话语，当然不会触及这一层制度根源，所以除了口头上嚷嚷要防止个人崇拜之外，只好避重就轻舍本逐末地去禁止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顺便借机打压一下西单民主墙等真正来自民间、对专制政体构成压力的呼声。

然而官方这种瞒天过海的洗脑之术，却被包括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于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知识界盛行起所谓“告别启蒙”、“告别革命”、批判“庸众”、怀疑大众民主、怀疑社会运动的思潮。这种观念不仅在后六四时代风生水起，而且被大中华主义者用来批判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与“反送中运动”等等。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被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套用到外国语境下，尤其 2010 年代中期以后，针对美国民间反思种族主义遗产的思潮（譬如主张拆除内战时代支持奴隶制的邦联人物雕像），极尽夸张地大喊“白左要破四旧了”、“美国闹文革了”，全然不顾民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自我革新，与极权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所谓“文革”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条件反射式

的混淆，正是过去四十多年官方话语的洗脑结果，也让许多中国自由派在 2010 年代一股脑地倒向了欧美极右思潮、成为了特朗普的粉丝。讽刺的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极右翼在权力加持下有恃无恐地大搞反智政策并破坏民主体制，恰与毛时代高度相似。

可以说，对文革本质的恰当理解，不仅对当代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就连在当代美国也忽然息息相关了。



李厚辰（公共知识分子、“翻转电台”主理人）：

60 年后，1976 年见证文革结束的人应该不会想到，我们今天可以离文革如此接近。2025 年 12 月初，电影《芳华》的解说视频席卷网络，其第三期，数天内达到 1600 万次播放。其中明确表达文革是“未完成的伟大实验”，并将改革开放称为“政变”，赤裸裸地利用《芳华》男主角黄轩的外貌影射王洪文，甚至“黄轩 = 王洪文”已经成为网络热梗。直到该视频被网信部门删除。

在“Bilibili”（中国知名视频网站）上，崇拜毛泽东，崇拜王洪文，怀念文革已经不是亚文化，而是平台主流。60 年后，我们再次离文革如此之近。

但实际上，已经深度市场经济化和金融化的中国，离文革又非常遥远。今天的中国不存在伟大领袖与官僚系统的对抗，也不存在要利用民粹力量颠覆官僚系统来掌握权力的空间。今天的人即便怀念想象中并不存在的文革之“公平”，也不可能接受文革的贫困，也不可能怀念被浪漫化的“人民尊严”，也不可能接受高强度的革命动员，搞上山下乡。甚至如今要让城市青年接受绝对平均主义，或在既有产权制度下，要

他放弃自己的 iPhone17，改用红米手机，也有相当难度。字面意义上的“文革复辟”我想已经不再可能。其实 60 年后，我们离文革已经如此之远。

这里需要被理解的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数字化、道德化的群众政治。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再被允许组织搞武斗的线下团体，却可以在线上被算法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动员，变成网络暴力群体。年轻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拥有最终裁决权，却可以在党、网信办、平台的裁决权下，充当最基础的网络批判力量。在 2026 年，群众激情动员并不游离于官僚机器之外，而是已经与官僚机器深度共振。国家通过网络审查、算法控制、热搜整治、评论区操控，再加上新的 AI 全面渗透，已经学会驾驭无序的群众道德激情，虽然并不总是每次都有效。

从此，中国的制度问题、分配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某种敌我问题，某种道德对峙，不管是阶级、性别、国家还是什么。国家精密地控制着草根的激情与愤怒，在国家设定的轨道内释放某种文革式的道德激情。这是比毛时代更精致、更高超的“权力”，如同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的描述：这是一种“生产性”的，“针对行为的行为”（conduct of conducts），而不只是一种压迫。这种权力逻辑，对于社会是窒息和恐怖的。

文革之近，在其与 60 年前一样，是一种被动员的草根道德激情。文革之远，在于其已经不是 60 年前失控的社会运动，而是被牢牢编织在权力网络中的，被驾驭的激情。所以现在无法像文革一样以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被简单终结。这股激情将一直伴随着中共的庞大统治，直到“权力”被彻底改变的一天。



李聿脩（《中国民主季刊》编辑）：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叫《肚子里的战争》，讲文革期间医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医院里没有医生了，就从部队里揪了一伙工农兵卫生员来当医生。有的甚至还只是部队的骡马卫生员，连兽医都不算。医院安排就这样的人给病患开膛破肚“掏下水”，而且每回都让生手来做手术，美其名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毫不意外，这伙大老粗对“人下水”一窍不通，把肠子掏出来翻了三个小时都找不到阑尾。

王小波调侃说还不如请他来做手术，他虽然同样没学过医，好歹修好过一个闹钟和一台手摇电话机。他说他就不信这伙人不知道自己在胡闹：他们跟借酒劲撒酒疯的人差不多，明知道是胡闹，但胡闹很开心。1986年有部电影叫《性命交关》，也讽刺过这种事，可见并非个案，只不过这回负责给人“掏下水”的是医院炊事员，好歹料理下水算是半个内行。

王小波这篇杂文举重若轻，把整个文革都浓缩在里面了。相比之下，读季羨林的《牛棚杂忆》未免太折磨人了。毕竟季羨林对文革的反省，归根结底就是“折磨人”三个字。这恐怕也是后来年轻人回避文革历史的重要原因：有太多暴力、太多肉体上的疼痛、太多精神折磨……层出不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文革结束迄今50年，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省早已式微，但批判远没结束，甚至谈不上彻底。现在当局反而加强思想管控，民间嘲讽“反思怪”的妖风还大行其道。风气如此，文革遗老遗少出来兴风作浪就毫不奇怪了。

文革怀旧逆流成因十分复杂。冷战结束以后，中东欧各国也出现了怀旧现象。提摩太·埃希（Timothy G. Ash）对此的解释是：因经济发展迟缓、体制低效和现代化不成功，本来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意外保留了 19 世纪文化特征，结果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保守效应”；现在人们的怀旧对象就是被“冷冻”保存下来的、“老欧洲”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彻底切断了现代与传统的传承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还高速发展，这两点很不同于中东欧的共产主义时代。但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政治社会却趋于停滞。文革怀旧逆流与其说是“沉渣泛起”（许章润语），不如说像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小说《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那样，是政治社会发育停滞造成的怪胎。这种“停滞”与被“冷冻”保存的中东欧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中国社会发育“停滞”从根本上讲是对文革反省不彻底造成的——遗老遗少们非但不觉得文革有错，反而觉得有必要再搞一次。

2010 年出版的《后共产主义怀旧》（Post-Communist Nostalgia）将怀旧归因于安全感缺失、社会地位落差、对现状不满、对生命意义之捍卫等等，没有一个是复辟共产主义政权。中国的文革怀旧逆流恐怕兼而有之。即使习近平复辟极权主义，也不能满足一些人狂开历史倒车的胃口。在一些几乎不读文革历史的年轻人那里，文革被幻想成“激情燃烧的岁月”。但这只是浪漫化想象，历史文献中全是灾难。

文革结束至今，普通人在观念跟习性方面有什么长进呢？至今毛泽东语录仍常见于年轻人的口头禅。至今有人把“枪杆子里出政权”奉为社会变革圭臬（实际落后时代近百年）。一遇到不同意见就要“打倒”、“消灭”、“铲除”。一提到社会问题就想杀人泄愤。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凡表达意见，必先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问候一遍。种种崇尚暴力、轻侮知识、且独断专行的观念和流氓习

性，与文革时代一脉相承。甚至在不同政见群体中，文革式思维习惯也依然清晰可辨。假如你自己都抗拒革新，怎么能指望你去推动社会变革呢？

注释

- 1 参见宋永毅“文革中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读苏扬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http://www.cnd.org/cr/ZK11/cr651.gb.htm>。
- 2 参见郭建“当代做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三月号，总第48期。
- 3 邹雅林，“七见耀邦的情形和感受”，《百年潮》，2010年第7期，页50。
- 4 参见钱索桥主编：《毛泽东时代的海外中国及其回归：一部两幕式的跨文化喜剧》（“Mao’s China Abroad, and Its Homecoming: A Comedy of Cross-Culturing in Two Acts,” *Cross-cultural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hang Longxi*, edited by Qian Suoqiao.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5: 259-279）。 “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第93期，2006年2月：29-39。“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二十一世纪》，第94期，2006年4月：19-25。
- 5 参见郭建“造反派情结’的缘起、延伸及影响”，《思想》，第32期，2016年12月：57-92。
- 6 视频广告，见：<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oi4y1L7zk>。参见郭建“美国的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思想》，第45期，2022年7月：81-122。“阴谋论与觉醒文化：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宋永毅、夏明编，美国华忆出版社，2023：407-449。

郝志东 | 作者郝志东为澳门大学荣休教授、社会学学者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文革思维：从苏 区反 AB 团和延 安整风到平定土 改和文革（下）¹

编按：“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一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思维”，它“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先生说。今年距文革发动整整60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纪念中国当代史中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视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惨痛悲剧之一。

四、暴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本节将首先提供统计数据，说明在平定土改和文革中以革命为名的暴力达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目的和手段问题。

我们不可能获得平定土改死亡人数和受影响家庭总数的准确数字，但档案统计数据和访谈数据基本可以告诉我们暴力的程度。在我们的采访中，我们询问了在整个土改期间，包括整风运动、除奸反特运动、土改和挖浮财等运动中被打死或自杀的人数。累积的数字往往相当高，一些村庄的杀戮人数比其他村庄多（见表1）。

表1：平定县12个村庄和1个城区死亡人数总计

村名	村里的总人数	殴打死亡人数	自杀人数	死亡总数	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山底	2000	7	1	8	0.40%
大石门	1900	3		3	0.12%
东郊	900	8	4	12	1.33%
南屏	2300	21		21	0.91%
南上庄	2000	21		21	1.05%
权黄	600	14		14	2.33%

石门口	1300	2	2	4	0.31%
西郊	2000	17	2	19	0.95%
小桥铺	1110	3		3	0.27%
平定城区	1100	36		36	3.27%
王家庄	1700	102		102	6.00%
宋家庄	1300	5		5	0.38%
东回	1000	29	5	34	3.40%
总计	19210	268	14	282	1.47%
排除掉死亡人数超过 1% 的村庄 (上面 粗体)	14810	87	9	96	0.65%

数据源：访谈笔记。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当时的平定县大约有 29 万人口。如果死亡率如表所示为 1.47%，那么全县死亡总数约为 4263 人。但是我们在采访时也询问受访者周围村庄是否有人死亡，他们的回答是并非每个村庄都有人死亡，²尽管从我们的采访和档案数据来看，似乎大多数村庄都有死亡。如果我们把死亡人数超过 1.00% 的四个村庄排除在统计之外，那么总数平均可能会达到 1879 人，死亡率为 0.65%，即全县近 2000 人。估计平定的死亡人数可能在 2000 到 4000 人之间。这个数字应该大致不错。我们在土改一章有更具体的数据。

1947 年的一份文件总结了 7、8、9 三个月一个行政区八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并报告说共有 35 人被杀或自杀，平均每个村庄略多于 4 人(见表 2)。³但这些只是一个时间段的数据，总体数字应该要高得多。这些数字也补充了我们上面的采访数据。

表 2：一个地区死亡人数的档案数据（1947 年）

村	被斗争的家庭数	被杀的地主和汉奸人数	自杀人数	死亡总数
柏井	21	3		3
柏木井	13	6	1	7
张家岭	4	0	0	0
新关	4	2		2
旧关	7	2		2
大梁江		7	0	1
小梁江	6	1		1
固驿铺	19	14	5	19
总计	81	28	7	35

数据源：“七、八、九三个月来的群运概况”，平定县档案第 47 卷。

暴力很普遍。中共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报告说，土改的情况是“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⁴ 在平定，情况也大致如此，尽管并非每个村庄都有人被打死。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暴力。地主富农们即使没有被杀，他们也仍然会受到斗争，有的被“扫地出门”，靠乞讨谋生。⁵ 一些人就是这样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吃，自生自灭了。比如巴启生（小名），他和村民关系很好，没有挨打，但还是被剥夺了一切财产。他的妻子嫁给了别人，他饿死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⁶ 我们的访谈数据表明，被赶出家门后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相当普遍。

在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东和广西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杀戮。但在平定，虽然冤案多达 3112 起（表 3），但非正常死亡人数要少得多（表 4）。自杀人数多于被打死人数（表 5）。官方宣称死亡人数为 70 人，非官方数字约为 160 人。⁷

表 3：平定县文革期间被定罪的人数

犯罪种类	被定罪人数	被斗争人数
现行反革命分子	254	153
叛徒	57	24
国民党特务	36	8
地主	2	3
富农	6	
坏分子	84	48
右派	9	2
历史反革命	226	74
有严重历史问题者	1680	
贪污、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者	758	30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
落网的地主和富农		5
总计	3112	352

数据源：平定县档案馆，《平定县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表 1、表 2，1974 年 4 月 10 日。

我们看到大多数被指控的人都是所谓的“九类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没有被定罪，但是被斗争了。实际上当权派被斗争的数字远远超过这几个。

表 4：1966 年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	整党	其他	总计
死亡人数	21	38	3	8	70

“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来自于平定县档案馆，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落实

办公室汇编的《1966年下半年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这些死亡大多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如前所述，实际被斗人数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表 5：1966 年以来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原因	为逃避惩罚而自杀	酷刑后自杀	因不了解政策而自杀	被打死	总计
数据	1	10	53	6	70

与 1940 年代的土改相比，文革死亡人数要少得多，为 70 人（或 160 人）而不是土改的 2000 到 4000 人。其中文革绝大多数是自杀（见表 5），与土改也不相同，土改大多数人都是被殴打致死。然而文革中被逮捕判刑的人数相当多，超过 3000 人。虽然平定因文革死亡的人数与土改相比要少得多（在全国范围内文革与土改的暴力死亡人数相若），但仍然存在各种暴力。暴力仍然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暴力呢？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文革思维强化了敌我之分。为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的纯粹目的，人们认为消灭任何剥削劳苦大众的阶级敌人，是完全合理的。换句话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可以无所不为，包括暴力。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背后是否有理想主义的思考，这一点是有争议的。⁸ 共产党对文革的解释是毛想创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大陆的许多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左翼，仍然相信这个说法。毛认为在这个纯粹的社会里，共产党内既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资本主义。但

他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也未能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愿景，即把全国建成一所大学校，这里每个人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

其他人则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失去权力：他当时已经无法控制刘少奇和周恩来领导的党的官僚机构，他也害怕别人会把大跃进的失败和之后的大饥荒归咎于他，就像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一样。毛想先发制人。

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存在：无论理想多么崇高，难道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难题。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两难境地，即责任伦理（其追随者愿意使用可疑或危险的手段来实现道德上的良好目的）和道德/心志伦理（其追随者相信做正确的事，从不使用可疑和不道德的手段）之间的矛盾。⁹前者面临邪恶后果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是非常大，后者将面临一个人的目标可能受到损害、甚至经过几代人努力也恢复不起来的可能性。但是韦伯认为邪恶也不一定只会伴随着邪恶，善也不一定只会伴随着善，因为这个世界是非理性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伦理可以告诉我们，道德上的良好目的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伦理上的危险手段及其后果合法化。¹⁰

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道德上的危险手段，包括暴力。韦伯指出，在现今的阶级斗争中，参与其中的人发现，他们的仇恨和复仇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当他们的对手被“屠杀、被指控为异端”时，他们得到了“冒险、胜

利、战利品、权力和赃物”作为回报。¹¹ 这正是在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事情，目的似乎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事实上，这里的手段似乎把目的腐蚀掉了，以至于目的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正义的纯粹社会。相反，目的变成了获得“冒险、胜利、权力、战利品和赃物”这样的奖励，并以被屠杀的对手为代价。

因此，这个问题就有了争议。韦伯总结道，“道德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绝对相反的两个东西，而是相互补充的，只有将它们协调起来才会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从事政治’的人。”¹² 也就是说，当可以使用和平手段来达到良好目的时，不应使用暴力或道德上可疑的手段。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我们在文革中看到的正是韦伯所警告的。在文革中，就像在土改中一样，主流的崇高信念是要创建一个平等和正义的乌托邦，因此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文革中的一个著名口号是要将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但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哪里仅仅是踏上一只脚那么简单或者“温柔”！文革中大约有两百万人被杀或自杀。因为受害者被视为坏人或阶级敌人，所以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殴打甚至杀害他们是有道理的。¹³ 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就是暴力。残忍被视为勇敢，杀手变成了英雄。

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的。¹⁴ 暴力、残忍、流血得到了奖赏，无视规则和法律是合理的。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刘少奇也把党置于法律之上。1955年，刘少奇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

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来处理反动派,无论检察长自己是否有不同意见。¹⁵在文革思维中,人们只要认为目的是崇高的、纯粹的、根本的,那么无论他们如何识别阶级,无论他们采取怎样的非理性思维,无论他们采取怎样的专制或暴力手段,都是合理的。于是在乌托邦与革命(用暴力动员群众)的混淆中,专制和暴力成为了目的本身。

五、文革思维和今日中国的相关性

文革结束已经 50 年了;从土改到现在,70 多年已经过去了;反 AB 团和延安整风离我们就更远了。一方面,对今日中国的审视会告诉我们,上述文革思维已经逐渐式微,至少现在官方没有号召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事实上,当政者是回避讨论阶级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现在更像是被他们推翻的阶级,他们的腐败更甚于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简单的二分法思维好像也少了一些。尽管中共仍然将公民社会视为潜在危险对手,但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公民社会组织。对网络的监控异常严格,但是人们在那里毕竟还可以隐晦地讨论一些问题。暴力也没有像革命时期那样惨烈。

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阶级斗争心态和对立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政权对媒体、宗教和公民社会的控制相当严密。许多谬误、独裁和非人化的思想仍然盛行。多种形式的国家和社会暴力仍在继续,尽管在程度上远低于土改和文革期间。本节探讨以纯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暴力为特征的文革思维,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在发挥作用。

1. 今日中国的阶级斗争与对立思维

还有一些人在坚持阶级斗争和对立思维，尽管这些人是少数，比较极端的人也经常被消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主张对反动阶级要实行专政。¹⁶在纪念文革结束 40 周年时，一些毛派人士，如在 1990 年代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先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都指责对文革的反思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并说其中一些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是将矛头指向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他们认为海内外敌对势力夸大了共产党的错误，抹黑了党和毛泽东的名字。¹⁷

这种教条思维已经超越了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延伸到了公民社会以及种族和宗教问题上来。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思维方式通常被归纳为敌对思维。2017 年的一项法律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华工作，要求他们和中国方面的组织在公安部门登记注册。他们被怀疑是潜在的敌对势力或“黑手”，可能会威胁到党的安全。¹⁸许多中国公民社会活动家和维权律师已经被关在监狱，公民社会组织从外国获得的资金赞助被切断，非政府组织被要求在其组织中建立中共的党支部。¹⁹

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合理建议往往被视为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指控鼓吹分裂主义而判处终身监禁。很多维族知识分子被关进监狱，上百万人被强制送到再教育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及技能训练。藏族企业家和教育倡导者扎西文色被指控煽动分裂主义（其实是要求加强藏族语言和文化教育）在监狱服刑四年。孩子们要住寄宿学校，接受中文教育、爱国爱党教育。正如中

国山东德州伊斯兰教阿訇李云飞所写，新疆的民族政策将维吾尔人视为异己，视为恐怖主义嫌疑人，限制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伊斯兰学校被视为训练恐怖分子和传播分离主义的场所。他称之为“文革思维”。²⁰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基督教政策也同样存在问题。政府对基督教持负面看法，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²¹ 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十字架和教堂就是这种态度的反映。但是这种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或许才真正是制造不稳定的因素。²²

2. 今日中国的谬误、独裁和非人化思维

上面的对立思维也是二分法思维。今日中国的二分法思维比以前少了，但如上所述，例子仍然比比皆是。更多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²³ 有些人不认为已故的钱钟书和杨绛这两位著名文学家是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公开挑战中国的专制和独裁统治。许多人仍然将日本和美国要么视为朋友、要么视为敌人，而忽略了其中的灰色地带。他们经常只要结论不要证据，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决定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屑于查找证据来支持或否定他们的结论，而是轻易地将人们放入一个个僵硬的类别。

2016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加拿大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问时，只是质问了记者一系列问题。这种反问只能说明王毅自己的反逻辑。²⁴ 他问：“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他假设如果一个人去过中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殊不知这个问题和去没有去过中国并没有关系。去了可以问，没有去过也可以问。他还问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中国发展了，那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人权问题。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发展和权人的侵犯不无关系。他又问道：“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我们的宪法当中了吗？”人权出现在宪法中并不意味着它被实践。这是个常识，他不应该不懂。他说：“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有发言权。”王毅显然不了解媒体的作用，也不了解人们在中国并不总能畅所欲言，那个发言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或者他假装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把记者当成“敌人”，明目张胆地说她“没有发言权”，说明即使是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会诉诸攻击批评者，而不是采用逻辑和事实推理来说明问题。这是对立思维教育、二分法教育的结果。

与上述思维逻辑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思想专制：任何人都要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偏离将受到惩罚。在中国，有一种犯罪现象，尤其是对官员来说，叫做“妄议中央”，即党的干部对党中央政策的不当之处，表示公开或非公开质疑。任志强 2020 年被判刑 18 年，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官员可能会因为公开批评党的政策而被解雇，例如《新疆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原因是被指控为犯有“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工作重大部署要求的言论；故意做出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大新闻工作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等等重大错误。²⁵就连河北省的周本顺、辽宁省的王珉、北京市的吕锡文等省部级官员也都因“妄议中央”受到处罚或逮捕。²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对研究课题、论文、研讨会和出版物实行“意识形态审读”，禁止对党国和国家领导人有任何不敬言论，禁止可能与党的政策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相抵触的内容。²⁷很多大学教授因类似的政治原因被解雇。剑桥大学出版社应中共当局的要求，从其中国网站上删除了300篇与天安门事件、西藏、台湾、新疆和文革有关的《中国季刊》文章。后来在世界各地学者的抗议下，这些文章才被恢复。²⁸中国和外国媒体都受到严格审查，任何可能违反这些原则的内容都不能出现。所有党政干部都必须“坚决拥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拥护和忠于”“习近平这个核心”。²⁹思想必须是纯粹的、政治必须是正确的。这就是思想专制。

确实，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不再像土改和文革那样杀戮和酷刑。但对人类尊严的贬低仍然比人们想象的更普遍，这在以下关于暴力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3. 今日中国的暴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为了一个纯粹和根本的目的而行使暴力，并为暴力的合理性辩护，是当今社会仍然常见的事情，比如警察暴行、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等。³⁰暴力的发生往往因为发起者认为他的暴力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例如制服嫌疑人、报仇。父母打孩子因为孩子不听话，丈夫打妻子因为妻子不顺从。但目的并不总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通常这个目的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确实，警察对持不同政见者或其他抗议者的暴行已经受到谴责——这比土改和文革时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在拆迁过程中

穿着警服、挥舞警棍、殴打畏缩在墙脚下的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受到了正当的谴责，即使他们拆掉的是非法建筑。³¹ 太原警察的殴打和见死不救导致一名女农民工死亡，也受到社会的谴责。类似的警察行为还导致北京年轻专业人士雷洋的死亡。³² 但是很多暴力事件公众是不知道的，尤其是在监狱中的暴力。³³ 谴责暴力并不一定能阻止暴力。有多少人知道乌鲁木齐党委发起了一场镇压恐怖嫌疑人的运动，而且是无视宪法和人权的？³⁴ 新疆的再教育营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是现在情况如何，人们并不知晓。

几十年来以牺牲环境 and 人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例子。遵循韦伯的思路，人们可以争辩说，快速的经济发展不必要、也不应该以平等为代价。环境污染和退化、人权的被侵犯都是不同形式的暴力，其背后都是纯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起作用。

六、结论

本文以平定县的例子为主，讨论了文革思维的特征，即阶级斗争或对立思维、谬误、独裁和非人化以及暴力，以实现其发起者所认为的善、纯洁和原教旨主义的目的。我们讨论了这种思维从苏区反 AB 团、延安整风到土改和文革的传承和演变，即基本思维方式在约一百年中间变化不大，尽管暴力的范围和方式有很大变化。文革思维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相互加强、相互补充。本文还强调了文革思维与当今中国的相关性。我们认为文革思维在当前仍然非常活跃，尽管暴力规模与土改与文革期间相比要小得多。即使如此，文革思维仍然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本文讨论的思维模式并非中国独有。正如林恩·怀特（Lynn White）指出的那样，暴力在太多地方、太多时代都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穆斯林用石头砸向一根象征着“魔鬼”的柱子，作为朝觐活动的一部分。基督徒（天主教和新教）烧死女巫和异端。《圣经·旧约》的《诗篇》139节，前一部分很华丽，最后部分是很血腥的。纳粹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经常至少部分地反对用他们所厌恶的群体来定义自己。这种暴力化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太普遍了。³⁵ 它在中国仍然如此普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也根深蒂固，的确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我们应该深入探讨文革思维及其表现在中国生成的条件。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中，有哪些是文革思维的催化剂？这种政治思维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思维相比有哪些同与不同？这些思维有没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人应该如何减少这些思维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们越了解纯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文革思维的起源和运作过程，就越能看清楚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本质，以及它在如何影响中国现在的发展。

注释.....

1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思维：以平州县土地改革以来的发展与表现为例》。本文原文题为“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wards,” 发表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27, 2018, Issue 110. 中文版略有修改。

2 采访 LBSD13-1。

3 “七、八、九三个月来的群运概况” 载于《七区群运概况》，1947年9月，平定县档案第47卷。

- 4 引自罗平汉著《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327页。
- 5 采访LBSD13-2。
- 6 访谈LNNP6-3。
- 7 郝志东、黎明，《平定县里不平定》，第515页。
- 8 有关本段的讨论，请参见华新民，“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华新民文集》（网上刊物），2008年2月22日；小鹰，“文革研究方向何处去？”CND刊物和论坛，2016年9月9日；“警惕借反思‘WG’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战友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20日（该账号现在已被屏蔽）；见前引赵信，“五七干校，一个‘地上天国’的破灭。”
- 9 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社会学论文集》[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20-126.]
- 10 同上，第121页。
- 11 同上，第125页。
- 12 同上，第127页。
- 13 陈浩武，“关于‘文革思维’的几个问题”，作者博客，载于文学城，2014年9月25日。
- 14 安尼塔·陈：《毛泽东的孩子：红卫兵一代的人格发展与政治活动》[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15 虞崇胜，“敌对思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共识网，2016年4月19日。
- 16 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论文》第18期，2014年。
- 17 前引“警惕借反思‘WG’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 18 爱德华·王：《中国批准严格控制外国非政府组织》(Edward Wong, “China Approves Strict Control of Foreign NGOs,” *The New York Times*, 28 April 2016.)
- 19 赵思乐，“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端传媒，2015年9月15日。
- 20 李云飞，《文革思维使中国民族问题陷于绝境》，中国评论新闻网，2014年7月7日。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 21 郝志东，《宗教的社会功能与中国宗教政策的改革》，《宗教与法治》，2016

年第 8 期。

- 22 关于维稳，参见乔纳森·本尼：《基层维稳：中国稳定维护机制作为冲突解决手段》[Jonathan Benney, “Weiwen at the Grassroots: China’s stability maintenance apparatus as a mea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9) (2016), pp. 389-405;] 严晓军，《巡护和谐：W 县的预防性威权主义与维稳实践》[Xiaojun Yan, “Patrolling Harmony: pre-emp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stability in W Coun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9) (2016), pp. 406-421.]
- 23 “天津市委工作会议召开，李鸿忠讲话”，《天津日报》，2016 年 10 月 21 日。
- 24 克里斯·巴克利：《中国外长因人权问题痛斥加拿大记者》(Chris Buckley,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Castigates Canadian Reporter for Rights Ques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16.)
- 25 自治区纪委监察厅，“新疆日报社原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严重违纪被双开。”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 年 11 月 2 日。
- 26 王姝、何强，“胆子都很大，‘妄议中央’的省部级官员又多了一个”，《新京报》，2016 年 8 月 10 日。
- 27 曹国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将对学位论文进行“意识形态审读”，RFI，2016 年 5 月 19 日。
- 28 克里斯·巴克利：《在批评之后，出版商推翻了向中国审查机构低头的决定》(Chris Buckley, “After Criticism, Publisher Reverses Decision to Bow to China’s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17.)
- 29 同上。
- 30 斯蒂文·哈雷尔：《中国暴力现象导论：文化与反文化论文集》[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of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pp.1-21 in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of Univ. of New York Press, 1990)]; 迪迪·柯斯滕·塔特洛：《中国的丑陋骷髅现身》和《暴行指控令中国警方处境尴尬》(Didi Kirsten Tatlow, “Letting an Ugly Skeleton out of China’s Closet,” November 16, 2011, and “Accusations of Brutality Cast Harsh Light on Chinese Police,” May 19, 2016, both at *The New York Times*.)
- 31 奥斯汀·拉姆齐：《中国拆迁现场殴打视频引发惩处》(Austin Ramzy, “Video of Beatings amid Demolition in China Leads to Punishment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6.)
- 32 才让多吉，“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 年 5 月 12 日；Austin Ramzy, “3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Arrested in Migrant

Worker' s Death,"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4.

33 唐荆陵, “一个囚徒的人权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 2016年5月19日。

34 前引李云飞, 《文革思维使中国民族问题陷于绝境》。

35 个人电邮沟通。另见林恩·T·怀特,《香港的民主化——以及中国?》[Lynn T. White III,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6), chapter 8, pp. 203-46.]

透视中国

邓聿文

作者 邓聿文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原副
编审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 老政治的结构性衰 落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十年间，元老政治在中共最高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国元勋依托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对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然而，这种合法性是不可再生的，随着第一代元老的凋零、资历断层的出现，以及制度集中化和个人集权化的推进，元老政治的影响力逐步衰退，并在习近平时代基本被架空。通过历史回溯与结构分析，本文将构建“元老权威衰减时间轴”，揭示元老政治衰落的制度逻辑与历史必然性，并从结构上分析当代“元老反习”传言的不可能性。元老政治终结意味着习近平极权体制内部非制度化制衡机制消失，权力高度集中化虽提高了决策效率，但亦增加了政策失误难以纠偏的风险。这一转变不仅是中共政治史的重要节点，也是专制体制演变的重要案例。

在近年的中国政治流言中，“元老”常常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出现在公众叙事里。每逢中共进入关键政治节点——无论是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还是2022年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抑或2025年的中共四中全会——坊间总会流传出类似的版本：某位退休常委在内部会议上直言批评习近平，或是在北戴河会议上与现任最高领导人激烈交锋。这类故事的细节往往难以证实，却能迅速在舆论场获得广泛传播，甚至被部分境外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暗线”之一。

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少被认真追问：这些所谓的“元老反习”情节，在当代中共的权力结构中真的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今天的“元老”是否还具备足以对最高领导人形成实质性约束的权力资源与政治合法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停留在政治传言的真假之辩上，还须回到历史与结构本身——厘清“元老”在中共语境中的定义，追溯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并考察这种权威如何在制度演变与代际更替中逐步衰减直至近乎消失。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元老政治从“打天下”一代的巅峰到“守成”一代的式微轨迹，揭示当下“元老反习”传言为何多是政治想象，而非现实可能。

本文的研究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1. “元老”的概念与结构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2. 元老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何在？这种合法性为何具有不可再生性？
3. 元老政治在制度集中化与个人集权化趋势中经历了怎样的衰落过程？

研究方法上，本文将结合中共官方文件、领导人文集、会议记录等一手材料，并辅以国内外权威学术研究与可靠新闻资料，通过历史追溯与结构分析，呈现元老政治的兴衰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制作一份“元老权威衰减时间轴”，以直观展示 1978 年至今元老政治的变化轨迹。

元老政治的历史起点与结构特征

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元老”并非正式职务称谓，而是一种带有非制度化色彩的政治身份，通常指那些已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但在党内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老一辈高级干部。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

革命资历、历史功绩、军政人脉以及相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优势。与西方政治学中“长老政治”（elder politics）的概念相比，中共的元老政治更强调革命功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它又深嵌于威权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网络 and 实际权力运作之中¹。然而，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贯穿中共历史始终。毛泽东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元老，也是党内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毛不仅在形式上是党的领袖，更在实质上垄断了路线制定、干部任免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资历深厚的领导人，在毛的个人权力面前也无法形成独立的元勋集团，更遑论在关键政治决策上制衡毛。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被打倒，政治生命几近中断，毛对他们的复出有绝对的决定权，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格局决定了元老政治在当时无从存在。毛晚年虽在现实治理压力下恢复了部分老同志的职务（如1973年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整顿），但这更像是临时调度，而非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是在毛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形成的。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英明领袖”姿态接班，但很快受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功勋制衡。这批人几乎都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关键历史阶段，在党政军各领域担任过核心职务，政治资历远高于华国锋等“中生代”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军队系统中保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脉与威望，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一线职务的情况下，对国家重大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²。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批元老集体推动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的路线转折。这标志着元老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退居二线的开国元勋依靠革命功绩和网络化权力，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而现任领导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与他们保持政治协商甚至依赖关系。

这一时期的元老政治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首先，它是非制度化的，党章和宪法并未赋予他们明确的权力来源，但他们依靠个人威望、历史地位和控制的人脉网络介入决策。在1982年通过的新《党章》中，虽然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作为安置老同志的正式机构，但其实际功能远超“荣誉职位”，成为元老影响政治的重要平台。其次，这种威望型合法性与政权合法性高度绑定，开国元勋的个人政治生命与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息息相关，使他们拥有天然的“裁决”正当性。例如，邓小平虽然在1980年代多次拒绝担任国家主席或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废立总书记、拍板重大改革政策、处理“六四”危机等事件上拥有最终决定权³。最后，元老政治是高度网络化的，他们通过在党、政、军不同领域培植的干部体系，形成纵深影响力，能够跨越正式的组织边界对最高领导层施加决定性压力。军队系统尤其是他们的重要权力支点，例如叶剑英在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改变了政治格局；邓小平则在1980年代通过军委主席身份稳固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1978年至1992年可视为元老政治的巅峰时期。在此期间，第一代元老不仅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框架，还在最高领导人更迭、重大政策调整乃至危机处置中发挥了裁决作用。但这一结构的内在脆弱性也已显现：其权威的根基——革命功绩与“打天下”的资历——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第一代元老自然凋零，接班的“守成一代”在历史

合法性上将难以与他们比肩，这为后续元老政治的必然衰落埋下了伏笔。

元老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元老政治之所以在毛泽东去世后能迅速成型，并在 1978 年至 1992 年间达到巅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一种多维度的合法性资源。这种合法性不仅来自个人的革命履历和历史功绩，还深植于中共政治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深层结构之中。与现代民主政体中权力合法性主要依赖选举授权不同，中共的权力合法性更多依托于历史叙事、革命传统与组织认可的结合，而第一代元老几乎在这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首先，革命功绩是元老权威最直接、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来源。作为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他们亲历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建构史”——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长征的生死考验，再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些经历不仅构成了个人政治资本，也塑造了中共官方叙事中的“英雄史观”。在这种叙事体系中，革命元勋不仅是政权的奠基者，更是制度的天然守护者⁴。这种身份赋予他们在党内外一种类似“宪制监护人”的地位，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被视为有资格对重大路线方针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军队控制权是支撑元老政治的核心支柱。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更是政治权威的保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退居二线后，依然掌握或影响着中央军委的关键职位安排，对各大军区主官的任免有直接发言权。这种军事影响力不仅在权力斗争

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也在日常政治中为元老的意见增加了分量。对现任领导人而言，忽视或公开挑战这些掌握军权背景的元老，无异于触碰政治安全底线。

再次，人事与组织网络构成了元老在制度层面延续影响的渠道。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长期强调“上级提拔、下级服从”，在这种体系中，元老在任时提拔的大批地方与部委干部，构成了他们退居二线后在组织系统中的“代理人”网络。这些干部既是元老政治意志的延伸，也是元老在政治协商中可以动员的现实力量。例如，1980年代初期，陈云凭借其在财经系统中的权威，影响财政、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政策走向，而邓小平则通过在中央军委与组织部的影响力，确保改革派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

此外，话语权与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使元老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任领导人形成压力。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历史的解释权，而第一代元老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掌握了对历史叙述的最终定调权。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由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主导的历史评价工程⁵，其内容不仅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继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某一政策路线与他们所确立的历史基调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有理由以“维护历史结论”为名进行干预。

最后，政治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与“功勋政治”传统，为元老权威提供了软性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共党内，资历不仅是政治资本，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当性来源。第一代元老的资历差距与中

生代领导人相比往往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他们的经历和威望被视作党内不可轻易挑战的道德权威。这种文化心理不仅约束着现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着党内舆论的走向。

正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结合，使第一代元老在毛去世后的十余年里，既能在关键时刻直接干预最高领导人的去留（如1987年和1989年的废立总书记），又能在日常政治中通过军队、人事和话语权塑造政策方向。然而，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天然的不可再生性——革命功绩不会复制，军队人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断裂，人事网络会因代际更替而消散，历史叙事权也会被新一代领导人逐步接管。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元老政治的巅峰只能属于“打天下”的第一代，而在随后的代际交替中必然走向衰落。

元老权威的衰落轨迹

元老政治的形成与巅峰依赖于第一代开国功勋的独特历史条件，而这种条件在代际更替中不可避免地流失。自1978年至今，元老权威经历了从巅峰到边缘化的渐进衰落过程，其背后的推动力，既有自然代谢和资历断层等客观因素，也有制度集中化与个人集权化等主观设计。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权力基础与衰减原因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

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年胡耀邦上任，1987年胡耀邦下台，1989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⁶。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⁷。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一衰减过程，可以用下表概括：

阶段	时间	主要元老	合法性来源	权力特征	衰减因素
巅峰期	1978-1992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	革命功绩 + 军队控制 + 人事网络 + 历史叙事权	可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裁决路线	第一代元老自然凋零；合法性不可再生
余威期	1993-2002	薄一波、万里等仍具影响力的老一代革命干部，姚依林、宋平等	革命资历余威 + 人事网络延续	对高层人事与政策方向仍有一定影响，但已难形成邓时代那种最终裁决权	中顾委废止；革命功绩断层
边缘化期	2003-2012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	任内资历 + 派系纽带	仍能影响高层人事与权力分配，但已难直接裁决最高路线	资历差距缩小；军权与组织权更集中于现任；退休高层逐步收缩
象征化期	2013-至今	江泽民（去世前）、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	任内资历	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边缘化，主要表现为礼仪性出席与象征性存在	高度个人化集权；军改切断军事人脉；反腐清洗派系；舆论封锁

这一时间轴不仅反映了元老政治的历史起伏，更揭示了其衰落的制度

性逻辑——革命功绩一旦成为历史，元老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为继；而在高度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中，所有非现任的政治权威都被制度化地边缘化。这一演变过程，使得当代中国政治中元老的作用与 1970-1980 年代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元老政治衰落的关键因素

元老政治的衰落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一系列结构性与政策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在邓小平晚年便已显现，并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的制度与人事安排中逐步完成。其根本逻辑在于，元老权威的基础——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历史叙事权——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削弱，同时受到制度性设计的主动切割，最终被纳入高度个人化集权格局中的安全控制范围。

首先，最直接的因素是**合法性断层**。第一代元老的革命功绩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相捆绑，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具有“创制性”与“裁决性”，任何现任领导人都难以公开否定。然而，第二代及以后的元老缺乏这种革命资历，他们的政治资本更多来自在任期间的行政业绩与政策成就，这类成就本身容易受到后任的调整甚至否定。在政治文化上，守成一代的元老虽有资历，却缺乏“打天下”一代天然的历史光环，从而失去了在路线分歧时“压阵”的正当性。这种断层是不可逆的，一旦革命功绩不再是现实政治资源，元老干预政治的合法性便随之消散。

其次，**制度集中化**是有意压缩元老权力空间的关键步骤。1992 年中顾委的废止，标志着元老政治失去了一个半制度化的集体平台。尽管

设立中顾委的初衷是为老同志“退而不休”提供名誉性安排，但在实际运作中，它成了元老集体发声与协调意见的重要渠道。废止该机构，一方面符合干部年轻化的制度趋势，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元老集体性干预政治的制度通道。此后，元老的政治影响更多依赖个人威望与私人关系，而非集体运作，这大大削弱了其组织化的政治力量。

第三，**军队系统的整编与权力上收**从根本上切断了老元的军事支点。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部分元老仍能通过自己提拔的将领或在军委的旧部间接影响军队。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大规模军改——包括裁撤四总部、成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调整战区结构、严厉清洗高层将领⁸——不仅完成了对军队的再集中化，还有效清除了与退休高层有深厚渊源的军事人脉。军队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更加直接依附于现任核心，成为其个人权力的保障，而不再是元老影响政治的潜在工具。

第四，**反腐运动与人事再布局**削弱了元老的人事网络。在中共体制中，人事影响是元老退居二线后延续政治作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自2013年以来的反腐风暴，特别是在军队、石油、金融、宣传等关键系统的大案，直接瓦解了不少退休高层的旧部与亲信网络。这不仅清除了潜在的派系威胁，也阻断了元老通过“干部提携链”向现任施压的可能。加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对干部任免的高度垄断，任何涉及副省部级以上的任命都需要核心亲自批准，老元的推荐与干预几乎没有实际空间。

第五，**舆论与信息控制的强化**，使元老失去了塑造党内议程的公开渠

道。第一代元老时代，党内文件和内部讲话往往能在有限范围内形成政策压力，部分甚至会被有意泄露到媒体，引发舆论波动。然而，当前的舆论控制机制——包括对内部文件流通的严格限制、对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实时监控——使得元老即便在内部提出不同意见，也极难形成超出小范围的政治影响。对少数公开撰文或讲话的老干部，相关内容通常在短时间内被删除或封锁，其象征性影响远大于实质性效果。

最后，**政治安全化管理**巩固了对元老的全面监控。在现行体制下，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享有高规格的生活待遇与警卫保障，但这些“礼遇”与严密的安全管控是捆绑的：日常出行、会见、通信都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下，政治性聚会受到严格审批。这种安排既防止了元老成为在任领导人的潜在政治对手，也避免了他们成为不同派系整合资源的节点。尽管如此，在江胡时期，由于那时党内政治生态相对宽松，退休领导人的活动和出行，尤其离京行程，虽也受限，但未必被严格束缚。而在习近平时代，对退休领导人的监控被纳入对习本人是否忠诚的一环，这就使得此种监控尤为强化，元老们几乎完全丧失了串联谋划的可能，如果他们想串联的话。

综上，元老政治的衰落是历史条件与制度安排双重作用的产物。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元老失去了革命功绩和军队控制等核心资源，而制度集中化、军改、反腐、舆论控制与政治安全化管理，则在结构上切断了他们可能重新积累影响力的路径。这一过程在习近平时代达到终点，元老的政治功能基本象征化，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分量已与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十年不可同日而语。

当代“元老反习”传言解析

在习近平执政的十余年间，关于“元老反习”的传言几乎定期出现，并且往往与关键政治节点同步：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22年二十大人事布局、在经济和外交出现明显压力的特定时刻，舆论场中总会流传某位退休常委或已故元老“在内部讲话中批评习近平”或“在北戴河会议上与核心发生激烈冲突”等情节。这些传言的细节版本各异，但通常具有几个共性：一是情节戏剧化，二是信息来源模糊，三是几乎无法得到公开佐证。然而，它们却能够迅速获得传播，并被部分境外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隐秘信号”。

要解释这些传言的盛行，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它们的心理与政治市场，二是它们与现实结构的落差。从心理层面看，中国政治高度封闭，外界对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决策过程几乎一无所知，这为谣言的生成提供了天然土壤。在缺乏透明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用熟悉的历史模板来推测当下的政治过程，而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干政经验，尤其是邓小平废立总书记的先例，正是最易被套用的模板。对于部分受众而言，想象现任领导人与元老之间的冲突，既符合他们对权力制衡的期待，也提供了一种解释政治变化的叙事便利。

然而，从现实结构来看，这类传言成立的可能性极低。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元老政治的核心资源——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历史叙事权——在习近平时代已全部削弱甚至被制度性切断。今天的退休常委和前国家领导人，与1978-1992年第一代元老相比，存在几个本质差异。其一，他们在资历与威望上无法与“打天下”一代比

肩，缺乏天然的历史裁决正当性，即使对现任路线有异议，也难以在党内形成足以左右大局的反对意见。其二，他们不再掌握任何军队指挥权或干部任免权，即使存在私人交情，也缺乏动员成规模政治资源的能力。其三，他们的公开发声渠道被严格限制，任何可能引发政治影响的讲话或文章，几乎在短时间内会被信息控制机制封锁，难以形成持续的议程影响。

以“北戴河休假”为例，外界普遍将其想象为“元老与现任领导层博弈的平台”。事实上，近年来北戴河休假的议程和参与方式已发生显著变化，更多是由在任领导人听取部分专家和退休干部的政策建议，而非过去那种涉及最高人事与路线的闭门权力交易。即便有元老在此类场合提出不同意见，其内容也多停留在政策建议层面，不具备改变决策方向的制度条件。

因此，当代“元老反习”传言更多是一种政治想象的延续，是将历史经验投射到当下政治的一种叙事惯性。在信息极度不透明的体制中，这类传言不仅为舆论提供了谈资，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外界对权力内部存在制衡的心理需求。然而，从权力结构的现实出发，这些传言缺乏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便个别元老在私人场合表达过对现任政策的不满，这种不满也难以组织化，更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对最高领导人形成实质性制约。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公众与外界观察者在缺乏透明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借助历史记忆和政治符号来建构对当前权力格局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也恰恰印证了元老

政治在当代中国的衰落——当元老不再具备现实影响力时，他们在舆论叙事中的存在感反而可能被放大，因为这种虚构的存在感成为填补信息真空的一种方式。这种“符号性元老政治”与邓小平时代的实质性元老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进一步凸显了制度集中化和个人集权化对权力结构的深刻改造。

结论与理论意义

回顾 1978 年以来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可以看到这一政治形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权力资源和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第一代元老依托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迅速确立了超越正式职务的政治权威，并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发挥着对最高领导人和重大路线的裁决作用。然而，这种权威的根本上是不可再生的：革命功绩无法复制，资历差距会随着代际更替而缩小，军队与组织网络会因制度改革和人事更迭而瓦解。

从第二代元老开始，这种合法性和影响力便呈现出结构性衰退，虽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人事布局，但已无法像邓小平时代那样直接干预最高领导人的去留。进入习近平时代，制度集中化、军队彻底整编、反腐运动对派系网络的清理，以及舆论与信息的全方位控制，使元老政治的功能基本被压缩到礼仪性象征层面。在这种格局下，当代“元老反习”传言虽在舆论场中频繁出现，却缺乏现实发生的制度条件与资源基础，更多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的政治想象。

这一历史轨迹不仅是中共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更广泛的政

治学意义。首先，它验证了威权体制中非制度化权力形态的脆弱性。当其合法性依赖于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时，衰落是时间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次，它揭示了制度设计与个人权力集中如何在威权体制中塑造权力分布的边界，特别是通过制度性手段，切断潜在的非在任权力来源，确保最高领导人的不受制约。最后，它也提示研究者，政治符号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即便元老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被边缘化，他们在舆论叙事中的象征性角色仍然可能被放大，并在政治想象中扮演超出其现实作用的角色。

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察不能简单地套用邓小平时代的元老政治模板，而应基于对当前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具体分析。在习近平时代，元老政治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更意味着极权体制内部制衡机制的进一步弱化。在缺乏制度化的集体领导与内部监督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化，既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增加了决策失误并难以被纠正的风险。这一转变的政治后果，可能在未来的重大政策选择与权力交接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

注释

- 1 参见尹钦“当代中国政治中‘领导核心’制之研究”，载《二十一世纪》2020年4月号，总第178期。
- 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该书收录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围绕拨乱反正、经济调整、干部路线、外交和军队等重大问题的讲话。
- 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卷所收邓小平关于改革方向、中央领导层调整及1989年政治风波处置的讲话与谈话。他虽不居于最高正式职务，仍在重大政治决策中发挥最终裁决性的作用。另参见尹钦的“当代中国政治中‘领导核心’制之研究”相关论述。

- 4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该决议从中共官方层面对党的历史作出重新评价，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 5 参见陈雪薇“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2013年9月5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964-30914912.html>。
- 5 参见曲青山“两个‘历史决议’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党建杂志，2021年11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党史博采，2009年4月。
- 6 参见本人所著《不合时宜的人民领袖：习近平研究》一书的相关论述，第31-33, 46-53, 79-80页，台北，独立作家，2023年出版。书中对江泽民退位后仍影响胡锦涛时期高层政治，并对习近平上台初期权力格局形成延续性影响，以及习开展的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都有较具体讨论。
- 8 同上。
- 8 参见新华社报道“习主席和中央军委运筹设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纪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06版。

透视中国

陈奎德

作者陈奎德为《纵览中国》网刊主编，著有《自由中国谱系》等作品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冷战—反冷战—新冷 战：历史并未终结

摘要: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学界政界出现了某种“反冷战”的逆向思潮,认为二战后 80 年,从冷战的两极世界,转向了美国治世的自由主义秩序;而现在已进入多极世界,美国人应当把头转向 17-19 世纪诸民族国家的多极化欧洲历史,淡化意识形态,摆脱冷战思维。这一观点完全没有看到冷战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的独特地位——它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类命运对决,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是非善恶的标准,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在反冷战思潮出现后不久的当下世界,潮流正在转向,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泛起。历史逻辑内生出结构性张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走向两极裂变,走向新冷战,即冷战残局。

冷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1989-1991 年,横跨欧亚大陆的红色帝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风行全球。那是人类历史的高光时刻。

此后是近二十年“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的单极世界,俄国与东欧国家则经历了一段转型的艰难时期。至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及中国站队美国,并于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意识形态对峙淡化,共产主义似已堕入尘埃。冷战胜利的热潮随之降温。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北京在全球化经贸大势中崛起,并举办声光盛宴式的世界奥运会。在国际学界、商界和政界,潮流开始静悄悄转向,放弃“冷战思维”的声音冒出地面并汇成一股逆向潮流,是为“反冷战潮”。

反冷战潮

反冷战潮的主旋律声称：冷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两大阵营对抗，平白无故造成高强度对抗甚至核战风险。冷战并无是非，任何一方都不占据道德优势，双方半斤八两而已。其潜台词是：冷战对双方而言都是历史性错误，其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

仔细考察后人们不难发现，北京当局是抨击“冷战思维”的主要舆论推手。冷战甫一结束，北京就开始步步为营推动这股反冷战潮。不过，北京早期放低姿态韬光养晦，近年来却日益凸显狰狞。202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厉声疾呼“冷战思维当休矣”：“美国反华势力正在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这种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做法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北京所称的冷战及冷战思维，向来语焉不详。对冷战，北京只强调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不提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不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不提自由开放国家与封闭的极权国家的冲突；忌讳提及冷战结局柏林墙倒，更不愿涉及冷战双方是否有正邪、是非、善恶之分，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习近平对前苏联解体的一句“更无一人是男儿”，露了马脚。无可置疑，习在哀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他上台伊始即自称“绝不作亡国之君”，就是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救共产主义于崩溃。这正是如假包换的“冷战思维”。

一个充斥冷战思维的政权指责北约有冷战思维，本是很奇怪的事。恰

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表示：中国自己多年来一直采用冷战策略和战术对抗美国，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指责别人所做的事，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在对别人做的”。¹

不唯北京如此，甚至在西方学界、商界、传媒界和政界，反对“冷战思维”也有相当市场。

究其成因，似乎源出胜利者的宽容。他们小心翼翼，唯恐刺激到失败的一方。从北京到莫斯科，学者、商人、政客竞相以抨击“冷战思维”为时髦。其基调是，当今已经全球化，摒弃“冷战思维”自是现实需求。

不可否认，上述反冷战思维，前些年已经蔚成潮流，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视的。

冷战陷阱？

2023年7月23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官网发布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反新冷战”的文章，题为“冷战陷阱：美国霸权时代的记忆如何阻碍美国外交政策”，明确反对所谓“冷战思维”。²其基本观点大体如下：

我们不能滥用历史类比，特别不能滥用冷战的历史类比。这些类比毫无帮助或具有误导性。冷战历史已经成为限制美国人看待世界的紧身衣。它主导了他们对过去的了解，扭曲了他们如何理解冲突、如何进行谈判、如何思考自己的能力，甚至如何分析问题。无论接受还是拒

绝这个类比，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把冷战作为世界事务的参照点。

作者断言，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该文作者贾斯汀·维诺库尔（Justin Winokur）认为，美国很快就要面临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深陷冷战思维的美国人没有能力应对新兴的多极世界。

《冷战陷阱》指出，应当把头转向更远的历史，转向非单极非两极化的多极历史图景，转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例如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君主国之间的权力冲突、新教改革期间的百年宗教摩擦、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作者认为，这些案例让人更容易想象当下的美国和中国如何解决和管理贸易、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的争端，而不是屈服于全面的冷战。

《冷战陷阱》总结说，美国要想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冷战的束缚。

无独有偶，另一位学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26年1月18日在《大西洋月刊》官网发文指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宣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³他也认为世界将恢复到19世纪的多极化局面。

但与《冷战陷阱》所想象的那段“美妙的”历史相反，卡根用列举历史事实来说明那个所谓大国协调的多极世界的残酷。从1815年到1914年，那段时间曾被一些人视为欧洲的“长期和平”时期，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国之间打了数十场全面战争，死亡人数动辄数十万。

我同意罗伯特·卡根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那一百年（1815-1914）并非如基辛格所赞美的是百年和平，当然，与随后的一战二战相比，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认为的“在二战之后这八十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和平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代理人战争（如韩战和越战）以及极权国家内部对其国民实施的制度性肉体和精神毁灭，如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大饥荒和摧毁精神文化的文革。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国民的内战。

二战后这80年，前45年是“冷战1.0”时期，后35年是“后冷战时期”或者说“美国治世时期”，或者把整个80年都大略判为美国主导时期也可以成立。

罗伯特·卡根认定这80年是“例外”而非历史常态，而《冷战陷阱》作者则认定这80年束缚了美国人的思维，在当前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皆认为我们正在重返类似18、19世纪多极化的民族国家时代。不过《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对之持正面评价，而罗伯特·卡根则持负面评价。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

罗伯特·卡根宣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的主要依据，反映在他 2024 年出版的《叛乱：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⁴一书中：

在人们心目中，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如果将这种自由主义放到当时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显其对于人类进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义。在当时，整个世界，包括欧洲，都是按照种族、宗教、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构建出来的。卡根强调指出，美国国父们创建的自由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对这种旧秩序的颠覆。

卡根认为，实际上，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秉持《独立宣言》的平等、天赋人权原则的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捍卫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抵制这些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卡根这一叙事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察，有两个致命盲点：

1. 忽视了二战及冷战的划时代精神遗产及其历史性判决，忽视了前述遗产被当前乱局激活后可能产生的反弹力。
2. 他忘记了，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传播者。他还忘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是从欧洲传承过来的广义的自由主义（包容了《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间激越进取和中间平衡保守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

关于冷战在世界史上划时代地位及其精神影响，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这里着重讨论罗伯特·卡根的论点：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两个美国”——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基督教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这一论述的要害问题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斩断了二者之间的血缘联系。不应忘记，近代自由主义正是诞生于基督教文明传统之中，而不是诞生于轴心时代以来的其他任何文明传统中。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如人权，正是来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来自上帝，进而《美国独立宣言》声言那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腊罗马，只有公民权概念，并无人权概念。当时仅自由民有公民权，而奴隶则并无此项权利，即古典世界并无普遍人权概念。

另一核心观念，平等，溯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只是把上述源于基督教的神圣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这些根本观念溯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传统，并演化为现今的民主自由体制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广泛称为“传教士情结”，正表明了其遗传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选举—法制—权力制衡”机制，为后来欧洲世俗王权向宪政体制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

板、合法性语言和政治想象空间。通过长期的模仿、转译与世俗化，输入了选举合法性、法高于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权力可被制衡的理念，从而对宪政体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宪政不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对其制度创新的世俗继承。

虽然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美国制订宪法时亦在南方各州的压力下保留了奴隶制条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权平等的价值理念，通过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美国内战等历史性蜕变，逐步显化自我，实现脱壳，扬弃了教会历史上某些负面因素，其核心价值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有鉴于此，美国被视为“被上帝拣选的民族”，美国制度（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具有普世性与救赎性，所有这一切，澄明了美国制度与基督教的深刻关联，美国的传教士情结深植于清教徒传统与“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观念之中。鉴此，并不存在卡根所谓尖锐对立二元实体——“两个美国”，而是具有传承演变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否认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血缘关系。回望一下冷战期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对东欧（如东德波兰捷克苏联）和南韩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励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欧之间、美加之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保守主义和自由派（liberal）的极化的对峙态势，从长程眼光看，并非永恒壁垒，而是历史钟摆现象。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美国国际战略的双重情结——“传教士情结”与“孤立主义情结（或现实主义）”二者之间周期性摆动的当下显现。

维诺库尔和卡根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多极化时代已经或即将降临。笔

者必须指出，两位有一个共同的视野盲区，那就是冷战。他们完全看不到冷战与历史上一般战争和冲突的区别。而冷战，它的历史独特性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仔细探究的。

冷战的世界史意义 —— 何以冷战在人类史上如此特殊？

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如何评判上世纪 1989-1991 年的世界历史剧变？

冷战是一场被遗忘的人类命运之争。它是一块试金石。

在笔者看来，冷战是被低估被忽视的叙事。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制度竞争，以冷战的形式呈现，作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人类历史命运的对决，它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及其独特性在于：

- 1)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这样价值观反差巨大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地球上对峙。竞争结果清楚呈现出：何者胜方，何者败方；何者正义，何者非正义。

《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毕竟年轻，从未有过在共产国家生活的经历，恐怕他很难有共产国家民众当年（包括北京 1989 年 50 多天举行多次百万人大游行的中国人）那种刻骨铭心的巅峰体验。回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1989-1991 年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共产制度而言，那是终极毁灭性的。回顾柏林墙倒塌，

那普天同庆的场景：经历七十多年系统洗脑的前苏联及东欧前共产国家的国民，未经一枪一弹，竟会在戈巴乔夫的为时甚短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开放政策两三年后，就迅速转为反对社会主义，几乎没有死硬党员为共产制度殉葬。七十多年洗脑竟不能抵御两三年的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这是何等不朽的胜利。

- 2) 这场历史性对决的结果并不是取决于战争的胜负，而是建基于和平竞争的演变。虽然其间也曾经发生过代理人战争（韩战和越战）和惊心动魄的世界危机（古巴核导弹危机），但是对峙的主要双方美苏并未直接开战。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外部压力仅起了次要作用，主要是源于内部问题自行崩塌，是制度性和和平竞争的产物。
- 3) 冷战在人类史上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的是非标准，共产主义已经被主流国际社会判决为缺失合法性的失败的意识形态 / 制度。这种一边倒的胜利，甚至失败一方的国民也心悦诚服。人们注意到，在冷战中失败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心甘情愿地不再寻求向战胜国复仇，不再寻求回到冷战前的状况中去。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有哪一国想复辟为共产党国家？一个也没有！鉴于此，共产意识形态不再可能全盘东山再起。而《冷战陷阱》提及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的那些交战国的战败者呢，他们难道不想一雪国耻？不，他们极其渴望复仇雪耻。因为那些征战毕竟是国家利益之争，宗教教派之争，是身份认同之争。而冷战是为基本价值而争，它与历史上为身份认同之争的战争有根本不同。

这就是说，冷战（对抗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这也同时表明，冷战的胜利是不可逆的。这同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那些战争截然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春秋无义战”那些战争截然不同。

就此观之，冷战，是世界的伟大转捩点。

多极世界？

应当承认，《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殷切期望的那种放弃冷战思维，淡化意识形态，回复到十七到十九世纪处理国际冲突的方式，这种观念在经贸全球化时代还是有市场的，也得到了一些政治人物口头上的响应，但他们在政治外交上的宣示与他们的地缘政治实际操作有实质性差异。

人们曾设想，回归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单位的世界格局，各国主权至上，和平共处，相互进行经贸交流与竞争，各自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岂不是一幅历史终结，世界大同的图景？很多政治人物都曾有类似的政治愿景，忌讳言及意识形态分歧。

卡根等学者认为，在美国川普时代推进的新门罗主义将淡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对峙，回归早期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利益纷争的多极时代。

但这种关于多极世界的论断，不过是表面化的观察，并无充分理据。

世界的“极”，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和权力的凝聚中心。环顾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强国 G7、北约（NATO）、欧盟（EU）以及英加日澳等民主国家，虽然内部也存在利益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在基本价值观与制度形态问题上，大体维持着高度共识，通过历史沿革而来的各种盟约、条约、公告等的联系，已经大体成型，自然可谓一极；此外，以中俄伊朝为轴心的国家，当可算另一极。环顾全球，还有没有“极”呢？就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和权力的凝聚中心而言，没有了。否则，任何历史时期都可被称为“多极时代”了。

最近十几年来，北京政权宣称“东升西降”，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极权主义，挑战《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代表的普世价值和战后国际秩序，引起主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2016 年以来，美国政府反省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对北京政权的姑息和绥靖政策，从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竞争、制度竞争等各方面，联手世界民主国家，从四方八面围堵和孤立以中、俄、朝、伊为轴心的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两个营垒对峙的态势。

2023 年 7 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是立足于西方盟国的角度，对上述几年来世局演变的一个俯瞰。

尤其是美中贸易、全球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划分日益清晰。从 2023 年 2 月联合国大会以 141 票的压倒

多数声援乌克兰抗击俄国侵略以及维尔纽斯北约峰会声明彰显出的同心同德对抗中俄的立场，是不难看出世界的基本结构的。

在此大势下，有人仍声称美中对抗是“修昔底德”陷阱，仅仅是两大强国争夺国际霸权之战，无关乎价值竞争与意识形态斗争云云，这种论调经不起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演进的检验。

作为象征的中俄朝北京阅兵

共产中国的经济崛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不如刚结束二战之后的 1950 年代。但是，美国仍是世界之首。而前些年盛传中国 GDP 将在不久（2030 年）超越美国云云，现在也不大有人提了。共产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下滑、外交孤立、外资撤出、民怨沸腾、内斗凶险，不知伊于胡底。而美国的军事力量，金融力量，外交影响，仍然领先于世界。

2024 年 7 月 10 日，北约联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32 国发布《华盛顿宣言》，宣称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定性推动者”（decisive enabler）。这一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两极对抗式的新冷战格局已然成型。

2025 年 9 月 3 日，北京。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三个独裁者——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并肩而立天安门阅兵。冷战结束 34 年后，代表三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暴君堂而皇之地重新站在一起，结成了抗拒世界主流秩序的“非神圣准同盟”。

自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大陆政权后，虽然历经毛、邓、江、胡、习五代领导人，至今仍然是一个以马列毛意识形态为标榜的共产党政权。但苏联 1991 年解体后，其主体遗产俄国目前已是一个以继承沙皇传统为国家意志的独裁国家。而朝鲜的金正恩政权目前已经是金家血统为统治根基的世袭王朝国家。当下中俄朝这三个政权具有明显不同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这不同制度的三轴心当下能公然抱团，有赖于一根无形的历史绳索使之合三为一。这一历史绳索，正是“新冷战”。他们共同的目标，正是反对西方。

它们共有的遗传基因就是共产主义血统。

因此，三个轴心国的表演，使不久前仍然若即若离的美欧之间，拉近了立场。让大西洋两岸意识到：欧洲脱离美国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美国退回孤立主义也是灾难之道。

同时，这次“九三阅兵”不由使人回忆起冷战后期，1981 年 9 月前苏联勃烈日涅夫发动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西方-81” (Zapad-81) 军事演习。对外，震慑北约；对内，恐吓波兰刚刚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向波兰人民清晰地传递一个信息：苏联随时准备像 1968 年镇压“布拉格之春”一样，用军事干预来维护其对东欧的帝国式统治。但是这场军演的巨大威慑，反而刺激了北约内部，使得美国与西欧空前地团结起来。结果，与苏共领袖的期待相反，几年之后柏林墙倒塌，十年之后苏联自身就彻底解体了。

新冷战降临

美国重要智库传统基金会曾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发表题为《打赢新冷战：一个对抗中国的计划》的长篇报告。

文章指出，无论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权威人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都在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中国是一个比苏联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更加强大和危险的对手。

到目前为止，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容我在此列出两个引人注目的证据：

- 1)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这一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周”，因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28 项有关中国的法案。其中《台湾冲突遏阻法》(Taiwan Conflict Deterrence Act) 规定：“此一法案旨在揭露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财务腐败，一旦中国胆敢使用武力来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时它就会被触发。”这个编号为“H.R.554”号的法案所说的中共成员包括至少 10 名特定中共领导人。这 10 人包括：1) 中共政治局常委；2) 非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 3) 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委员，其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台湾。
- 2) 2026 年 2 月 9 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 395 票赞成、2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台湾保护法案》(全称为 Pressur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To End Chinese Threats to Taiwan Act)。

新旧冷战对比

自然，由于时空条件的差异，新旧冷战在某些形式上是不同的。

- 1) 新冷战之“新”，首先在于对峙双方在经济上紧密交织。这与旧冷战大不相同。事实证明，当年对苏经济封锁与美国软实力相结合，对 1989-1991 年苏联东欧解体相当重要。现在虽然已经有大量外国资本撤出中国，但仍有不少国际资本是中国的贸易伙伴。短期内，美国与西方尚不能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中国。但中国经济对美国西方依赖的程度仍然高于西方经济依赖中国的程度。北京有求于美国比美国有求于北京大得多。这也就意味着美方影响中国的着力点比旧冷战时期的着力点要多。
- 2) 新冷战中，北京缺乏自己的盟友，即没有前苏联所拥有的与西方国家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历史表明，同盟体系的存在与否及其强弱是决定世界性对抗胜负的关键因素。

因此，虽然新旧冷战有上述差异，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两国关系、中俄朝伊轴心国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就大趋势而言，已经“越来越具有冷战的所有特征”。

重回两极结构的历史张力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政界学界不少强人希望并致力于进入非意识形态化的中性的多极世界，但是世局的演变却事与愿违，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博弈顽固地呈现出两极化的带有冷战（1.0 版）时期意识形态的对峙。

何以至此？

问题根本在于：

- 1) 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之后，亚洲共产国家及美洲残存的共产党政权靠残酷镇压维持政权存续，以致冷战的残局犹存。
- 2) 共产中国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韬光养晦，并利用了美国西方的绥靖政策，在经济上军事上日渐坐大，威胁到文明世界的基本安全；与俄国、朝鲜、伊朗一起，成了当今世界乱局之源。它们是钻进文明世界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威胁到了文明的生存。
- 3) 冷战后的共产中国在美国治世时期获得红利而羽翼渐丰后，必定要寻求盟友以对抗这个与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世界秩序；而俄国普京为恢复自己的大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梦想铤而走险发动侵乌战争，却不料战事受挫；普京遂岌岌于寻求友邦，与共产中国一拍即合，加上被排挤出主流国际社会的金家王朝和极端主义神权国家伊朗，在共同的反西方的旗帜下抱团取暖，成为对抗主流国际的另外一极。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应运而生。
- 4) 共产意识形态虽然明显导致国家失败，何以仍有某种凝聚力？盖因其过去凭借武力与洗脑之后，生产出了一个庞大的（因为该意识形态而获利的）利益集团。捍卫意识形态就是捍卫他们的身家性命。

以上四点结构性的合力使得多极世界的想象日益虚幻化。这种国际博弈的逻辑，导致重大冲突不断爆发，各国被迫选边站队，使世界再次浮现出两极对峙的态势。这是在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其残局（即新冷

战) 重新出现并走向收官的大势。

冷战残局的收官

本来, 被人称为“新门罗主义”的美国川普政府, 正试图收缩战线, 返回美洲。但是, 观察近期的重大冲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之战等), 战略上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政府在地缘政治实践中却一步步卷入了逆孤立主义的全球性竞争。何以至此?

一言以蔽之, 形势比人强。其原因有二:

其一, 现在早已不是门罗时代了。现在的大势日益清楚, 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已经扩张到了全球范围, 现在要人为地强行收缩回美洲, 势必戕害美国利益。事实上, 美国很难维持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和“纯孤立主义的”三极或多极均势体系。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海海域), 在北极圈, 在俄乌战场, 在伊朗, 在委内瑞拉、古巴……被大势驱迫, 美国将一步步再次进入两极结构全球态势。川普政府在地缘政治运作的实践中“退一步进两步”, 从中不难窥见其端倪。这一地缘政治的客观走势, 不是美国总统个人主观上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孤立主义倾向所能扭转的。任何收缩动作, 一旦启动, 都将引发全球性连环反应。

其二, 后冷战时代因为历史演进的巨大惯性而蓄积和蕴藏了巨大势能。柏林墙坍塌时自由主义秩序的辉煌成就曾令世界产生历史终结的幻觉。但中国作为仅存的共产大国通过韬光养晦, 以改革的姿态在经

济上进入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而获经济起飞。最近十几年中国褪下伪装，露出共产本色并挑战国际秩序，成为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已经警醒，并意识到冷战仅仅是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或未曾下完的残余棋局。

目前这一冷战残局博弈的核心对手，就是共产中国。这也澄清了何以美欧之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虽然种种分歧不断，一旦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摊牌时，美国与西方盟国仍将联手对抗共产中国。因为这是主流国际社会难得的唯一共识。在二战和冷战之后的今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取 18、19 世纪弱肉强食式的武力政策对待正常国家，更遑论盟国了。但是对共产国家和极端主义神权国家则是例外。即是说，新冷战走向真正历史终局的强大惯性力量，支配了目前美国外交战略的方式甚至成败。

因此，当前基本大势，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终结，还是新冷战的重返？这个问题令世界处于焦虑之中。美国立国 250 年以来，经历过各种危机时刻——南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水门事件……美国都化险为夷撑过来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例外论，而且在于它证明美国确实有能力通过历史上极其凶险的狂风暴雨的考验。当下大博弈的终局，恐怕要等冷战残局收官之后，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 杰夫·史密斯 (Jeff Smith) 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参加美国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的一份重要政策报告——《打赢新冷战：反击中国的计划》(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 时

的发言。

- 2 贾斯汀·维诺库尔：《冷战陷阱：美国霸权时代的记忆如何阻碍美国外交政策》（Justin Winokur, “The Cold War Trap: 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 23,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old-war-trap-america-foreign-policy>.)
- 3 罗伯特·卡根：《美国对抗世界》（Robert Kagan, “America vs. the World,” *The Atlantic*, January 18,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3/trump-national-security-greenland-spheres-of-interest/685673/>.)
- 4 罗伯特·卡根：《叛乱：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 [Robert Kagan, *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 Again*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24).]



黄奕信画作

卡齐·努鲁尔·胡达
言晓义译

卡齐·努鲁尔·胡达 (Kazi A. S. M. Nurul Huda) 是达卡大学 (University of Dhaka) 哲学副教授, 同时担任里士满大学杰普森领导力研究学院的祖扎娜·西莫尼奥娃·奇梅利科娃 (Zuzana Simoniova Cmelikova) 国际访问学者

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 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 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这是新孟加拉 国的开端吗?

编按：2026年2月12日，孟加拉国举行了议会大选。这是自2024年8月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被民众抗议推翻后的首次选举。选民不仅选举了新的议会，还批准了范围广泛的宪法改革。宪法改革将会如何落实？是否能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这正是卡齐·努鲁尔·胡达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原文为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网络文章，发表于2026年2月（<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online-exclusive/is-this-the-beginning-of-a-new-bangladesh/>）。

2月12日，孟加拉人在一片节日般的气氛中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自2024年8月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被戏剧性罢黜以来，孟加拉国举行的首次选举。选民不仅是在选择他们的议会，同时也在决定是否批准一项范围广泛的宪法改革。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而另一主要大党——哈西娜所属的孟加拉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被禁止参加此次选举。BNP于是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获得略低于50%的选票，并在350席的议会中赢得300个直接选举席位中的209席（其余50个非直选席位按比例分配给妇女代表）。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Bangladesh Jamaat-e-Islami）获得31.8%的选票和68个席位；其选举盟友国家公民党（National Citizen Party, NCP）——这一新政党是在2024年孟加拉国大规模起义之后出现的政治力量——获得3%的选票和6个席位；这两个小党遂成为议会反

对党。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60.4%。

与此同时，宪法改革公投以 68.6% 的有效选票支持率明确通过。上述三个政党似乎都在总体上支持宪法改革。选举后的一些最初姿态——包括民族主义党主席、现任总理塔里克·拉赫曼（Tarique Rahman）拜访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沙菲库尔·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和国家公民党领导人纳希德·伊斯兰（Nahid Islam）的住所——表明各方愿意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继续维持关于改革的对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接近十分之一的选票被判定为无效票。与其他国家同类情况比较，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比例，远远高于成熟选举制度中的废票率。例如在爱尔兰，全国选举中的废票率通常仅在 1% 左右。即使考虑到部分选民可能对公投程序不熟悉，仍然不能排除其中一些选票是以无效票形式表达不满或抗议。

这一异常情况也反映出意愿表达框架遭到压缩：由于宪法改革以“打包式”（bundled）批准的方式进行，选民被要求通过一揽子打包的选择来批准数十项制度改革，从而限制了区分不同具体改革项目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机会。当制度设计排除了具体表达同意的可能时，异议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转移到仍然可用的表达空间——包括投下无效票。因此，这次公投在法律授权上或许经得起挑战，但其所表达的民意结构，却比最终总票数所呈现出来的，还要更加碎片化。

未获充分包容的授权

如果说这一授权在法律上看起来相当有力，那么其授权范围仍须放在其产生的政治场域中来理解。孟加拉人民联盟在 2008 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 48% 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 年）7 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 年 9 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 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 2026 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赞成”与“反对”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 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 1% 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

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管理改革授权

如果说公投为改革提供了授权，那么议会选举则决定了由谁来实施改革。规定实施《七月国家宪章》(July National Charter)的法令，设立了一个宪法改革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uncil)，这个委员会由新当选的议会议员组成，其任务是把公投批准的内容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设计。因此，委员会成员将同时承担两种角色——既是立法者，又是宪法起草者。也就是说，同一个立法机关既要管理党争，同时又要在 180 个工作日窗口期内起草宪法修正案，而该委员会总共只有 270 天的机构存续期。因此，宪法授权与立法执行仍然共置于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议会场域之中，尽管行政部门和反对派保留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偏好。

即便在这一共同的制度授权之下，早期的程序性摩擦也已开始显现。本周新议会与宪法改革委员会宣誓就职时，孟加拉民族主义党 (BNP) 的当选议员仅宣誓就任议会职务，但拒绝为宪法改革委员会宣誓，理由是宪法程序规定的顺序存在问题。来自 BNP 盟友的三名议员以及几名独立议员也随之效仿此举。

这一举动最初引发了伊斯兰大会党和国家公民党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应。他们的当选代表表示，如果 BNP 继续拒绝宣誓就职宪法改革委员会，他们将抵制议会宣誓程序。然而，反对派代表随后仍然以议员和委员会成员的双重身份完成了就职宣誓。这一事件说明，改革的实

施本身可能会成为法律解释与政治谈判的场域，而非纯粹技术性的立法活动。

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三个政党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共识领域。三者都支持一系列核心结构性改革，目标包括：恢复选举公信力、重新调整行政权力，以及加强司法监督。同时，各方也普遍支持建立制度化保障机制，防止再次出现一党制的选举主导权——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 15 年里，谢赫·哈西娜及孟加拉人民联盟执政的历史教训。

然而，尽管各方在改革意图上存在共识，他们在制度设计方面却存在分歧。一个潜在争议点是上议院席位分配方案。虽然《七月国家宪章》的基准模型把席位分配与全国得票率挂钩，但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替代方案在政治上仍有重要意义，例如按照各党在下议院席位比例而不是全国总得票比例来分配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公投所认可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是基于选举授权的重新解释。

这种格局产生了（姑且称为）“不对称合法性”（asymmetric legitimacy）。虽然得到有力的宪法授权，但议会内部的反对声音却远小于公投中反对票所代表的规模，即使改革阵营内部在制度设计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相当规模的少数派选民在公投中否决了改革，而抵制投票的政治动态也可能扩大了未表达出来的反对力量。由于主要的政治反对力量没有进入立法机构，围绕宪法问题的争论可能会转移到议会之外，转向公民社会、司法论坛或未来的选举动员。

目前，由于议会权威主要掌握在拥有绝对多数议席的 BNP 手中，改革的实施既可能会沿着《七月国家宪章》既定的制度设计推进，也可能通过宪章本身所允许的修订路径进行调整。这两种获得了授权的解释路径之间的互动，很可能会成为宪法协商的核心舞台。例如，围绕宪法改革委员会自身制度权威问题的分歧可能会加深。有关其法律基础以及宣誓程序的问题，可能继续引发不同的解释性争论。虽然这些争议将在改革制度框架内部展开，但它们仍可能影响宪法修正进程的节奏与合法性。这种类型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对改革本身的否定，而是反映了人们对如何落实改革授权存在着不同理解。

从授权到议会的落实

孟加拉国的政治转型如今正从授权阶段进入执行阶段。随着公投通过、议员就位，改革进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在紧迫的时间表之下，制度设计必须被转化为宪法文本。

宪法改革委员会将成为这一转化过程的核心舞台。宪法修正案条款草案将经过委员会审议、跨党派协商以及分阶段的议会复议，随后整合为正式的宪法修正提案。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BNP）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拥有决定性的议程设置能力，但委员会的双重构成，也确保孟加拉伊斯兰大会党和国家公民党在制度上仍然嵌入修宪谈判之中。这样的制度架构使得单方面重新设计制度的可能性不大，即便 BNP 拥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围绕委员会宣誓就职的早期程序性发展，已经显示出改革实施可能如何展开。关于宪法程序顺序、宣誓程序以及委员会法律基础的问题，在任何实质性改革起草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不过，这一事件也表明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最初的抵制并没有升级为制度性破裂，而是在程序渠道之内得到解决。这一模式表明，未来的分歧——无论是关于修宪顺序、起草权限还是批准程序——都更有可能在制度性框架内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通过系统性阻挠的方式表达。

随着具体改革条款从谈判达成的原则转化为立法文本，分歧更可能集中在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例如：拟议中的上议院权力、宪法修正案的实施顺序，以及立法效率与监督之间的平衡问题，都将考验跨党派改革的弹性。这种有结构但有限度的争论更可能塑造改革的轨迹，而不是使其脱轨。宪法改革委员会提出的首批修正案法案，很可能将成为检验各方共识在制度设计谈判中能走多远的第一次考验。

孟加拉人民联盟的缺席则带来了另一种不确定性。该党的缺席减少了议会内部制度化的反对声音，却扩大了体制外的争议规模。因此，围绕宪法问题的反对活动可能转移到公民社会动员、针对改革程序的法律挑战，以及未来围绕某些具体宪法条款合法性的选举活动之中，而不是针对政治转型本身。这样的反对是否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将取决于改革成果在实施和公共理解上的包容程度。

近期前景

因此，未来的道路虽不会毫无摩擦，但也不太可能发生爆炸性的冲突。

孟加拉国的改革进程很可能通过制度内谈判展开，而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宪政危机。立法竞争与宪制重建将在同一个议会舞台中同时推进，把冲突与合作压缩在同一套治理结构之内。

公投提供了授权，选举提供了执行者。接下来的发展将决定建构的持久性。如果改革行动者能够把结构层面的趋同转化为可信的制度设计，同时通过程序性包容来处理异议，那么孟加拉国的民主重建可能会比许多后威权转型得到更快巩固。否则，法律授权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裂痕将在缩小之前，进一步扩大。

政权机构现在已经被赋予权力。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那些受托进行制度重建的人如何掌管他们共同接手的授权——不仅体现在宪法文本之中，也体现在通过这些文本获得民主合法性的实际制度实践之中。



黄奕信画作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言晓义译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是阿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人类学副教授。她著有《大众的悖论：孟加拉国的群众政治》(*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Crowd Politics in Bangladesh*, 2019)

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孟加拉政治的 回归

编按：2024年7月，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反抗，最终推翻了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长达15年的独裁统治。中国无数网民也密切关注过这场反抗运动。但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青年学生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在孟加拉国重新点燃民主变革希望的？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Nusrat Sabina Chowdhury）这篇文章是对这场运动的深度追述和分析。原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文章原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5年第1期（总第36卷）。

2024年10月，在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官邸附近，首都达卡的一面色彩斑斓、布满涂鸦的墙上，一条简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块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列出了这个国家三个最大的政党，即孟加拉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简称BNP）以及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简称Jamaat），并在每个政党的名称旁打了一个鲜红的“X”，明确表达对传统政治的不满。在这些政党名称的下方写着这个词：“新”，旁边是一个绿色的对勾。这正是数以千计、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所憧憬的愿景——三个月前，他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反对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领导的孟加拉人民联盟政府。哈西娜先后于1996年—2001年以及2009年—2024年执政，是南亚现代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他们渴望一个新的孟加拉国，一个“孟加拉2.0版”。

这并不是首都唯一抢眼的信息，也不是唯一一面承载着革命情绪的墙壁。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随处可见的几乎每一个墙面都焕发生

机，布满了夏天抗议期间以及之后留下的涂鸦。那些示威最初只是要求改革政府公职的配额制度，但很快便发展为一场要求总理下台的运动。“有人要喝水吗？”，其中一条标语这样写道。这句话如今已广为人知，它出自学生运动领袖米尔·马赫福祖尔·拉赫曼·穆格多 (Mir Mahfuzur Rahman Mugdho) 之口。他向疲惫不堪 (并未手持武器) 的抗议者分发瓶装水的一幕，被视频拍摄下来而载入史册；当时，警察、民兵和人民联盟的打手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实弹，给抗议者造成惨重伤亡。2024年7月18日，穆格多遭警方射杀。从2024年7月到8月5日谢赫·哈西娜被迫下台之前，孟加拉国抗议运动中约有一千人丧生，穆格多是其中之一。¹

那句纪念殉难者穆格多的口号，与否定旧秩序的标语一道，精准捕捉到了这场重大转折性事件的时代精神：一方面是对“一切照旧的政治” (politics-as-usual) 长久积郁的不满——近年来，这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最明显地体现在执政的孟加拉人民联盟身上；另一方面则是普通公民在暴力国家机器面前所付出的牺牲。虽然这一学生运动——被称为“学生反歧视运动” (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 ——最终誓言要彻底重塑政府本身，但其初衷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日益专制的谢赫·哈西娜政权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对他们的诉求做出让步——或者用学者丽莎·米切尔 (Lisa Mitchell) 的话来说，就是要“呼唤国家” (hail the state)。² 根据米切尔的说法，在南亚地区，举行大规模示威是民众最常见、也最具成本效益的民主“实践”方式。公共集会通常用来传播政治信息、追究官员责任、迫使当局展开对话，以及重新调整权力平衡。在公开喊话之下，国家不得不倾听民意。

2024年7月，孟加拉学生最初因一个“饭碗”问题（公共部门的就业配额）而发起的抗议，迅速滚雪球般升级，最终演变为要求政权更迭的呼声，因为有那么一刻，他们不再信任国家可以继续充当正义裁决者和法治守护者。对政治与政府深感幻灭的年轻抗议者们，通过打破传统政治的沟通规则，重新夺回并且扩大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 人民”（chhatra-janata，即“学生与人民的联盟”）再度浮现（这并非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股革命性的政治力量。

“政治回归了”

在谢赫·哈西娜戏剧性地流亡到印度两个月后——在我撰写本文时，她仍在印度流亡——“学生反歧视”运动的一名核心成员这样概括该组织的集体立场：“我们正在与政治精英进行接触，但我们并不寻求圆桌会议。我们相信问题应当在街头解决。谢赫·哈西娜逃避街头问责，但街头会做出决定。”³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活动人士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此人在哈西娜下台后参与过新一波抗议行动，要求罢免由孟加拉人民联盟任命的总统——在孟加拉国议会制体系中，总统只是象征性国家元首。那人的短信这样写道：“情况再次变得紧张，这是好事。*政治回归了*（*Politics has come back*）。我们又回到了街头”（其中斜体部分为英文原文）。

前面提到的这两段评论揭示了那场运动的形式和内容——那场最终推翻了越来越专制的统治者的运动，就连长期观察孟加拉政治的资深人

士也很少预料到，更不用说普通公民了。

危机的起点是政府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这一制度几乎与孟加拉国本身一样古老。该制度由开国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简称“穆吉布”）于 1972 年推出；他也是谢赫·哈西娜的父亲。尽管每届新政权都调整过其具体政策内容，但正是在谢赫·哈西娜执政时期，那些参加过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使国家脱离巴基斯坦独立）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获得了包括教育奖学金在内的大量福利。

到了 2018 年，预留给这些军属的公职份额提高到了 30%，这激怒了公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正是这些职位的主要竞争者。在舆论强烈抗议之下，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发布了一项通告，宣布取消所有配额，包括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残障人士保留的配额。

公众之所以对退伍军人家家庭配额感到愤怒，部分原因是围绕“国家自由战士名单”长期存在争议。自 1972 年以来，那份名单至少被修订过 7 次，而“自由战士”的认证标准——例如年龄要求，以及“自由战士”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也已经被修改过 11 次。到 2024 年年中，哈西娜政府发现了至少 8000 例虚假申报的“自由战士”，政府计划追回他们所领取的津贴，同时追讨利息。⁴

然而，学生们宣称，政权扩大“自由战士”配额以牟取私利，目的是让孟加拉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从中受益。2024 年 6 月 5 日，在部分退伍军人后代提出请愿之后，孟加拉高等法院裁定恢复配额制

度，包括恢复为“自由战士”家庭保留 30% 的份额。法院裁定，政府在 2018 年取消配额制度的决定“违宪、违法且无效”。这立刻就点燃了公众的怒火。7 月初，首都达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公立大学学生开始发起抗议行动。预示着事态进一步升级的是，私立大学学生和中学生也加入了抗议行列。随后形成的联盟自称为“学生反歧视运动”，该组织强调其成员的学生身份，而不是其所属政治立场。7 月 21 日，孟加拉国最高法院将“自由战士”配额削减至 5%，并规定 93% 的政府职位将按照成绩择优录用，其余部分分配给少数族裔群体。⁵

法律诉求演变为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在孟加拉国并非没有先例。2012 年至 2013 年间，国际罪行法庭（International Crimes Tribunal）主持审理了一系列战争罪案件，被告是解放战争期间涉嫌参与种族屠杀的嫌犯和帮凶。2013 年初，该法庭对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莫拉（Abdul Quader Molla）判处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那项裁决被普遍怀疑存在幕后交易。全国随即爆发了抗议浪潮，其中包括一场规模宏大的街头占领行动，抗议者占领达卡一个闹市街角长达数周之久。那场运动后来被称为沙赫巴格运动（Shahbag movement）。⁶不久之后，莫拉被改判为死刑，并最终被执行绞刑。

这一次，多种因素的叠加——政府的强硬镇压、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不满和当局拒绝正视民愤——共同促成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对高院裁决的抗议以静坐示威拉开序幕。等到最高法院在 7 月 21 日推翻高等法庭的裁决时，抗议者的沮丧与愤怒早已失控。在 7 月 14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抗议已经持续

了大约两周——谢赫·哈西娜嘲讽抗议者是“拉扎卡尔”（razakars），更确切说，是“拉扎卡尔的后代”。“拉扎卡尔”这个词源自乌尔都语，原意为“志愿者”，但在孟加拉语的日常用语中极具煽动性意味。在历史上，这个词曾用来指称在 1971 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站在巴基斯坦军队一边并接受其训练的孟加拉平民。在孟加拉人民联盟最近一轮执政时期（2009—2024），这个字眼重新流行起来，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用来压制该党的政治对手并将之塑造成“异类”。

人民联盟政权对这个词最不怀好意的用法，出现在 2013 年沙赫巴格运动之后。当时，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与社会活动人士走上街头，要求对 1971 年战争中涉嫌参与种族灭绝的帮凶判处死刑，并进一步要求暂停宗教团体的政治活动（见识过伊斯兰大会党在 1971 年战争中的争议角色之后，他们认为有理由取缔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一边加速司法程序，一边将伊斯兰大会党打上激进伊斯兰主义政党标签，最终成功利用那次运动的政治能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中伊斯兰大会党部分牵连反人类罪的高级别党员，就被人民联盟说成是“拉扎卡尔”。这个精明的政治操弄不仅威胁到了伊斯兰大会党的政治合法性，也威胁到了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的合法性——后者是伊斯兰大会党的战略盟友，同时也是人民联盟最主要的政治对手。⁷

2024 年抗议期间，哈西娜使用“拉扎卡尔”这个字眼来贬斥示威者，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哈西娜并没有设法平息公众的愤慨，而是一如既往地以嘲讽和愤怒作为回应，她反问道，根据学生们的诉求，是不是逻辑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就业市场上，比起功勋卓著的“自由战士”的亲属，难道反而是“拉

扎卡尔”的亲属才更应该得到优待？这不仅仅是一句轻率的评论；它实际上是对学生尊严的公然侮辱。现在哈西娜及其多名内阁成员甚至将这些学生贴上“叛徒”标签。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让人看清了孟加拉人民联盟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用于制造对立的）分化政治手段。⁸这种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就是对国家“起源叙事”的完全占有：在这一叙事中，孟加拉人民联盟被描绘为带领孟加拉国赢得独立并在多年军人统治之后，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核心力量。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会被贴上“伊斯兰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标签——简而言之，就是“拉扎卡尔”。

学生抗议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用一句口号精辟概括了统治精英的政治策略：“舔靴子就是朋友，不舔就是恐怖分子。”学生们的反制策略不仅是回击，更是要重新夺回并重新定义政府的侮辱性话语。于是，7月起义中最具冲击力的一句口号就诞生了：“你是谁？我又是谁？拉扎卡尔！拉扎卡尔！”政治精英们假装对这种表面上的承认感到震惊。然而实际上，抗议者已经改变了“拉扎卡尔”的含义——它不再指“内部敌人”，而是指“义愤填膺的控诉者”。很快，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意思，并（在上面的口号后面）补充了另外两句口号：“是谁说的？是谁说的？独裁者！独裁者！”和“我们要维权，却被说成是‘拉扎卡尔’。”

通过这些口号，学生们公开谴责谢赫·哈西娜是侮辱公民和剥夺人民权利的独裁者。这恐怕是超过15年来，总理第一次被人以这样的方式公开指责。然而，正常的民主政治与对话机制已不足以应对一个实质上已转向威权统治的政权。哈西娜以傲慢姿态回应“平等分配国家

资源”这一以常规方式提出的正常诉求，结果把运动推向了激进的政治变革。这并不是这位总理唯一的重大失误。政府最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致使局势升级为一场全面危机。例如，7月16日，当国家机器开始动用暴力镇压时，民众破坏了国家广播设施以及两座崭新的地铁站。达卡地铁是哈西娜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耗资巨大，其落成被归功于哈西娜的个人远见。在捣毁地铁站事件中，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民众的破坏性暴力倾向——在南亚的街头政治中，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而是他们将地铁本身作为攻击目标。达卡地铁是2022年才落成，在当时仍然是一项新鲜事物，还被当成是一项壮观的发展成就，是孟加拉人民联盟推动的“基础设施民粹主义”的标志性项目。

就在谢赫·哈西娜被迫出逃的10天前，她还视察了其中一座遭到破坏的地铁站。当时她当众落泪，还再次宣称要求她下台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暴民和歹徒。这位领导人当众表演震惊和悲恸，被普遍认为是作秀，因为直到那时，她还拒不承认、也不哀悼被警察和人民联盟党徒杀害的10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哈西娜这种情绪爆发引发了民愤，不出所料，各种病毒式传播的表情包和俏皮话层出不穷。其中一幅讽刺漫画把她画成一边抽泣一边抹鼻涕，配文写道：“戏演够了吧，亲爱的！”。这幅漫画很快传遍首都各处。漫画中故意拼写错误的孟加拉语标语进一步增强了其喜剧效果，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现实：总理的言行如今已彻底沦为公众的嘲讽对象。不久之后，人们提到她时往往只用两个称呼：“法西斯”哈西娜，或者“杀人魔”哈西娜。

谢赫·哈西娜政府的一连串失误固然致使她声望加速崩塌，但真正扭

转配额改革运动方向的，是警方枪杀阿布·赛义德（Abu Sayed）事件。阿布·赛义德是北部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2024年7月16日，他仅手持一根木棍，张开双臂站在枪口面前，结果遭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射杀。大量视频和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对峙场面：阿布·赛义德直面射击者，姿态仿佛已准备好接受殉难。随后，他因剧痛而弯下身子，在被送往安全地点的途中伤重不治。阿布·赛义德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烈士之一，他的死使孟加拉青年跨越政治派别、阶级和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在遇害前一天，阿布·赛义德在脸书上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这样寄语同时代人：“根据自然法则，你终究也会走向死亡。但只要你还活着，就要活得有脊梁。”⁹

从7月14日那场恶评如潮的新闻发布会到7月25日总理视察地铁站之前，政府出动武装部队，造成了100多人死亡。为了限制政治活动，当局关闭了互联网；拘留了学生学运协调人并试图诱导他们招供；追捕并羁押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反对派活动人士；最终还宣布实施全国宵禁。在这些行动中，孟加拉人民联盟的学生组织——孟加拉学生联盟（Bangladesh Chhatra League）扮演了帮凶角色。这伙暴徒手持枪支、铁锤和刀具扑向抗议人群，他们往往戴着摩托车头盔作防护兼掩盖面部特征。这伙人平常就在大学校园里传播暴力和制造恐惧，可谓声名狼藉。人民联盟总书记奥拜杜尔·卡德尔（Obaidul Quader）公开威胁抗议者，称该党青年积极分子将报复示威者，简直就是官方确认孟加拉和全球数百万人在社交媒体动态上看见的官方暴行。

7月20日，学生联合会公布了一份包含9项诉求的清单，其中包括

要求谢赫·哈西娜公开道歉和为遇害者伸张正义。他们还要求奥拜杜尔·卡德尔、内政部长、多名高级警官以及若干公立大学校长和学监辞职。然而，既没有等来道歉，也没有等来追责。相反，街头惨剧仍在持续上演，这迫使同情学生的教师、家长和普通公民顶着巨大风险加入抗议行列。后来，警方甚至从直升机上向抗议人群射击，有居民在自己家中被流弹击中身亡。对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民众来说，此时已经没有退路。

这场原本针对就业歧视而发起的运动，如今只剩下一个目标——谢赫·哈西娜下台。“学生反歧视运动”原计划在8月6日举行一场进军达卡的大游行。但由于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组织者在8月4日决定将行动提前一天。8月5日，数十万普通公民、政党活动人士和学生无视宵禁，企图突破路障进入首都；与此同时，警方仍在执行“逢人开枪”的命令。不久之后，军队开始撤退。随着抗议者人数远远超过警察，游行人群开始涌向总理官邸“加纳巴班”（Ganabhaban）。军队总司令给了谢赫·哈西娜45分钟时间撤离到安全场所，此时抗议人群朝她汹涌而来，距离她仅有几英里远。

威权主义文化

7月起义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既见证了那几个星期里孟加拉国年轻人的百折不回，也记录了哈西娜出逃后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和加纳巴班时的狂喜。在那种如狂欢节般庆祝政治自由的氛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偶像破坏运动。在政权垮台后数小时之内，民众便捣毁了多座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雕像，还洗劫和放火烧掉了他

在达卡的历史故居（同时也是博物馆），公共建筑上的哈西娜肖像和海报也被涂污了。这种集体性的清算与抹除，在政治个人崇拜的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毕竟正是这种崇拜，导致人民联盟一步一步走向专制。

穆吉布被一套精心设计的叙事，塑造为“永恒主权者”形象，那套叙事将世俗爱国主义的犬儒式理解与对民主和发展的信誓旦旦结合在一起，将穆吉布的形象置于人民联盟政权治下的“市民宗教”的核心——“市民宗教”这种说法，是学者阿里尔德·鲁德（Arild Ruud）提出来的。¹⁰ 这位“国父”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从巨型雕像与肖像画，到邮票与货币上的头像，穆吉布的形象不仅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受到法律保护。¹¹ 2011年，由孟加拉人民联盟领导的政府修改了《1972年宪法》，正式承认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国父”。《第十五修正案法》第5条规定，所有政府和半政府机构、自主机构、法定公共机关、各类教育机构以及孟加拉国驻外使馆和使团必须陈列其肖像。备受争议的《2018年数字安全法》还规定，任何人如果通过数字设备，传播或煽动针对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或穆吉布的负面宣传，都将受到惩罚。最高刑罚可达14年监禁，或最高约12万美元的罚款。

这个政权对“政治表象”的执念，其实深深植根于一种现实政治的逻辑之中。自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军事独裁统治（1982—1990）结束后的1991年以来，孟加拉人民联盟与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一直轮流掌权；在此过程中，两党都曾多次牺牲民主原则，以巩固自身的权力。然而，在2009年赢得选举之后，孟加拉人民联盟对政治霸权的追求，甚至超过了其以往的任

何尝试。“七月起义”之前的 15 年时间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政治异议遭到全面压制；警察、官僚体系以及司法机构被政治化；国家对政治反对派实施暴力，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酷刑。正因如此，谢赫·哈西娜的统治被各种不同的说法形容为“一个女人的统治”、“选举独裁”、或“混合政体”。¹²

事实上，早在 2024 年夏天之前很久，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信力。2011 年的《第十五修正案法》还废除了宪法中关于“无党派看守政府”的条款。这一改革在没有征求主要反对党意见的情况下通过，并为后来一系列诚信备受质疑的选举铺平了道路。看守政府制度是在 1991 年军人统治结束后设立的，其目的是在一个中立政府的领导下，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这个中立政府由最高法院最资深的首席大法官担任首脑，并由民间社会人士组成。2014 年、2018 年以及 2024 年的全国大选巩固了谢赫·哈西娜对权力的掌控，但这些选举也因种种弊端而恶名昭彰：不是投票率极低和选举舞弊，就是由人民联盟指定“独立”参选人来营造竞争假象——实际是挤掉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这种剥夺人民选择政治代表之基本权利与能力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的愤怒。

发展将何去何从？

2023 年底，当孟加拉国正准备迎接又一场一边倒的大选时，一家全国性报纸将“基础设施建设”称为“充满危险的一年中唯一的一线希望”。¹³ 过去 10 年的基建成就，与巩固孟加拉国版本的民粹威权主义同时发生。学者哈里·布莱尔（Harry Blair）将这种并行发展的趋势

称为“发展—民主悖论”（development-democracy paradox）。¹⁴ 通过修建该国最长跨河大桥帕德玛大桥（Padma Bridge）和建设地铁线路，孟加拉人民联盟政府依靠昂贵的大型工程项目来巩固政治支持。在许多后殖民国家中，显眼的基建项目带来的声望与政治回报是难以忽视的，孟加拉国也不例外。然而，正如我在 2024 年初所指出的，一个曾成功挑战多年军政府统治的国家，承担不起以牺牲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为代价，换来华而不实的开发。2024 年起义高潮期对地铁站的攻击，可能印证了一种预言：无论一个开发项目有多强的民粹吸引力，都无法补偿中断民主理念要付出的代价，在民主理念中断后开发项目也将难以为继。¹⁵

在 2024 年 3 月接受亲政府政策刊物《白板》（Whiteboard）采访时，谢赫·哈西娜阐述了她的发展理念：“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才拥有推动国家发展的洞见，而精英决策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发展是一项政治议程。你无法把发展与政治分离。”这句话的最后一句，其实恰恰概括了她的政府在过去 15 年中的运作方式——但哈西娜本人赋予它的含义却完全不同。在那次采访中，她将自己政权的政策，与 1970-1980 年代脱离民众的军人统治者区分开来，还宣称：“政治不应该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应该是滥用权力。”¹⁶

然而，谢赫·哈西娜那些大型工程项目及其他众多项目的腐败问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普遍认为，与谢赫·哈西娜关系密切的人——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亲属关系——都从这些标志性工程中获取了巨额回扣。但任何敢于质疑项目成本、质量或工期的记者、新闻媒体、甚至 TikTok 用户，都会遭到惩罚。总理的“梦想工程”——帕德玛大桥，

早期受到严格审查，因为世界银行根据确凿的财政舞弊指控，撤回了对该项目的资金支持。地铁项目同样存在问题：其建设成本比印度尼西亚类似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出约 1.5 倍，比印度同类系统几乎高出 2 倍，而且建设工期也明显更长。¹⁷

此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贷款违约者和洗钱者还将数十亿美元转移出境，尤其流向加拿大和阿联酋。到 2022 年年中，孟加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新贷款进一步加重了本已沉重的外债负担，而到 2023 年年底，该国的外债规模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¹⁸ 为了减少不良贷款数量——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采取的措施——孟加拉国中央银行伪造了账目，还放宽了坏账核销政策。这一做法不仅抹去了大量不良贷款，还使贷款违约者免于承担责任。到 2024 年 4 月，该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 193 亿美元安全线。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升至两位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不仅加剧了粮食不安全问题，也缩短了该国最弱势群体的预期寿命。

外国媒体调查证实了大多数孟加拉国民直觉上已知，或通过绘声绘色的民间传闻所了解到的事实。2021 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推出的一部调查纪录片《总理身边的人》（All the Prime Minister's Men）曝光了大量秘密拍摄的高层腐败证据，而那些线索可以追溯到该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高层。¹⁹ 纪录片中出现的两兄弟属于所谓的“艾哈迈德家族”（Ahmed Clan）——该组织曾是达卡的一个街头帮派，在谢赫·哈西娜还是反对派领袖时曾为她提供安全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这两兄弟因杀害一名政治对手而逃离孟加拉国。几十年后，他们因坚

定忠诚而得到奖赏：2018年，兄长阿齐兹·艾哈迈德（Aziz Ahmed）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而弟弟则获得总统特赦。最终，他们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还参与高级政府职位买卖（包括国家警队职位），以换取金钱和安全保障。在半岛电视台获取的秘密录音中，这两兄弟之一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总理本人批准。

哈西娜对诸如此类的诸多报道、泄密与曝光置若罔闻，坚称她的政府坚决反对腐败。2024年7月，她公开回应了一桩家丑——据当时的媒体爆出，她其中一名家仆通过接受贿赂和游说，敛财数百万美元。对此她表示：“这个人在我家工作，只是个勤杂工，现在却拥有40亿塔卡（孟加拉货币）。他出门都要坐直升机……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我一获悉这件事就立即采取了行动。”²⁰对大多数孟加拉人来说，做出透明和问责姿态不过就是表演而已。在一个贪婪与腐败既明目张胆又横行无忌的国家，大多数人苦苦挣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样的表演几乎毫无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配额制度背后存在可疑的政治算计，学生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从“学生”到“学生—人民”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反殖民斗争期间，以及在20世纪60—70年代孟加拉地区的毛派武装起义期间，南亚地区的学生运动都曾活跃一时。不过，在主流政治权力运作的环境中，“学生”作为国家政治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并不总是能够持续发挥影响——但孟加拉国是个例外。在这里，“学生”（chhatra）一直是政治希望的重要来源。1969年反对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阿尤布·汗（Ayub Khan）军事独裁的人

民运动期间，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学运人士实现了众所周知的联合。1990年反对埃尔沙德（Ershad）独裁的民主运动和2007年反对军方扶植看守政府的抗议活动，也都是由学生领导并最终推翻政权的。同样，2018年的配额改革运动和同年的道路安全抗议，也主要由年轻人（很多甚至是青少年）推动，而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学生”。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领导2024年7月起义的学生联合会再次凸显了“学生”作为独立政治行动者所拥有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后来也得到承认：一些学生组织者被邀请进入临时政府担任顾问，这是孟加拉国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但是“学生”这一身份也曾被用来为当权者私利服务，包括2024年夏天。当抗议者参与激烈的街头抗争，或反击执法力量时，当局常常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是学生，进而否认他们的政治主体性。有时，学生抗议者也会明确把自己与孟加拉国学生联盟区分开来，因后者是人民联盟的学生组织。他们还会与“托凯”（tokai）这一称呼划清界限。“托凯”这个绰号，原本指1980年代一个长期连载杂志漫画中的街头流浪儿童。在日常用语中，“托凯”象征着城市贫困、文盲和流浪生活。显然，一种无罪推定式的预设，依然支撑并保护着“学生”这一群体身份。

事实上，在这场政治变革的关键政治行动者是“学生—人民”（chhatra-janata）。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既象征着政治希望与无限潜能，同时也体现出“人民”、“暴民”与“群众”的矛盾和可能性。“学生—人民”这个词在讨论当代孟加拉国集体政治的评论中经常出现，几乎成为“人民意志”的代名词。²¹2024年7月的起义也不例外：从谢赫·哈西娜

辞职第二天孟加拉语日报的巨幅标题，到关于“七月起义”的维基百科词条，再到孟加拉国卫生部网站公布的伤亡人数统计，全都把这场2024年的起义描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合而为一的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事后才形成的解释。“学生—人民”这一说法在起义期间就已经被频繁使用。“学生反歧视运动”的主要协调人之一、如今担任临时政府顾问的阿西夫·马哈茂德（Asif Mahmud），在政府倒台前一天就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写道：“这场学生—人民起义将持续到谢赫·哈西娜下台为止。明天是‘向达卡进军’。现在就前往达卡吧，见证历史。加入这场最后的斗争。”²²因此，“学生—人民”既象征着这场起义的广泛社会呼吁，也意味着它超越了已经僵化的意识形态。由于普通孟加拉民众对党派政治既心存戒备又深感厌倦，这个带有连字符的政治变革主体，弥合了长期被主流政治势力操纵和利用的社会鸿沟。

改革还是革命？

2020年，哈里·布莱尔（Harry Blair）曾在本刊（美国《民主季刊》）提出一个问题：“在看似漫长的威权寒冬之下，孟加拉国的民主希望还能存活吗？”²³2024年的“季风革命”（monsoon revolution），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七月起义”，无疑回答了一个响亮的“可以”。8月8日，在人民联盟政权垮台三天后，一个临时政府宣誓就职，由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担任首席顾问。事实上，是“学生反歧视运动”邀请到尤努斯担任这个新政治秩序的实际领导者。

尤努斯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长期致力于发展议题的研究与实践。尽

管他与人民联盟政权（尤其是与谢赫·哈西娜本人）关系紧张，但在国内一直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可，还在国际上有很高声望。这个临时政府由技术官僚、律师、学者和发展领域工作者组成，有学生代表担任顾问，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经济并推进国家制度改革。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自由公正的全国大选创造条件。而临时政府认为，只有在对政治与制度进行彻底的“清理门户”之后，这样的选举才有可能实现。

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Co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ssion）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²⁴ 自国家政治权力更迭以来，是重写、修订还是废弃宪法，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也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浮现出来——并非（如人们预想那样）是改革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用可靠选举实现政权更迭的愿望与革命后改革诉求之间的分歧。包括民族主义党（BNP）在内的一些政党属于前一阵营。该党的领导层不认为有必要重写宪法（这部宪法起草于1972年，此后多次修订，大多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其立场是坚持宪法连续性。BNP反对学生提出的罢免总统要求，也与这一立场一致。²⁵

临时政府执政四个月以来，学生领导层一直拒绝他们所谓的“穆吉布主义”（mujibbadi）宪法。²⁶ 事实上，“学生反歧视运动”在2024年10月22日公布的5项诉求清单中，制定一部新的基本法列在了首位。²⁷ 部分学生领袖视1972年宪法为“原罪”——因为是在没有民选代表或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起草的——他们拒绝将（基于该宪法的）“当选政府”等同于“民主政府”。²⁸ 诉求清单中还包括：立即罢免总统、宣布最近三次全国大选无效，以及以七月起义（abhuthyan）

和七月革命 (biplab) 的“精神”为基础，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精神”这个词在清单中以英语 spirit 出现，这反映出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即远离孟加拉语词 chetona (字面意为“精神”)——后面这个词如今已与人民联盟的政治话语深度绑定，尤其体现在“muktijuddher chetona”(解放战争精神)这一表述之中。

一边是这个国家最大政党强烈要求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替，另一边是学生联盟兼具革命与改革冲动(的政治诉求)，两者之间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将如何演变？普通孟加拉人对此一直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大多数人仍在为生活成本飙升而苦苦挣扎，更不用说治安形势一片混乱，因为警察士气低落，还有似曾相识的报复性清算迹象也蠢蠢欲动。与此同时，临时政府虽稳步推进改革，却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在这场血腥起义之后的数天乃至数月里，达卡的街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从成衣工厂工人到公职人员，再到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群体。他们在繁忙街道上定期举行静坐示威，阻断交通，他们的诉求包括讨薪、加薪、就业保障、维权、平反以及诸如此类的要求。孟加拉国的民主依然任重道远，但政治确实确实回归了。(李聿脩审校)

注释

1 据人权支持协会 (Human Rights Support Society) 在 2024 年 10 月确认，2024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共有 986 人死亡，其中 868 人的身份已被指认。其中包括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后死亡的人，以及 51 名执法人员。参见《至少 986 人在七月起义中死亡》 (“At Least 986 Killed in July Uprising,” *Daily Star*, 25 October 2024, www.thedailystar.net/news/bangladesh/rights/news/least-

- 986-killed-july-uprising-3736086)。
- 2 丽莎·米切尔：《向国家欢呼：选举之间的印度民主》（Lisa Mitchell, *Hailing the State: Indian Democracy between Elec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3 《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疑云笼罩》（“The Plot Thickens over Calls for the President to Quit,” *Daily Star*, 24 October 2024, <https://images.thedailystar.net/news/bangladesh/news/the-plot-thickens-over-calls-the-president-quit-3734951>）。
 - 4 罗齐娜·伊斯兰：《政府将向假冒的自由战士追讨津贴并收取利息》（Rozina Islam, “Govt to Retrieve Allowance with Interest from Fake Freedom Fighters”, *Prothom Alo*, 19 June 2024,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l2bn9v1urt>）。
 - 5 《孟加拉国抗议者强硬呼吁“向达卡进军”》（“Bangladesh Protesters Make Defiant Call for March on Dhaka”, *Al Jazeera*, 5 August 2024, www.aljazeera.com/news/2024/8/5/bangladesh-protesters-make-defiant-call-for-march-on-dhaka）。
 - 6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大众的悖论：孟加拉国的群众政治》（Nusrat Sabina Chowdhury, *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Crowd Politics in Bangladesh*, 1st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7 关于“合作者”（collaborator）这一形象的更多讨论，参见纳伊姆·莫哈伊门，《历史是艰苦的工作，但我们愿意吗？》（Naeem Mohaiemen, “History Is Hard Work, but Are We Willing?”, *Forum Magazine*, March 2013, <https://alalodulal.org/2013/03/04/history/>）。
 - 8 纳维娜·穆尔希德：《寻找答案：在互联网“断网”期间拼接新闻》（Navine Murshid, “Searching for Answers: Stitching Together News During the Internet ‘Blackout’”, *Dhaka Tribune*, 25 July 2024, www.dhakatribune.com/opinion/oped/352660/searching-for-answers）。
 - 9 皮埃尔·普拉卡什：《镇压配额抗议后孟加拉国局势紧张》（Pierre Prakash, “Bangladesh on Edge After Crushing Quota Protests”, *Crisis Group*, 25 July 2024, 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bangladesh/bangladesh-edge-after-crushing-quota-protests）；塔西拉·巴图尔，《阿布·赛义德的最后抗争》（Tathira Baatul, “Abu Sayed’s Last Stand”, *Slightly Political*, Substack newsletter, 1 August 2024, slightlypolitical.substack.com/p/abusayed-last-stand）。
 - 10 阿里尔德·恩格尔斯·鲁德：《“国父”作为永恒主权者：公民宗教的建构》（Arild Engelsen Ruud, “Bangabandhu as the Eternal Sovereig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 Religion”, *Religion* 54, no. 4 (2022): 532–49）。
 - 11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再度降临：五十年后的镜像与奇观》（Nusrat Sabina Chowdhury, “A Second Coming: The Specular and the Spectacular 50

- Years On” , *South Asia Chronicle* 10 2020 : 31–58, www.iaaw.hu-berlin.de/de/region/suedasien/publikationen/sachronik/02-focus-chowdhury-nusrat-sabina-a-second-coming.pdf) 。
- 12 人权观察, 《孟加拉国: 镇压与安全部队滥权使选举丧失公信力》 (“Human Rights Watch, Bangladesh: Repression, Security Force Abuses Discredit Elections” , 11 January 2024, www.hrw.org/news/2024/01/11/bangladesh-repression-security-force-abuses-discredit-elections) ; 阿里·里亚兹、穆罕默德·索赫尔: 《威权者如何崛起: 民主倒退的序列》 (Ali Riaz and Md Sohel, *How Autocrats Rise: Sequences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 阿里尔德·恩格尔森·鲁德、穆巴沙尔·哈桑编, 《威权主义的面具: 孟加拉国的霸权、权力与公共生活》 (Arild Engelsen Ruud and Mubashar Hasan, eds., *Masks of Authoritarianism: Hegemony, Power and Public Life in Banglades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
- 13 《星报商业部报道: 2023年——在充满危险的一年中, 基础设施成为一线希望》 (Star Business Report, “2023: Infrastructure Was a Glimmer of Hope in a Perilous Year” , *Daily Star*, 31 December 2023, 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news/2023-infrastructure-was-glimmer-hope-perilous-year-3507106) 。
- 14 哈里·布莱尔: 《孟加拉国悖论》 (Harry Blair, “The Bangladesh Paradox” ,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October 2020 : 138–50) 。
- 15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2022与2023年的孟加拉国: 民主与幻灭》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Bangladesh in 2022 and 2023: Democracy and Disillusionment” , *Asian Survey* 64 (March–April 2024) : 321–29) 。
- 16 《发展政治: 与谢赫·哈西娜的对话》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Sheikh Hasina” , *Whiteboard*, March 2024) 。
- 17 莫诺罗姆·波洛克、穆罕默德·沙姆苏尔·霍克: 《“腐败正在劫持我们的发展进程”》 (Monorom Polok and Md Shamsul Hoque, “Corruption Is Hijacking Our Development Process” , *Daily Star*, 29 October 2024, 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views/news/corruption-hijacking-our-development-process-3739291) 。
- 18 阿里·里亚兹: 《孟加拉国的成功故事正在瓦解吗?》 (Ali Riaz, “Is the Bangladesh Success Story Unraveling?” , Atlantic Council, 2 May 2024,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the-bangladesh-success-story-unraveling/) 。
- 19 亚历山德罗·福特: 《半岛电视台: 孟加拉国总理与达卡黑手党家族关系密切》 (Alessandro Ford, “Al Jazeera: Bangladesh PM Close to Dhaka Mafia Family” ,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4 February 2021, www.occrp.org/en/news/al-jazeera-bangladesh-pm-close-to-dhaka-mafia-family) 。

- 20 《“曾是我家里的勤杂工，如今拥有 40 亿塔卡”：总理哈西娜》（“Once a Peon at My Home, Now Owns Tk 4 Billion: PM Hasina,” *Prothom Alo*, 14 July 2024,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dt7pjqi94c>）。
- 21 乔杜里：《大众的悖论》（Chowdhury, *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 22 《孟加拉国抗议者强硬呼吁“向达卡进军”》（“Bangladesh Protesters Make Defiant Call for March on Dhaka”, *Al Jazeera*, 5 August 2024）。
- 23 布莱尔：《孟加拉国悖论》（Blair, “The Bangladesh Paradox”）。
- 24 2024 年 11 月 5 日，该委员会开通了其网站（<https://crc.legislative.gov.bd/>），向公众征求有关宪法改革的意见，并允许匿名提交。
- 25 最新一轮抗议爆发于政权倒台四个月后，当时总统声称他不知道谢赫·哈西娜在逃离之前是否已经辞职。在接受一位报纸编辑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辞职文件。“反歧视学生运动”（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将此解读为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试图质疑临时政府宪法合法性的策略。
- 26 萨尔瓦尔·图舍尔：《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与其起义后的困惑》（Sarwar Tusher, “বিনপির গণঅভ্যুত্থান-পরবর্তী বিভ্রান্তি” [The BNP and its post-uprising confusion], *Samakal*, 2 September 2024）。
- 27 这份诉求清单由一名“反歧视学生运动”（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成员在 2024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私人通信提供给作者。
- 28 图舍尔：《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与其起义后的困惑》（Tusher, বিনপির গণঅভ্যুত্থান -পরবর্তী বিভ্রান্তি, “The BNP and its post-uprising confusion”）。



黄奕信画作

读书

乔晞华

作者乔晞华为美国图兰大学社会学博士，著有《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总统制造：美国大选》等作品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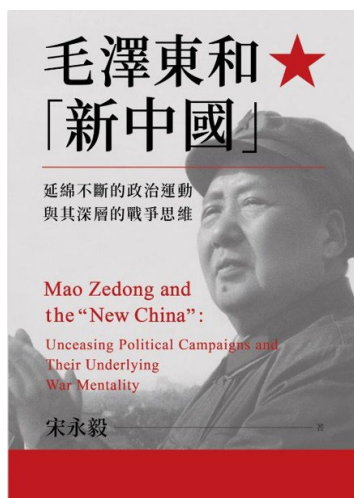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共政治运动研究的新视角：宋永毅《毛泽东和“新中国”》

题记：宋永毅教授的新著系统梳理了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内在逻辑。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发生这种复归和演变，必定有其原因——答案或许就在这部著作之中。

2026年，正值文革爆发六十周年之际，宋永毅教授出版了新著《毛泽东和“新中国”：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以下简称《毛泽东和“新中国”》，引用只注页码）。这是他2021年出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¹（以下简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力作。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26年1月

宋永毅教授最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是他数十年来对中共历史原始资料的搜集，不但享誉华人学界，而且闻名国际学界。《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其研究转向另辟蹊径为文革研究提供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该书把心理文化方法运用于文革的宏大叙事，解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解读决定文革进程的领袖与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该著作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心理理论框架，体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背景的密切结合。特别是该书借鉴西方学者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在文革研究中独树一帜。

《毛泽东和“新中国”》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是姐妹篇，主要区

别是研究重点不再仅限于文革，而是文革前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一般而言，学者们通常更注重研究某个地区、某个专题、某个政治运动²，这是因为许多大的运动或事件已经有太多研究了³。而在巨量的中共研究专著和毛时代中国政治研究专著中，对于政治运动的系统研究仍为空白。如今《毛泽东和“新中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见吴国光教授“序”）。这是该著作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对中共政治运动所构筑的革命理论体系做了彻底的解构。作者不仅对中共的政治运动作了全景式的审视，还对其进行纵深面的剖析。例如，该著的第一章分析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具体的数据上颠覆了至今为止还在被极力吹嘘的革命神话。中共发动土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国存在一个延续了3000年之久的“封建地主制”。这一经济形态又表现为地权的超级集中和过量的地租。然而真相是：这种论调一出笼便遭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批驳；在后毛时代，大陆学界的主流已经否定了所谓的“封建地主制”。学界的共识是，中国长期地少人多，并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勤劳节俭的自耕农群体而已。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建立在人为杜撰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的基础上（页19-20）。

中共政治运动指导理论的荒谬性，不仅表现在它们全然依赖虚假数据支撑门面，还表现为其政策出尔反尔的欺骗性和蓄意制造敌人的残酷性。该著第三章论述中共建政初期发动的“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1949年初，毛泽东代表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任何前朝政府成员，只要不进行现行武装抵抗，不应当处决或关押。然而，1950年发动

的“镇反运动”中所杀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现行抵抗活动，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身分。数以百万计的这些所谓“反革命”，大多数是中共背信弃义或官逼民反政策制造出来的。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是中共进一步在自己内部制造反革命。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肃反材料，仅有不到6%是反革命分子，而其余94%以上都是无辜的（页20-21）。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研究中共的文献中，对于某个政治运动的研究并不少见，特别是对文革的研究，论文、论著浩如烟海。但是，此类研究往往把某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或一组历史事件来对待，虽然也探讨其作为政治、社会、历史事件的源起、过程及其意义。《毛泽东和“新中国”》则从宏观着眼，把个案分析与相关历史脉络的深入探究相结合，并以政治运动作为总的研究主题综合讨论。这种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的认识方式，具有系统与综合优势（页8）。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在批判运动发动者和迫害者的历史罪责之同时，也对广大受害者的历史局限性予以毫不留情的揭示和剖析。例如，第二章谈及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人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中共的暴力逼迫下接受改造。但历史真相却是，中共刚进城，大批知识分子就主动投靠。当年知识分子曾主动选择中共“洗脑”。大规模的、举国性的知识分子检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特殊现象。当年中国精英阶层的上千份检讨，被新政权发表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公信力造成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页22）。

同时，对中共强权的主动臣服，还表现在 1949 年民族资产阶级的选择上。中国的民族资本有过很多机会，转移资本到国际市场，或者在海外开拓新实业。但是他们多数人并没有选择流亡海外，而是留在大陆继续发展。他们以为改朝换代后的共产党会好过国民党。他们相信可以和共产党合作，以获得更大发展。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主也选择相信中共。仅七年时间，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就在“公私合营”旗号下灰飞烟灭。更为可悲的是，产业所有者们还要打着旗帜、陪着笑脸，违心地拥护共产党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页 23）。真是引狼入室，自作自受。

按理说，中共建政后，本应该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毛泽东却不断地发动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例如，以整人为目的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以领导人政治指标为指导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思想教育为宗旨的“学雷锋”、“学解放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到毛晚年，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可以说在毛时代，一个运动未息，一个运动又起，人人被运动裹挟，一切均在运动之中。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政治运动，既基于其战争思维，也得益于其“克里斯玛型”（也称为“魅力型”）权威。韦伯定义“魅力”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魅力型权威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的权力⁴。因其权威独特而又缺乏组织性，魅力型权威很大程度依赖个人崇拜。随着时间推移，毛经验累积，对政治运动极其娴熟，深晓其奥秘。魅力型权威的

管治通常存在于威权国家、独裁国家和神权政体。当领袖死亡或离任，魅力型权威也就自然消亡⁵。

尽管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从运动的重复性上可以体现出来。毛发动“三反运动”以解决党内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新的腐败问题却依然此起彼伏。毛不得不发动“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党内风气却越整越坏。毛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可是，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运动催生了民主呼声。1957年曾出现过中共建政后第一次组党结社高潮。在各个高校的右派集团里，有很多人产生了在中共和现有的民主党派以外，另行组建独立政党的想法。例如，清华大学的徐璋本教授和他的“中国劳动党”，云南数所大专院校的“中国大同党”，兰州大学右派学生筹备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1966至1968年文革中大量涌现的造反组织中，也有不少带有追求民主的色彩⁶。

分析运动时，我们需要分清两种运动，即党的运动和群众运动。后者更严格地说应该叫做“社会运动”。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中共在领导其运动的过程中，嘱咐下属不能简单包办，也不能放任民众自流，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对政治运动倚靠的民众给予实际物质利益作诱因（页13）。实际上，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干部的幕后操纵下，通过中共严密的各层党组织驱使民众进行的。而真正的群

众运动（即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矛头向上的运动⁷。

1976年“四·五运动”中，民众反抗敲响了文革丧钟。在毛去世后不久，文革便不得不草草收场。两年后，全国爆发了知青“大返城运动”，迫使中共中止了持续2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返城运动”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个民众赢得胜利的社会运动⁸。

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倒行逆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削弱集体领导与制度化约束；加强对媒体、互联网、学术与公民社会的监管；强调所谓的“共同富裕”，对企业加强控制，国进民退；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路线，不断制造国际摩擦，引发台海紧张局势。批评者认为习近平试图效仿毛泽东进行第二次文革，称之为“文革2.0”。既可惜又万幸的是（对中国人民来说），习近平本身相对平庸，并不具备堪与毛泽东媲美的魅力型权威，不可能也不敢像毛泽东那样放手让民众进行类似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连毛泽东都玩火自焚，被其亲自动的文革所反噬，如果习近平敢步毛泽东后尘，必难逃失败下场。习近平缺乏威望，只能靠高压的铁腕手段，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专制统治。

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发生这种复归和演变，必定有其原因。我们也许可以从宋永毅教授的新著作中找到启示。

注释.....

1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台湾：联经出版社，2021。

- 2 杰夫·古德温：《今日社会运动研究：一个局内人的（自我）批评》 [Goodwin, Jeff,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Today: An Insider's (self-)Critique" 2012. <http://politicsandprotest.ws.gc.cuny.edu/files/2012/07/Goodwin-Contemporary-Sociology-Essay.pdf>) 。
- 3 加布里埃尔·赫特兰、杰夫·古德温：《资本主义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奇异消失》 (Hetland, Gabriel and Jeff Goodwin,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apitalism fro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Colin Barker, Laurence Cox, John Krinsky, and Alf Nilsen. Leiden: Brill, 2013, pp 83-102.) 。
- 4 乔治·里泽尔：《社会学理论》 (Ritzer, George, *Sociological Theory*, 8th edition. McGraw-Hill, 2010.) 。
- 5 约翰·马奇奥尼斯：《社会学》 (Macionis, John, *Sociology*, 18th edition. Pearson, 2023.) 。
- 6 约书亚·张、菲利普·蒙特、詹姆斯·赖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动员、派系分裂与覆灭：社会运动视角》 (Zhang, Joshua, Philip Monte and James Wright, *Mobilization, Factionaliz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Mass Movement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Remembering Publishing, 2020.) 。
- 7 乔晞华，《文革的暴力与造反运动：南外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华忆出版社，2025。
- 8 约书亚·张、菲利普·蒙特：《被迫上山下乡的中国城市青年的苦难与抗争：量化研究》 (Zhang, Joshua and Philip Monte, *The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Urban Youths Forced to the Countrysid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De Gruyter Brill, 2026.) 。

简
记

林秦

作者林秦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生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全球民主 人权事件

1、伊朗镇压大规模民众抗议

从2025年12月29日开始，伊朗首都德黑兰由于高通胀和物价飙升而发生民众抗议，仅第二天就开始出现政治口号。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通过在29日发声纪念2009年抗议镇压事件十六周年，表明了反对抗议和支持官方立场；有个别报道称，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也在这一天表达了对话意向，但没有具体程序。

随着事态迅速升级，一个星期之内死亡和被捕人数飙升。流亡中的礼萨·巴列维王储（Reza Pahlavi）向死难的抗议者表示敬意，并呼吁更多民众加入抗议。1月2日凌晨，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明确警告称，如果伊朗政权屠杀民众，美国将会介入。3日，哈梅内伊发表公开讲话，指称抗议是国外敌对分子煽动的，并批准镇压。然而抗议不断扩散，伊朗国内的劳工组织、退休人员组织、公民组织和教师组织等社会肌理的投入速度和镇压的升级速度难分上下，罢工、罢市使得多个城市停摆。多处尖锐冲突地区在4日左右被断网，致使国际媒体对抗议的报道一直滞后且稀疏。

后来伊朗官方通过烈士基金会（Martyrs Foundation）承认共有3117人死于镇压；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确认的死亡人数是7007人；联合国伊朗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佐藤麻衣（Mai Sato）表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0000人以上。1月25日，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伊朗卫生部两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称光是1月8日和9日两天就有超过30000人死于镇压。

2、美国越境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026年1月3日凌晨，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突然发文宣称，美国已通过“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抓捕了掌权逾十年之久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美国战争部很快跟上正式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

整起行动发生在2日深夜至3日凌晨，进展极其迅速，各国领导人反应不一。虽然有相当的声音认为川普此举完全无视国际法，但是许多主要国家的表态仍然是相当暧昧。行动中，美军只有一人受伤，而委内瑞拉方面则通报有83人丧生，包括古巴政府证实的隶属于总统卫队的32名古巴人。

5日，在马杜罗被捕后接手临时总统之位的并不是反对党人士，而是此前马杜罗政府中的二号人物，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她延续了马杜罗的班底并得到美国总统川普认可，也得到了委内瑞拉军方支持。罗德里格斯上台後，委内瑞拉国内情况基本稳定下来。根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28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说法，美国方面要求，通常以低价卖给中、俄、古巴等国的石油须以市价出售，并须以美国认可的审计方式来规划其利润分配，以及逐步放开石油行业对私人投资者的限制、逐步释放在押政治犯等等。罗德里格斯政府默认了美国的安排。

3、香港法院判处黎智英 20 年监禁

2025年12月15日，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被宣判煽动及勾结外国势力罪成，最终于2026年2月9日判刑20年，审讯历时156天。从2020年8月10日被港府逮捕时起，黎智英在审讯前已被单独囚禁超过1800天，其健康状况一度恶化。虽然其间有短暂交保，但黎的保释资格在2020年12月31日被突然撤销。根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许多受国安法指控的香港政治犯均表示，候审和长时间的审判过程往往比最终的服刑更难熬，有一种被悬置起来的不确定感。

但即使不提这些细节，20年最终判决也是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生效以来的最重刑罚，更遑论黎智英已经时年78岁。同一时间，还有另外六名《苹果日报》员工被判6至10年不等。国际社会虽然表达声援的呼声高涨，还承诺全力救援，许多政客也多番尝试从中斡旋，希望争取特赦来缩短黎的刑期，但北京方面却始终保持沉默。2026年2月26日，黎智英多项罪名中最轻的两项欺诈罪被撤销定罪，刑期缩短了6年，但仍需服刑至2040年。

4、智库和人权机构警告全球民主衰退

2026年2月，重要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了其年度报告。3月，衡量全球民主水平的三家标杆性数据库中有两家——民主多样性（V-Dem）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发布了最新报告。它们的信号非常一致：全球民主指数已连续20年下降，许多处于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混合政府在整个2025年间直接跌落为威权政府，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国家也大多加强了对国内外不同政见群体的压迫活动。

美国政治自由和民主水平迅速恶化是以上三家机构的共识。不仅评分处于下降梯度最大的国家之列，甚至在 V-Dem 系列数据的分类中直接掉出了自由国家之列。美国在 2025 年政治自由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总统川普无视规则和有威权倾向，包括决策和行动往往绕开国会中的制衡机制，还加强对媒体的政治控制等等。

5、秘鲁临时总统赫里遭国会弹劾去职

2026 年 2 月 17 日，秘鲁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对何塞·赫里 (José Jerí) 的弹劾，免除了其临时总统职务。根据 1993 年宪法，当总统出现“永久性道德失能 (Permanent Moral Incapacity)”时，国会可予以弹劾。秘鲁是深陷拉美陷阱的国家中一员，近 10 年选了 8 个总统。赫里的前任总统迪娜·博卢阿特 (Dina Boluarte) 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被国会弹劾，原国会主席赫里因此就任临时总统。他在就任初期表明了严厉打击犯罪的决心，收获了一波支持。但仅仅 4 个月后，赫里爆出了疑似权钱交易的“中餐馆丑闻” (Chifagate)。媒体发布的录像显示，去年 12 月 26 日深夜，在首都利马一家中餐馆，赫里戴着兜帽遮挡身份私会一名中国商人杨志华，而且私下会见中国商人不止这一次。这就违背了秘鲁总统的行程应透明原则。赫里否认违法，称这些会面只是“文化性质交流”，但国会多数议员认为这已经严重损害总统职位信誉。赫里被罢免的一天后，原资深议员何塞·玛丽亚·巴尔卡萨 (José María Balcázar) 被选为新的临时总统。巴尔卡萨在就职演讲中承诺自己的唯一任务是为 4 月 12 日即将到来的大选和权力交接护航。

秘鲁总统被频繁弹劾下台反映出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造成政局不稳。CNN 的街头采访显示，民众已经对不断换总统感到麻木和焦虑；美联社和路透社认为这是秘鲁政治危机的延续；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国会频繁罢免总统正在削弱秘鲁民主的稳定性。

6、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被判处终身监禁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 2024 年 12 月 3 日命令包围国会、实施戒严未遂，于 2025 年 4 月 4 日被弹劾，至 2026 年 2 月 19 日被判无期徒刑。根据韩国宪法规定，现任总统享有刑事追诉豁免权，但叛乱或叛国罪除外。首尔法院裁定，尹锡悦的戒严行动构成颠覆宪政的叛乱行为，以“叛乱首谋罪”判处尹锡悦终身监禁。对此，大多报道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判决在戒严闹剧之后展示了国会和法院对总统的制衡能力。尹锡悦曾经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PPP）已于 2026 年 3 月 9 日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与尹锡悦“断绝关系”，以挽救低迷的支持率。但仍有少数支持者以集会抗议，甚至在法院外自焚的方式表达对尹锡悦的支持。

7、孟加拉举行议会选举和宪法公投

自 2024 年 7 月爆发革命的一年半以后，孟加拉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举行大选，由 1.27 亿选民选举 297 个国民议会议员。这不仅是该国自“Z 世代革命”推翻政府之后的首次大选，也是全球范围内“Z 世代”抗议浪潮中最先举行大选的。由塔里克·拉赫曼（Tarique Rahman）领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取

得压倒性胜利，赢下 212 个席位，仅一党就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同一天，孟加拉还就《七月宪章》（the July Charter）提出的宪法改革倡议举行了全民公投。《七月宪章》是由诺奖得主和金融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的临时政府起草，包含诸多宪法修正、法律改革、政治改革方案，最终在公投中得到 60.26% 选民支持。BNP 与部分主要政党在重要核心改革议题上目标一致，但具体改革方案分歧明显。被革命推翻的前执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被禁止参与议会大选，也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为此，该党曾号召其支持者公开抵制今年大选和宪法公投。

2 月 13 日，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EC）公布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为 59.88%。考虑到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以及前执政党的很多选民可能抵制选举和公投，这已是非常不错的成绩。14 日，拉赫曼在选举后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非常谦虚和渴求团结的姿态。16 日，大选结果公布，领导过渡政府的尤努斯顺利完成了职务交接。17 日，拉赫曼宣誓就任孟加拉总理并着手组阁。

8、尼泊尔自 Z 世代抗争事件以来首次选举

2026 年 3 月 5 日，尼泊尔举行了自去年“Z 世代革命”以来的首次大选。3 月 12 日公布的大选结果表明，由前加德满都市长及说唱歌手巴伦德拉·沙阿（Balendra Shah）领导的民族自由党（Rastriya Swatantra Party, RSP）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总共 275 个议会席位中拿下了 182 席。

尼泊尔总共 2900 万人口，有 1900 万名登记选民，本次选举投票率约为 60%。参加本次选举的三千余名候选人中，有超过 1000 人年龄在 40 岁以下，可以说相当年轻化。中等参与度的成熟民主国家大选投票率约为 50%—70%，能取得约 60% 投票率算是不错的成绩。

国际社会对尼泊尔本次选举过程的和平与合法性给予肯定，对结果的变革性持欢迎或中性乐观态度，认为它反映了民众对“新面孔”和“清明政治”的强烈诉求。3 月 27 日，巴伦德拉宣誓就职。同一天，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表达了祝贺和友好合作意愿。考虑到此前导致尼泊尔爆发“Z 世代”抗争潮的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停滞与政治腐败，再加上超高的民意支持也不可避免带来期望和压力，RSP 党魁表示，他们将会采取迅速行动，首先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 1990 年以来的官员财产与腐败问题。

INTERVIEWS

Xi Jinping's Neo-Totalitarian Regime: Ris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cline

Minxin Pei / Yuxiu Li

What political legacy did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eave behind? For decades, this policy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legitimacy—an unquestionable “political correctness.” Yet as Xi Jinping has driven the state toward a reversion to totalitarianism, scholars have increasingly tended to scrutinize the “political liabilities” of the reform era. Minxin Pei, an important Chines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argues in a new book published this year that Deng Xiaoping left two major political legacies that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Xi Jinping to revive totalitarianism. Pei believes that while Xi's rise had a degree of contingency, the post-Mao reforms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resurgence of totalitarianism. Why is this the case? Yuxiu Li, an editor of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a young political scientist, conducted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ei, exploring how Xi Jinping regime has been able to bring about a totalitarian comeback.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Mao Zedong's Governance through Mass Mo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ike Phenomena in the Post-

Mao Era

Yongyi Song / Falin Gao

2026 marks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year, Yongyi Song, professor emeritus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published a new book of approximately 4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 titled *Mao Zedong and the “New China”: The Unceasing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Their Underlying War Mentality*. The book trace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core mindset behind a succession of of political campaigns Mao launch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lling a major gap i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CCP's political movements. Five years earlier, Song published *Mao Zedo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Genes*, drawing on the framework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pathology to analyze Mao and five other central figur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issioned by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Falin Gao, a writer based in New York, conducted thi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ong, exploring the range of issues addressed in both books.

The Unsubjugated: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Exil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Yanzi Liu / Xue Jiang

In May 2024, Yanzi Liu published *Immortal Emigre: Portraits of Wild Intellectuals* in Japan (Jikkosha). Having lived in Japan for over thirty years, Liu has long devoted herself to studying Chinese exiles and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is newly published Japanese book of over 700 pages, she centers on the exil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ound 1989, tracing back to the underground literature and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internal exi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xtending forward to exiles in the “post-Tiananmen era,”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he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historical and spiritual map of the exil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rough oral history, documents, physical evidenc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long-term observation, placing it within the global genealogy of exiled intellectuals.

In Liu’s view, exile is not merely the fate of a few individuals—it is, in essence, a mindset that refuses to be tamed, a mode of existence forever at odds with power.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exile may serve as a mental metaphor, but more often it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very concrete predicament of survival. The suffering, struggle, and mental burden borne by China’s exiled intellectuals are frequently far heavi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Japanese scholar Ms. Matsumoto has described the book as not only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ersec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why the Chinese system is what it is.

On the thirty-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democracy movement,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commissioned Xue Jiang, a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currently b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uct this interview with Liu Yanzi. The conversation centers on *Immortal Emigre: Portraits of Wild Intellectuals*, and seeks to answer why “exile”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lens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and uncovering wherein lies the meaning of thought and action that remains committed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ile.”

An Unfinished Reckoning: Sixty Years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uoguang Wu, Jian Guo, Ping Hu, Datong Li, Yu Gao, Xia Cai, Yao Lin, Houchen Li, and Yuxiu Li

Sixty years ago,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lasted a decade. By naming it a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signaled that the aim was no longer a revolution to transform political or social institutions, but a thoroughgoing revolution that would penetrate to the very depths of the human soul—and beyond. The movement originated in factional conflict and power struggle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Party leadership, before mobilizing all of society to purge and eliminate real and imagined opponents in the name of so-called “line struggles.” The deification of the supreme leader, the frenzy of ordinary citizens, endless “class struggle,” the total collaps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these were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at extreme and manic era. Estimates indicate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d at least two million deaths—an average of at least 200,000 per year—while the number of those persecuted or implicated is beyond counting.

Reflection 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never been a settled matter.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under the impetus of Party elders who had themselves been persecuted by Mao, the official verdict characteriz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ten years of catastrophe” and “ten years of chaos.” Yet the elders attributed it only to Mao Zedong’s grave “mistakes,” and neither did nor were willing to trace it back to

the authoritarian and totalitarian nature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itself. Nonetheless, they did promote limited reforms,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advocacy for “collective leadership,” abolition of the lifetime tenure of leader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alled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producing a noticeable relaxat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Over time, however, even this reserved official assessment came to be challenged. In the 1990s, for example, a school of thought known as the “New Left” emerged, arguing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ained innovations in “mass democracy”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emulation. Beyond the New Left, others turned to romanticize and idealize the era, portraying it as a time of equality, fairness, and the integrity of officials. The general public, who tend to have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a narrower range of reading, are largely unaware of the offici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ave long remained mired in a cult of personality surrounding Mao Zedong.

For quite some time, many observers of Chinese politics believed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unlikely to return, given the tremendous changes that had taken place. Yet since 2012,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rapid rise of a new strongman and a new 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Xi Jinping does not rely on mass movements but on the Party’s institutional and bureaucratic machinery—in this respect more akin to Stalin than to Mao. Yet his promotion of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his pursuit of absolute authority both evoke the image of Ma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has also revised the offici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scribing it as an “arduous exploration,” and has emphasized how his own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experience during that era shaped him.

How, then, shoul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 evaluated? How should the various existing evalua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mselves be assessed? What are the failures in Chinese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 influence do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ert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how shoul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historical event, be conveyed to future generations?

On these questions,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has invited nine experts and commentators—Guoguang Wu, Jian Guo, Ping Hu, Datong Li, Yu Gao, Xia Cai, Yao Lin, Houchen Li, and Yuxiu Li—to contribute roundtable essays. Most of them lived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thers are scholars of the post-1980s and post-1990s generations.

POLITICS & SOCIETY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From Anti-AB League Campaigns in the Soviet Base Areas and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Land Refor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

Zhidong Ha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caused the deaths of two million people and affected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uch outcomes must have some fundamental reasons, one of which i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ndset,’ which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to varying degrees,” said Zhidong Hao, professor emeritus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is year, 2026, marks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specially published by our journal to commemorate one of the most

absurd and manic periods i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o reflect on one of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From “Seizing Power” to a “Governing Generation”: The Structural Decline of CCP's Elder Poli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Yuwen Deng

In the two decades following Mao Zedong's death, elder politics occupied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CCP's highest power structure. The first-generation party-state founders,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and Chen Yun, exercised “adjudicating influence” over top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ir 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networks of personal patronage, and authority over historical narrative. However, this form of legitimacy was non-renewable: as the founding elders passed away, seniority gaps emerged, and institutional centralization and personal authoritarianism advanced, the influence of elder politic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was effectively hollowed out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rough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imeline of declining elder authority,” reveal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behind the decline of elder politics, and structurally analyzes why rumors of “elders opposing Xi” are implausible. The end of elder politics signals the disappearance of informal checks and balances within Xi Jinping's totalitarian system; while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power has increased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it has also raised the risk that policy errors will prove difficult to correct. This transformation mark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CP,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se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Cold War — Anti-Cold War — New Cold War: History Has Not Ended

Kuide Che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anti-Cold War” counter-current emerg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arguing that in the eighty year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world had moved from the bipolar Cold War order to a liberal order under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at it had now entered a multipolar world. Proponents hold that Americans should look back to the multipolar European history of nation-state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downplay ideology, and shed Cold War mindset. This view entirely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unique place the Cold War occupies in human history—it was an unprecedented confrontation over the fate of humanity that established the postwar standard for judging the merits and deficiencies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the defeat of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is irreversible. In today’s world, short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i-Cold War current, the tide is turning: ideological contestation has re-emerged. The internal logic of history generates structural tensions that are dri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ck toward bipolar division—toward a new Cold War, that is,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Cold War.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angladesh?

Kazi A. S. M. Nurul Huda /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On February 12, 2026, Bangladesh held it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the first since the popular uprising that ousted Sheikh Hasina in August

2024. Voters not only elected a new parliament but also approved wide-rang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s. How will these reforms be implemented? Can durabl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e established?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questions that A. S. M. Nurul Kazi Huda addresses in this article. The original piece was published as an online exclusive b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in February 2026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online-exclusive/is-this-the-beginning-of-a-new-bangladesh/>).

The Return of Bangladeshi Politics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 Translated by Xiaoyi Yan

In July 2024, Bangladesh witnessed a historic popular uprising that ultimately toppled Prime Minister Sheikh Hasina's fifteen-yea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movement also attracted intense attention from countless Chinese internet users. But what we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gave rise to it? What role did young students play? And how has it reignited hopes for democratic change in Bangladesh? This article by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offers an in-depth retrospective an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6, Number 1, January 2025, pp. 65–78.

BOOK REVIEW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CP's Political Campaigns: Yongyi Song's Mao Zedong and "New China"

Xihua Qiao

Professor Song Yongyi's new book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Mao Zedong's governance through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political movements reminiscent of the Mao era have re-emerged—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must have its reasons. The answers may well be found within these pages.

NOTES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vents

Qin Lin

《中国民主季刊》征稿启事

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旨在为中文读者提供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观点、新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民主转型的深入探讨。它注重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敬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美欧、澳洲等广泛地域范围以及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学、历史等专业背景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欢迎就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赐稿——

1. 关于中国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问题；
2. 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可能前景、路径、风险、战略等问题；
3. 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经验、教训；
4. 关于民主理论、宪法设计与民主建构；
5. 关于民族与国家性问题；
6. 新书与重要著作的推荐、评论。

投稿要求如下：

1. 稿件应为汉语。也欢迎用藏语、维吾尔语投稿，我们将协助译成汉语发表。来稿请标明篇名、关键词、摘要（不超过 200 字）、作者姓名及简介、联系方式。
2. 国内作者：由于是学术刊物，鼓励国内作者用实名，但出于安全考虑，国内作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用笔名。
3. 稿件字数：论文，以 5000-8000 字为最适宜，建议不超过 10000 字；更长的文章可以考虑分期发表。书评，建议在 2000-3000 字之间。译作，建议在 4000—10000 字之间。
4. 来稿须符合写作规范要求，详细注释体例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上：<https://chinademocrats.org/?p=24>。
5. 投稿邮箱：cjd@chinademocrats.org。您也可以通过此邮箱向我们提出选题策划、建议意见、咨询或者合作方案。
6. 《中国民主季刊》拟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中出版，截稿日期分别为每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9 月 1 日与 12 月 1 日。
7. 稿件刊发后将按字数支付稿酬。

《中国民主季刊》订阅方式

How to Subscribe to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中国民主季刊》是电子出版物，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免费下载，也可以提供您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免费通过电子邮件定期发送给您。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our website, or you can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we will send it to you periodically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我们也印刷少量纸质版，以满足个人、机构、图书馆收藏需要。纸质版每期价格为 38 美元。

In addition, we print a small number of paper cop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Paper copies are available for \$38 per issue.

下载电子版：请登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

To download an electronic copy: Please visi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bsite at <https://chinademocrats.org/>.

订阅电子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或将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 cjd@chinademocrats.org。

To subscribe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s://chinademocrats.org/?p=821> or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to cjd@chinademocrats.org.

订购纸质版：请电邮 cclassics1994@gmail.com 联系代理商 China Classics Inc.。

To order paper copies: Please contact our agent China Classics Inc. by email atclassics1994@gmail.com, or by phone at 858 229 9677.

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回顾历史，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每一次重要努力，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实现民主宪政，为此而探索、写作，以及传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责任。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BN 979-8-9875925-0-2



9 798987 592502